

第十期 (2023 年 12 月)

革命社会主义阵地



组织 宣传 学习

联系&订阅: RSF-kan@tutanota.com

(使用安全邮箱向我们的邮箱发送“订阅”，即可在每月 27 号收到杂志)



RSF 编辑部制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FRONT

目录

关于我们.....	3
第一部分 理论阵地.....	8
马列毛主义反对贡萨罗主义.....	9
谈谈天才论和个人才能.....	27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战线.....	35
第二部分 路线斗争.....	51
东风方：.....	52
“列宁主义”还是“取消主义”？.....	52
现在缺的是职业革命家！.....	58
统一战线方：.....	66
论我们同东风的最近分歧.....	66
我们的下一步.....	73
第三部分 社会社评.....	76
碧桂园危机的意义.....	77
“血槽姐”所揭示出的吸血鬼老爷们.....	97
长沙学生们的斗争.....	100
第四部分 宣传内容.....	105
发展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的号召.....	106
第五部分 斗争艺术.....	107
开源软件与自毁程序.....	108

关于我们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是致力于在中国推进一场新的社会主义革命以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我们创立《革命社会主义阵地》旨在通过对一些普遍公认的马列毛主义基本原则进行梳理和分析，以帮助马列毛主义者自身的发展和进步，从而推动中国革命力量的进步。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为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在工人阶级中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打下一定的意识形态基础；此外我们也十分乐意帮助任何真诚的想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同志们进一步提高知识文化素养和必要的技术能力；我们认为这些素养和能力一方面是运动发展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也多少可以帮助同志们少走弯路。（例如：各种合法斗争的方法、发展秘密组织的经验、把非法工作和合法工作结合的艺术、和反动警察斗争的经验、信息安全技术）

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和资产阶级全面复辟以来，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中国劳动人民就从社会的主人沦落为了雇佣奴隶。此后直到今天，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领域都处于被资产阶级完全专政的地位，而毫无任何实际权利可言。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这世界上绝不会有人甘愿永远处于被奴役的地位，甘愿永远任人摆布。中国工人阶级和统治阶级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哪怕一秒。而且，随着近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导致的经济下行趋势越发明显，统治阶级必然会向工人阶级发动越来越多的进攻，因此工人阶级的斗争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必然会有重大提升，这种事情在任何一个工业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是头一次见到了。然而我们很快就会由此发现一对矛盾，那就是：中国工人阶级越来越需要进行斗争（现阶段很多情况下实际是“反击”）同中国工人阶级缺乏进行斗争的必要“武器”间的矛盾。我们都知道，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一般都具有非常强大，十分高效的维稳能力（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保证资产阶级的统治千秋万代，保证雇佣奴隶制能够延续到永远）。中国的统治阶级（独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容任何挑战，哪怕是最普通的经济斗争也会招致最无情的打击，在这种法西斯国家里连基本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良需求都难以做到。面对这样的法西斯怪物，我们的工人们除了用斗争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外几乎别无他法（当然了，我们这里并不是说只要非法斗争）。而工人们除了组织以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进行斗争的武器。我们谁能够设想工人们能在缺乏组织的情况下赢得哪怕是一场小规模、最初步的经济斗争的胜利？即使是最初步的经济斗争也是需要一定的组织宣传联络工作的，更不要说未来的政治斗争乃至最终的阶级决战了。一句话：没有组织就不可能做到工人阶级的联合，而没有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力量自然也就无力应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疯狂进攻。

然而不幸的是，任何一个稍微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人都知道，虽然工人们非常需要组织但我们最缺乏的却恰恰又是这个武器。要用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从而“武装”工人阶级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客观环境极端恶劣。另一方面则是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才刚刚开始行动，还没有广泛的同工人阶级深刻的结合起来。

中国的统治阶级根本容不得任何一个稍具规模的群众组织，即使是前几年那些对资产阶级统治完全无害甚至是对现有秩序进行有益补充的公益性非政府组织（他们搞得东西和现在未明子之流的活动差不多）都遭到了最严厉的打击。面对这种情况自然就有些人跳出来，告诉我

们现在要做的首先应该是等待合适的时机，因为根本没有可能在当下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推进运动的发展。对于这种人，我们称之为“等等主义者”。诚然，真正的革命者也会分析困难，但真正的革命者分析困难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克服困难以实现最终的目的，而绝非逃避困难。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了“等等主义者”的“高论”，那么即使当机会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把握住机会，更不必谈无产阶级专政了。试想在我们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即使统治阶级真的面临巨大的统治危机，群众即使真的无法再继续往日生活了，但那时我们又做些什么呢？群众会跟着那些从未同他们有过实际联系却又自封为“革命家”高谈阔论的人走吗？到时候整个运动最好的结局估计也就是像德国十一月革命一样被回过神来的统治阶级粉碎罢了。我们认为，中国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革命的主观条件是否成熟。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危机只是促成革命的客观条件之一罢了，而真正能使革命危机转变为成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是革命主观力量的充足准备。我们认为革命主观力量准备充足与否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革命者和广大劳动人民是否走在相对正确的政治路线上，这是纲领性的问题，是决定一切的根本问题所在；第二方面是我们是否具备具体的斗争实践方法、必要的物质和技术等等现实物质条件。

虽说第一方面是根本性的，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就要抛下第二方面不管。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和革命斗争所必需的现实物质条件严重不足的这一矛盾呢？毛主席说得好“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1]一句话，我们不是成为了大多数才去斗争的，而是在斗争中逐渐成为大多数；我们不是在具备了各种物质条件后才去运动的，而正是在运动中逐渐具备各种物质条件的。（当然了这绝不是说我们应该盲目的去送命，而是在具体的斗争中快速的学习并成长起来）而这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归结于正确的路线。也就是说，要争取到必要的现实物质条件应该在坚持正确道路的前提下先投入到斗争中去，而绝非一味的等待。当然了，这世间绝不存在什么先验的绝对真理，所谓的正确路线实际上也就是在历史和现实的无数阶级斗争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那些理论和经验罢了，而这些理论和经验又反过来指导我们今后的斗争。这也正是马列毛主义的生命所在。

近来中国阶级斗争的事实也证明了，虽说中国统治阶级确实非常强大，但也绝非是不可战胜的。疫情时期我国各种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如：上海封城时期的各种群众运动、富士康工人们的斗争、乌鲁木齐事件的群众运动、全国各地的群众冲关事件、白纸运动等等，这些运动难道最终没有迫使当局放弃了极端反动的“清零政策”了吗？（当然了，有的人肯定会说全面开放都是因为地方政府没钱了，假真如此，这也只是一个次要因素，主要的因素是我国群众用实际行动愈发的迫使政府放弃他们的极端政策，这就使得他们在十月份都还坚持要防疫到底却又在十一月份突然来了个180°大转向。）然而这个时候估计又有些“革命家”跳出来准备“实践”一番了，从成天专注于喊口号、做大梦的机会主义小团体“中共（毛）”[2]，到部分贡派的朋友们的所谓“中国毛主义者小组”（他们僵化的简直震撼世人，他们竟打算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抵制不存在的、所谓的“资产阶级议会选举”！！！！）[3]再到最近成立的所谓“革命共产主义联盟”都是如此。这些朋友们在实际上是把共产党当成某种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了，当成是某种只需要几个自命为革命者的人坐在一起开个会再出份宣言就可以变出来的东西了。但不幸的是我们马列毛主义者不是戏法师傅，绝不能从真空中变出一个党来，我们也相信他们也同样不具备此种神奇魔力。事实上，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最高级别的工人组织。换言之，先锋队是在大量群众工作，遍布全国的、和工人阶级有深刻联系的马列毛主义小组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的发展，最终形成的一个强大组织；所谓的成立大会，只不过是把先锋队存在的既定事实给摆上台面罢了。从这个逻辑来看，目前及之后一段时间里，任何在中国大陆地区成立的所谓“无产阶级先锋队”顶天不过是一群左翼知识分子自娱自乐的俱乐部罢了。

回过头来，我们刚才谈到了现阶段中国工人阶级越来越需要进行斗争而又缺乏斗争的武器的现象。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现阶段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工人们尚未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作为一个阶级来应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暴政。（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还不存在主观和客观相结合意义上的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中

国无产阶级)群众还没有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海洋里爬上岸;马列毛主义尚未被群众接受并成为劳动人民自己的意识形态。一句话:革命的意识形态还没有同革命的阶级相结合。而我们正是要使革命的阶级逐步具有革命的意识形态,使中国劳动者能自觉的捍卫自身阶级利益,并最终能够组织起来走向彻底解放自己的光辉的社会主义大道。而要改变现状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认为需要有一批具有各种必要素养的的革命知识分子,而这也就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他们将首先联合起来,去到社会各阶层中去学习、去实践、去宣传、去组织、去斗争。当然了,在一开始我们还没有足够力量的时候,我们应该主要到工人里去,特别是到产业工人那里去,他们永远都是我们的基本盘。

但是如果我们这些自命为马列毛主义者的人,连自己都不能对当下的社会现实有一个相对清晰科学的认知又怎么能到群众中去开展各项工作呢?如果我们自己对革命的学说都不能有一个基本理解的话又怎么去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呢?如果我们没有发展革命组织的必要知识素养和维护群众利益的必要手段怎么能够代表群众并使他们走向革命呢?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一种渠道,来把这么多年来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所形成的一些基本认识所总结出来并尝试加以分析,以促进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自身在基本理论上的进步,为不久的将来所进行的群众组织工作打下一定的意识形态基础。而这也就是我们这份杂志存在的重要目的之一。除此之外,我们杂志也必须要做到能推动我国目前还很弱小的社会主义革命方向的现实组织工作,要推动建立革命组织、群众组织、革命家组织,所以它必须还要服务于我们现实组织工作的理论、政治路线需求。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指责我们搞宗派主义,不懂得联合各种泛左派。但问题在于什么是“联合”?如果我们把“联合”定义为“一定范围内的个人或不同团体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在一定原则下选择的统一行动”的话,那么我们同任何人联合的目的都必然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最高要求而服务的。然而,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是讲理论分析和实践证明的,我们的理论和道路绝不是哲学家或伟大导师从真空中凭空想出来的绝对正确的律令,而是在过去一百五十多年里,无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具体的、血与火的阶级斗争实践中一步步总结出来,并反复被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为代表的无数具体革命实践和今天仍在印度和菲律宾等地进行的人民战争所反复检验的理论;是在实践中能够进行自我反思并不断发展的理论。(不然是怎么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马列毛主义的呢?)而历史和现实也同样无数次的证明了其他各种各样的什么“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妙论从来就没有同工人运动真正大规模的结合过,几乎没有为运动争取到半点的突破,反而很多时候在起阻碍作用,更不要提靠它们推翻资产阶级专政了。且不谈已经沦为和自由派没什么实际区别的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第二国际时代就已经被驱逐出去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一向以布尔什维克正统自居的托派分子也就那样。托派分子所鼓吹的什么“工农对立”,就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人民民主主义国家成为过主要矛盾;还有他们热衷讨论的所谓“官僚问题”,实际上和自由派天天痛骂的所谓“秦制”一样,基本就是一个空洞的靶子和好用的帽子;至于那荒谬的“世界革命论”则是要求不顾世界各国运动发展的自身逻辑、不相信各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以极端傲慢的态度要求革命率先胜利的国家不顾自身所处的现实环境,强行推进所谓“世界革命”,这种策略不但难以推动世界革命,甚至很可能把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政权也葬送进去。

对于那些自称为“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人也就是贡萨罗派还值得分辨一番。我们相信绝大部分贡派朋友都是多少有一定理论基础的,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是被极少数顽固的接近于修正主义者甚至已经是修正主义者的贡派所误导了的。对于前者,我们认为只要他们继续坚持学习基础理论,并多多加以反思的话,肯定是可以继续进步并最终投向我们的队伍的;但为了帮助他们实现进步,我们反而要不断指出他们目前的问题所在。而对于极少数十分顽固的贡派分子,只要他们没啥现实影响力我们就几乎可以无视他们,而假设有的话,我们就不得不采取对待修正主义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他们了。事实上,贡派和马列毛主义主流派之间的路线斗争已经持续很久了,并且还将持续下去,而我们的一些同志也已经在部分国内合法公开的平台同他们交锋过好多次了,写了不少优秀的文章。因此我们的杂志相对而言应该不会涉及太多这方面的内容了。(当然,肯定还是会有有的)

实际上泛左翼的问题绝不只有我们刚谈的那么一些，但在这里实在没法全面展开论述了，我现在只谈一点：要想真正促进那些泛左派的人进步，要想真正实现广泛的联合，要的绝不是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去妥协或勉强接受对方的所谓“妥协”，而是要坚持路线斗争，坚持用马列毛主义的方法逻辑来指出他们的正确和错误的地方以及为什么正确或错误；唯有这样才能够在革命的旗帜下实现真正的大联合，否则当我们在错误的路线下同泛左实现了所谓的“联合”又有什么用呢？这样的“联合”甚至会让我们把自己本来相对正确的东西也被迫丢失了，实在是得不偿失。而若是我们能够将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共识总结起来，锻造成一把利刃，并在具体事例和运动的发展中实际运用这把利刃来深刻的解剖各种现实问题的话，那么任何真正愿意推进革命而又具有基本的反思能力的人反而更容易摒弃原先错误的东西，转而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从而实现真正的大联合。

还有的同志可能会觉得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各种墙内的网络平台上，用视频之类的途径进行所谓的宣传工作。事实上我们的工人们并不会花大把时间在这些平台上广泛活跃，他们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精力在百忙之余抽出时间去网上大量的看这些视频。通过这种倍受限制的方法去缓慢的直接影响部分学生和知识分子们的任务不是我们编辑部的主要任务。而对于有更高追求的马列毛主义者而言，则更不会把看视频当作提升自己的主要途径。另外，即使是从单纯的信息传播效率的角度看，汉字也要比任何视频或音频的效率高得多，尤其是在传播严肃内容的时候更是如此。此外更不要说我们在那些公开的网络平台上只能做最初步的政治宣传而任何一点涉及关键内容的东西都是难以涉及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绝不是要像“火星报”一样现在就要扮演一个能够团结起全国各地活动小组的全国政治报的角色。这是因为现阶段中国根本还不存在什么马列毛主义者和工人们相结合的活动小组。我们还在 1895 年之前，我们尚未建立“彼得格勒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既然没有什么成熟的线下组织可以团结，那么现在也就自然不会有“火星报”，我们只是要促进我国的马列毛主义者往这个方面发展，从一个更基础的地方开始步步做起；从这点看，以叛徒“米宁”为代表的那些机会主义者前几年搞的什么“全华政治报”是非常奇异搞笑的存在。诚然，布站的马列毛主义者们也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这很多方面的工作上，他们都曾经是我们的老师。布站老管理们的不少判断（例如那“五个基本判断”）都是至少十年前做出的了，这些判断在当时大多是非常深刻的，有的内容放在今天都极具价值，而有的地方在今天却显得过时了，例如将当下的中国判定为所谓的“二流帝国主义”（实际上，我们认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仅次于美帝国主义的强大帝国主义国家，是目前唯一有野心又有能力同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势力）。在有的问题上，布站的同志们又谈的太少了，例如台湾问题和女性解放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等等。并且布站的老管理们如今还犯了许多致命的错误，如：提出了完全错误的线下组织工作路线，恶劣的诋毁我国其他革命组织，在一些行为上故意的阻碍和破坏我国目前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的线下组织工作，老管理们其在布站组织内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问题严重的伤害了许多优秀的革命分子和革命工作者们，用错误的路线影响群众等等。这些错误使我们不得不开始批判，但我们也不否认布站以前的历史成绩，不否认布站其他优秀的同志，不否认布站现在还在起正面作用的革命工作，不否认其他受其影响的还很有革命意愿的进步人士。我们目前要求批判布站老管理们现在的种种严重的机会主义行径和要求布站改正其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我们希望布站的老管理们能迅速认识错误改过自新，我们也希望布站的其他同志们和受其影响的人士们能认识到问题，和我们一起团结起来批判其严重的机会主义、帮助其改正错误、克服其错误影响等等。

现在我们的经验确实十分有限，对于很多问题不可能现在就能做出非常完备和严谨的分析与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连一些最初步的分析与判断也做不到，在这点上我们是希望能够超越我们曾经的老师的。虽说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将基本共识总结起来并尝试进行分析，但这绝不是说我们的杂志就只局限于什么“纯粹的理论分析”。实际上，哪怕是最好的东西，哪怕是马列毛主义的理论，一旦脱离了社会现实就变成了空中楼阁。因此我们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是我们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对现实的具体情况所进行的分析。当然，我们还需

要全国优秀的马列毛主义同志和先进群众们的参与与帮助。除此之外，我们也试图使我们的内容能切实的帮助到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使它能对我国的革命工作者们能起到现实的有益帮助。

并且我们除了这个刊物本身的作用外。我们革社也希望通过中国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等方式来团结起我国优秀的革命组织和革命分子，以更好的斗争各种机会主义和纠正我国革命力量的各种错误；并竭力推动我国革命工作的发展，努力消除那些种种阻碍我国革命事业前进的阻力；并能在这样的不断团结、不断消灭机会主义和错误、不断发展革命工作的过程中逐步的建立起我国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对于未未来具体会发生什么，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对此我们只有两句话可说：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如果要持续阅读我们的作品，请联系我们在下面段落标注的邮箱地址，发送“订阅”的内容。

如果是有意见或问题、以及有投稿或其他事情的读者也请通过邮箱联系我们，我们会尽力回复。（当然如果是恶意破坏的行为或有安全风险我们则不会回复。）

我们的邮箱地址：RSF-kan@tutanota.com

对读者朋友们的提醒：请大家使用非国内的、相对安全的邮箱来联系我们或当作接收我们订阅的邮箱。如 Protonmail、Tutanota、Gmail 等。如果使用国内邮箱来联系我们并作为接收刊物的邮件，则不能确保信息的安全性，可能会被反动派官方审查。如 qq、163 等邮箱。出于对同志们安全的考量，我们也不会接受来自国内邮箱的订阅，也不会回复联系，还请理解。

并且，读者朋友们如要向革社（RSF）进行投稿或者有其他事情需要联系我们的，请通过邮箱以邮箱文本的形式发送给我们。请不要向我们发送文件、文档等一切形式的附件以及各种链接，为避免安全隐患，我们不会接收附件，也不会打开任何链接。

第一部分 理论阵地

第一部分是本刊物最重要的部分。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革命的理论是我们革命运动中主观力量的精神条件，是我们政治路线的直接体现，也是革命的灵魂所在。我们在这部分集中创作或整编了一些其他国内外同志的优秀文章，用来丰富我们的内容和我们的思想。对于推动我国大部分马列毛主义者和其他进步群众们的理论成长，以及指导目前我国各种早期幼年的进步组织的基本路线和发展方法有重要意义。

由于读者和同志们的要求、建议，以及我们的实际工作的需要。我们目前把该部分重心转到了组织建设方面的内容。

马列毛主义反对贡萨罗主义

革社（RSF）编辑部

众所周知，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和贡派间的争论由来已久。在过去，我们的交锋主要在国内公开平台上。去年知乎上一位名叫龚格晟的“理论大师”出了一篇名为《驳国内某些人对各国马列毛主义者的攻击》的文章。当时知乎上受到此文攻击的“无弋爰剑”同志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回应这篇“大作”。后来这场争论没有进一步引发更多的讨论，因此也就没有引起更大的影响。事情本来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但不料现在这篇文章又被墙外秘密平台上的贡派给搬出来大肆宣扬。考虑到此文涉及的范围极广（不过它的实际内容少得可怜），基本把贡派爱说的那些口号式话术都覆盖了，还确实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因此我认为这篇文章是值得我们回击的。此外，一些长期观察研究贡派的同志和朋友也很早就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为使新人免遭蛊惑，更为提升大家对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的掌握水平，这些同志也希望我们能够回应此文，而我显然没有理由拒绝他们。

虽说我这篇文章主要是论战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把主动权拱手让人，完全被对方的行文逻辑牵着鼻子走。相反，我将尝试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出发，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与逻辑演绎中来全面地批判这篇国内贡派的“理论杰作”。考虑龚先生的文章是2021年写的了，许多情况与今天有变，而且我们也不是原本龚先生论战的对象，因此我们在本文中就仅限于讨论一般的理论问题，而不细究当时的具体矛盾与事件。

无产阶级革命党与群众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这点上类似于十月革命前，但在许多方面又有巨大的不同，这点我们后面会细说），今天的中国则是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法西斯式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个世纪，全球都将经历暴风雨般的革命狂潮洗礼；作为人类工业心脏的中国，更是必须要，而且是必然要经历一场最为猛烈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对于这点，任何自称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不论其真伪，至少在口头上都是认同的（这里我们也不需要论证革命的必要性）。那么既然我们明确了世界需要革命，中国又尤其需要一场大革命这个基本点，那么接下来的一切，就必然围绕着如何把这场革命变为现实来展开讨论了。

即将到来的这场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要彻底摧毁一切既有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秩序的彻底大革命，自然是要由现代大工业中诞生的最进步的阶级——现代工人阶级来领导的。

工人们要想实现自己的上述目的，就必然要与武装到牙齿的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对抗。如果工人阶级没法把自己，甚至整个社会的全体劳动者最大程度的动员组织起来的话，那么这样的斗争自然是毫无希望的。而要实现如此庞大的社会动员组织工作才能进行的一场革命，一定是自觉的革命。通俗的讲，即将到来的这场大革命是一场分工明确，组织严密，攻防顺势的大型社会运动。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群能够把握住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的动态变化，并且能够不断宣传、教育、组织劳动者的人来推动工人阶级事业。这样的人所组成的团队，我们就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党。受制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群众在各方面受到的系统性压迫异化，上述那种觉悟的人，既共产主义者（今天也可以称为马列毛主义者）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必然只是少部分人；但正是这关键的有组织少数，才能帮助工人阶级朝着社会主义不断前进。（有些庸人根据这点来指责我们搞寡头政治，但我很好奇他们打算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组织动员整个社会的劳动者？还是说他们实际上攻击的是无产阶级的组织性本身？）对于这点，列宁讲到：“在资本主义时代，在工人群众不断遭受剥削而不能发展人的各种才能的时代，工人政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只能包括本阶级的少数。政党所能吸收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正如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也只占全体工人的少数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只有这觉悟的少数才能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引导他们前进。如果坦纳同志说他反对政党，但同时又主张由少数最有组织最革命的工人给整个无产阶级指点道路，那我以为，我们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分歧。有组织的少数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少数是真正觉悟的，如果它能引导群众前进，如果它有能力强解决提到日程上来的每个问题，那么，它实质上就是政党。”直到这里，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由无产阶级革命党来领导推动这点上，我们同贡派至少在口头上都还是一致的。但一旦我们将目光投向如何建立一个合格的工人政党，以及党如何领导群众前进这样的具体问题时，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表面上的一致，就如同小人眼中的巨人美女的脸一般，千疮百孔，破烂无比，不可近观。

在贡派看来，理想的革命组织图景应该是这样的：首先是一个居于一切中心的伟大领袖（圆心），然后是三个同心圆，从内到外分别是“共产党”、“人民游击队”和“统一战线”。多么天才的设计啊！只可惜这幅美丽的设计图抛下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应该从何着手建立起这三个完美的同心圆？现在我们假设“同心圆建党理论是正确的”这个命题为真。那么既然伟大领袖处于一切的中心，全部的东西都围着他/她转，我们自然首先就应该搞明白这个人是如何产生的，进而才能解决其他一切问题。我们的龚大师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他直接引用了秘共的《政治总路线》中的以下妙论“在所有革命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斗争，特别是扩大了无产阶级不可放弃的阶级利益的共产党的斗争，产生了一批领导人和具有公认的权威与影响力的主要的代表与领袖。由于历史的必然性和因果关系，在现实中已经产生了党与革命的领袖贡萨罗主席。”“历史的必然性和因果关系！”完美的逻辑论证！就像郭继承大师说的宇宙万法的本源是“如如”一样无懈可击！

要知道，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非常现实、非常具体的问题，既如何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及其外围组织的问题，按照贡派和秘鲁党的逻辑，我们自然应该首先考虑位于一切中心的伟大领袖从何而来，结果到了这里，秘鲁党直接从具体的组织问题跳到了抽象的历史规律上。照此逻辑，我们还需要干什么呢？按照抽象的“历史必然性和因果关系”，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那么我们为何不直接回家睡大觉呢？我们只需要等待“历史必然性和因果关系”在现实中击败资本主义然后产生社会主义就可以了啊，何必冒着酷刑和失去生命的风险搞什么革命活动呢？（不过考虑到至少在中国，绝大多数贡派分子确实只会空谈，而不做任何实际工作，所以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还真的自洽了。）在解决具体现实问题时逃到抽象的历史规律上去丝毫不会推动解决问题的进程，相反，这只是在自我麻痹和逃避现实（靠酒精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甚至效果更好）；而迷信抽象历史规律的救赎，正是面对现实无能为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常服用的精神鸦片。

那么在我们中国革命社会主义者，以及全世界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看来，究竟应当如何建立起合格的工人先锋队？这个尖锐的现实问题我们必须严肃作答，但现在我们不得不暂时把它搁置一旁，先来探讨一番刚才已经开始讨论了的领袖问题。

龚先生写道“攻击者声称，‘贡派’对贡萨罗主席进行了不切实际的颂扬——把贡萨罗称为‘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世界上最伟大的马列毛主义者’等。攻击者指责这些颂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导致了夸大个人历史作用的历史唯心主义。攻击者对‘贡派’的指责表明了他自己才是不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人。”

我们的“逻辑大师”现在又给我们抛出了新的命题，既“把贡萨罗主席称为‘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世界上最伟大的马列毛主义者’等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为了证明这是个真命题，龚大师先是引用了斯大林的一段文字，只为强调“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这点我们根本不否认），然后又从《哲学小词典》上弄了一段话，告诉我们“只有伟大领袖才能认识全局，只要我们跟着伟大领袖走就战无不胜”，然后又引用了秘共那段奇妙的“历史的必然性和因果关系”来论证贡萨罗正是这样的伟大领袖。（到这里，命题的前提，既“称贡萨罗是伟大领袖”才刚刚被提出）接着又声称“印共（毛）的同志，一样把贡萨罗称为“秘鲁人民战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最后又通过举出苏联复辟和所谓“个人权威过大”关系不大的事例子，以及“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给江青同志的信中强调不能通过‘反对个人崇拜’给群众泼冷水”从而完成了他的全部论证。你看多么完美的逻辑链啊！真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啊！但我们就打算凑近看看龚大师到底卖的什么药。

首先，我们来看看大师引用的斯大林的那段话。那段话是斯大林和一位叫艾米尔·路德希维的德国作家交流时说的。当时路德希维问道：“马克思主义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卓越作用。而你毕竟还承认历史人物的卓越作用。你不认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你的见解之间是有矛盾的吗？”随后斯大林回答到：“不，这里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们创造历史的话。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么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诃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的时候，他们才能创造历史。至少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是这样了解马克思的。而我们研究马克思已经不止十年了。”

现在看来我们的“逻辑学大师”龚先生实际上还是一位“裁缝专家”，他一眼就抓住了斯大林这一长段文字里中间那句“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这个结论（在龚先生的引用里，他直接把这段话放在了开头）。但不幸的是，当他的身份切换为皇家大裁缝后，他居然忘记了自己在逻辑学上的全部造诣，他现在只是专注于裁剪作为逻辑学家的自己所需要的材料和结论，而完全忽视了支撑结论成立的那些必要前提和具体条件。

请大裁缝先生注意了，正是在你引用的这段话里，斯大林明确指出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肯定杰出历史人物的作用的前提是“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这里说的“条件”，显然指的是整个社会内，各个阶级和阶层间动态变化的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否则还能是指什么呢？）。而一个人自然只有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清晰的认识到这一系列矛盾，并把握住其中的一切有利于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机会点，让工人们看到自己才是代表工人利益的人，这样才有可能成为群众领袖。具体到如何获得权威，成为群众领袖这点，《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一文总结的很好“只要群众真正开始为了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参加斗争时，他们就会在斗争中走向共产党所指示的道路上来。我虽然是领导着群众，然而我依然是群众中的一员，我决不提出群众现在还不能了解与不能接受的主张。如果我能够这样做，虽是统治阶级还可能利用共产党的罪名来逮捕我，但是，因为我是群众中的领袖，所以群众一定会起来进行反对敌人逮捕我的斗争。他们拥护我，不是因为我是‘共产党’，而是因为我是他们的‘头子’。”事实上，斯大林本人的观点也是这样的；而且就在大裁缝先生截取的这段材料的下一段中斯大林就谈到了“马克思主义从

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要有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附带条件。”至于贡派有没有关注这些必要的附带条件，这就说不清楚了。我只知道斯大林接下来又补充到“你刚才问我，在我们这里是否由一个人决定一切。我们的工人现在决不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个人专断。在我们这里，最有威望的人只要不再得到工人群众的信任，只要失去了和工人群众的联系，就会完全垮台，就会一钱不值。普列汉诺夫曾经享有非常高的威望。结果怎样呢？一旦他在政治上跛了脚，工人就把他忘记了，就离开他并且把他忘记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也曾享有很大的威望，当然远不如普列汉诺夫那样。结果怎样呢？一旦他离开了工人，工人就把他忘记了。”显然，根据斯大林的观点，如果某个重要人物没能继续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话，那么这人就会自动丧失他/她在群众中的绝大部分影响力，更不用谈继续做阶级的领袖了。不过斯大林同志本人虽说在理论上是很清楚领袖和群众的关系的，但他在实践中还是出过差错，毛主席就这点谈到“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支部和群众之上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和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做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能够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引出教训，而使用这些错误不致变为全国范围的和长时期的严重错误。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上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决定。”

总之，在我们看来，革命的领袖首先应该是群众的领袖，而要成为群众领袖和维持这一身份都是要有一定具体条件的。（长期向群众展示自己的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坚定的阶级立场、贯彻群众路线、善于随机应变，把握时机等等）既然如此，又何谈是某个领袖是“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呢？又何谈“由于历史的必然性和因果关系，在现实中已经产生了党与革命的领袖贡萨罗主席”呢？如果贡萨罗同志和其他秘鲁革命者没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坚决和修正主义的老秘共决裂，并把握住绝佳的革命危机发动持久人民战争的话，今天又有谁会关注某个南美落后国家的党和它曾经的某位主席呢？

至于说印共（毛）“一样把贡萨罗称为‘秘鲁人民战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其实是大师自找没趣。首先，大裁缝截取的这段话来自于一个不知名的贡派网站，而上面除了提到这段话外，并没有给出可靠的出处，我也实在没有找到印度党这样的说法。其次，我们的裁缝先生完全无视了印度同志关于贡萨罗思想这种提法的一贯意见。例如，早在2006年，

印共（毛）就做过以下极好的发言：“国际共运诞生过许多优秀人物，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甚至想把自己的作品作为普遍真理后缀于马列主义。他们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应用到了本国的革命实践。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新的规律并且在应用它们于革命实践之后被证明为正确，只有到那时它们才能获得普遍性的意义并且能被看作这一理论（马列毛主义）的发展。成功运用并不是发展。所有的发展（也包括思想的发展）都将经历一个从量的演进到质的飞跃的过程。因此，给这一发展过程贴上“思想”、“道路”的标签是没有必要的。除此之外，如秘鲁的经验所表明的，尽管贡萨罗同志做出了巨大贡献，当运动遭遇到大挫折，甚至他目前的角色都存在争议的时候，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因此，这种情况也会在任何其他国家发生。因此，没有必要因为在他们的国家已经取得一些初步的成功就不适当地急于在马列毛主义后面加上一些后缀或者是其他的评价来赞美某些个人。毛主义政党断言他们领袖的思想、道路具备普遍的意义甚至还会有更多的问题。这意味要在马列毛主义的发展方面对别的兄弟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自己的评价。这会增加分歧并可能导致不团结。”

（<https://maozhuyi.home.blog/2020/07/31/>）再次，把贡萨罗称为“秘鲁人民战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这个说法本身问题不大，就像我们也可以说“奥古斯都·倍倍尔同志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除非这里指的“领袖”有且只有一位。退一万步讲，哪怕印共（毛）真的认同大师的说法，我们难道就要把他们的话当《圣经》吗？

接下来龚裁缝又列出了《哲学小词典》和《光明日报》中那些美丽的口号，但我认为这些实在是没有分析的价值。因为“大师”这次已经通过律令直接取得了“全胜”。既然他已经直接把一本教科书和报纸中的口号钦定为全中国革命者（我等反动派自然已被除籍）普遍认同的真理了，我们也就只好乖乖顺从了。不过我还是很好奇，既然中国革命者一贯都遵从《光明日报》所说的路线，既“‘按既定方针办’（这是毛泽东的遗嘱——本文作者注）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只要我们按毛主席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那么为何最后我们却会输的一无所有？现在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错了，毛主义实际上是荒谬的。要么是这段话实际上宣传性大于理论性，口号的作用大于实际宣传组织的作用；因此其观点能否落实，甚至其观点本身都是无法保证的，而不能等同于马列毛主义一般原理或客观实际。究竟那种可能性更符合客观实际，我留给读者自行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我刚才其实已经把“伟大领袖”和“党的领袖”这样的词给“偷换”为“群众的领袖”了，这样的提法我们在贡派那里是几乎听不到的。我之所以这么提无非是因为任何一位对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略知一二的同志都清楚我们的运动，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

与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导致的群众运动的产物。当我们从宏观的历史参照系来观察无产阶级革命党的话，我们会发现它实际上是自觉的无产阶级斗争的产物，也就是卢森堡所说的，“意识到斗争的历史后果的现代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体现。”这也就意味着，实际上它的真正领袖正是群众自己。因此，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任何具体领袖，无论其是否伟大，首先都必须首先是群众的领袖，是劳动者的“头儿”。而任何成为人民领袖的人，就其一般性而言，都不是靠抽象的历史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抽象的概念实际上是“事后”总结出来的）获得群众信任的，而是在具体的、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取得权威；换言之也就是在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一般性原则运用到特定的环境中逐步成为领袖的。毕竟，人必须要通过实践同客观物质世界互动，才能产生正确的主观认识。某个个体要掌握大量对于运动的正确认识进而成长为阶级的领袖自然也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否则我们为什么不去信仰“主体思想”呢？）毛主席就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这个问题谈到：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具体到贡萨罗本人和秘鲁共产党，我们从不否认他们对秘鲁革命和国际共运的伟大贡献。但这和龚大师所说那种贡献和地位在程度上是很不同的。在大师看来把“贡萨罗称为‘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世界上最伟大的马列毛主义者’等”是合理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而在我们看来，贡萨罗只是上世纪末秘鲁革命和党的领袖和国际共运的杰出人物（用“领袖”这个词在这里也无妨）之一。我们下面就来详细的来处理这个问题。

论评价贡萨罗同志的问题

以下是逻辑学家评价贡萨罗的文段：

贡萨罗思想是把毛主义应用于秘鲁而产生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的作用是指导秘鲁的革命。随着人民战争的发展，贡萨罗也根据秘鲁的革命经验总结了一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如党的军事化理论、官僚资本主义理论等。但是，这并不表示‘贡萨罗思想’这一概念本身具有了普遍适用性。秘鲁共产党使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主要是贡萨罗思想’一词，而其他国家的同志在目前则只使用‘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以及贡萨罗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贡献’的一词，一般不用‘贡萨罗思想’。一些文章把‘贡萨罗思想’本身也作为普遍适用理论，这种用法严格来说是不正确的。

第二，毛主义离不开贡萨罗的贡献。正如前文所说，中国共产党未能有效总结毛主义（或“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而秘鲁共产党首先总结了毛主义，并系统解释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的普遍适用性。贡萨罗重申了毛主义中的一些重要的而在过去被人忽视的理论，包括持久人民战争、革命的三个工具、三个世界、官僚资本主义等，并驳斥了修正主义者对毛泽东理论的歪曲。贡萨罗对毛主义的作用，类似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作用。否认贡萨罗对毛主义的贡献的人，往往不承认毛主义中的一些基本内容，这不是偶然的。当今，各国的先进的革命者（包括秘鲁、土耳其、巴西以及其他美洲、欧洲各国的革命者）已经普遍承认贡萨罗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贡献，只有少数国家的革命者对此还有所犹豫。

我知道以上引用的这一长段龚大师枯燥乏味的文字多少会令读者感到厌烦，而且如果考虑到这么长的文字实际信息密度又那么低的事实，哪怕换做是我自己，平时估计也不会去细读。但因为这段内容涉及到了贡派为何称贡萨罗为第六导师、贡萨罗总结了什么和贡萨罗与毛主义的关联等贡派时常挂在嘴边的关键问题，所以我也毫无办法，只能来细品这颗酸果。对此我也只能表示遗憾。

在如何评价贡萨罗同志的问题上，我们“惊喜地”发现龚大师除了擅于逻辑学和裁缝工艺外，在撰写小说方面和语言学领域也有非凡的天赋。他一开始就认为我们把“把‘主要是毛主义’等同于‘主要是贡萨罗思想’”，但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没人有过这个提法，我们压根就

不怎么关注名称的问题；反倒是可爱的‘马列毛主义者，主要是毛主义者’自己，明明天天把贡萨罗和他所谓的“普适贡献”挂在嘴边，到头来却还极为反感“贡派”这个称谓；在这点上他们还不如托派分子坦诚；人家好歹公开承认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而不会到处要求别人称呼他们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要是列宁主义者”。

后面大师给出了为何他们如此高看贡萨罗的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主要讲的是贡萨罗在创造性地将马列毛主义运用于本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贡萨罗思想”。

诚然贡萨罗确实是把马列毛主义创造性的运用在秘鲁革命中了，但要知道的是，在过去一百七十多年的国际共运史中，工人阶级曾经拥有过许多杰出的领袖，假如我们根据这点称呼贡萨罗为第六导师和伟大领袖，甚至是“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将同样的殊荣给予倍倍尔、片山潜、卢森堡、葛兰西、福斯特或者台尔曼同志呢？他们哪位不曾是自己国家运动的领袖？他们哪位不和贡萨罗一样，才华横溢，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运用于本国革命运动，为工人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但最后却遗憾离场呢？如果我们能随便把某个人物的名字加入到指导思想的后边，那么很快我们将得到类似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弗兰肯斯坦式理论。

其次，按照秘鲁共产党和贡派的逻辑，假如我们只要创造性的将某一理论（普遍真“理”）应用于每一次具体条件就能够逐渐产生新的思想的话，那么我想只要龚大师今天“创造性地”运用 $F=ma$ （牛顿第一定律公式）来计算街边汽车的加速度(a)，明天再“创造性地”运用它来计算雨滴的质量(m)，后天再计算自己走路时所受到的合力(F)；那么用不了多久，龚大师就有望成为和艾萨克·牛顿齐名的伟大科学家了，至少也得把牛顿第一定律改写成“牛顿第一定律，龚格晟思想”才行，否则龚大师不就走向反面，变成反对秘共路线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了吗？

大师的第二点理由是说的贡萨罗总结和系统化了毛主义，没有他的贡献就没有毛主义，因此贡萨罗功劳巨大，值得被称为“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

大师写道“正如前文所说，中国共产党未能有效总结毛主义（或‘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

大师在前文中是这么说的“由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列主义第三阶段的提法，毛主义直到 1976 年仍然是没有被准确定义和总结的……在 1976 年以秘鲁共产党谴责了中国的修正主义政变，并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1982 年，秘鲁共产党首先

提出了马列毛主义的概念，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以毛主义指导的政党……在秘鲁共产党的影响下，各国的革命者普遍接受了毛主义的概念”。

关于某种理论究竟该如何称呼这样的问题我们是毫无兴趣的，就像重命名文件并不会改变其中的任何内容。（除非某种提法本身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比如布尔什维克当初放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号，就主要是因为同样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孟什维克和西欧各党已经在革命群众中臭名昭著了）我们主要关注理论的具体内容。假如大师所言不虚，中共和毛主席真的没能“准确定义和总结毛主义的话，那么中国革命究竟是在什么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呢？不完善的、半成品式的毛主义？诚然，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在实践-理论-实践的无限循环中不断螺旋上升的。但这是否就意味着直到1976年的毛主义都是半成品？然后直到1982年依靠远在秘鲁的贡萨罗天神下凡才完成了这一工作？是否意味着各国革命者都是靠着贡萨罗才普遍接受毛主义的提法的？我可以预先告诉大家，答案全是否定的。

现在我们同贡派还有一个共识，我们都认为毛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是更高的第三阶段，但分歧在于，贡派之所以这么提，是因为他们认为“贡萨罗重申了毛主义中的一些重要的而在过去被人忽视的理论，包括持久人民战争、革命的三个工具、三个世界、官僚资本主义等，并驳斥了修正主义者对毛泽东理论的歪曲。贡萨罗对毛主义的作用，类似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作用。”这场大师又抛给了我们两个理由，但这次为了行文简便，我们首先来谈谈他的第二个理由。

我们首先来谈谈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由马恩两人共同创立的，这点人尽皆知。在理论上，马克思本人对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马克思发现并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的分析方法；第二，马克思用毕生精力创作的《资本论》从最简单的商品流通开始，全面研究分析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正是他的这本著作，第一次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为工人阶级的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第三，马克思通过研究1848革命到巴黎公社的一系列革命与反革命，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主要是在哲学领域，他撰写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和晚年的一些通信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关于全部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关于历史发展的合力论等，都是恩格斯提出来的。至于贡萨罗的哪本著作研究开创性的提出了可以和恩格斯在理论上相提并论的贡献，我们是不知道的。而且，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本就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们且不谈早年两人的交际，至少当恩格斯退出公司事务后，他也搬去了伦敦，在这种情况下，两位导师是可以经常交换意见的。像《反杜林论》这样的著作就是正在马克思的全力支持下写的。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更是停下了自己的科研工作，与马克思的女儿以及考茨基（贡派“同志们”请注意这个名字！你们看“反革命逆流”已经

公开提考茨基了，赶快再写篇文章批判一番！）等人合作整理出版了大量马克思遗稿。正是以上这一切（而且我只是谈的理论方面，实际上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国际工人运动的实际工作上，特别是在社会党国际初期的组织建设工作上也有巨大的贡献，但这里就不方便再展开了。）至于贡萨罗同志，他虽然来过中国，但根据他本人在采访中所说，他既没有见过毛主席，也没有考察多久具体的中国革命实践。更别说他本人甚至压根不会汉语，他自己也承认流传到拉美的中国资料太少（如果我印象没错的话是在谈到“50-100年”这个问题背后的原理时说的），这恐怕与恩格斯的情况是很不同的吧。

而且，虽然恩格斯本身也是一位天才理论家，但他是非常谦虚的，正如他在全面探讨社会主义理论的《反杜林论》中所说“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种阐述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马克思写的。”恩格斯哪怕在马克思去世后，都不止一次表述过“马克思是人类的天才，而我们最多只是能者”这样的观点。他还说过“我高兴我有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提琴手”，而始终谦逊地自称是“第二提琴手”。而绝不会自称为“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更不会允许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自己吹捧到如此高度。

接下来我们发现自己不幸被龚大师带到了斯大林问题，这个众说纷纭，难以一概而论的地方。我也没有意愿，更没有能力在我这几张小破文的夹缝里完成全面评价斯大林同志的工作，但还是可以借助别人的工作来谈谈斯大林对于列宁主义的意义的。同样还是在裁缝先生刚刚裁剪的那段材料里，我们在“废料”中发现了斯大林的这段话“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斯大林这么说难道是因为他德不配位，心生惭愧吗？不是的，显然不是的。事实上，他是一位极为罕见的杰出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位天才领袖。中共就曾高度评价斯大林的一生功绩：

斯大林，当列宁在世的时候，他曾经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在参加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领导以后，曾经为准备一九一七年革命进行了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进行了斗争。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国内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斯大林，他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斯大林，他领导的苏联党和政府，从总的方面

来说，实行了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巨大的援助。斯大林，他站在历史潮流的最前面指导斗争，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斯大林的活动，是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

以上观点我们是完全认可的，斯大林确实无愧为“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在创造性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本国实际方面，我们相信他的成就哪怕以最苛刻、最极端地标准计量，也是不会逊色于贡萨罗同志在秘鲁取得的功绩的。但他却和恩格斯一样，从来没有想过自称为“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斯大林也从未提出过类似于“贡萨罗思想、贡萨罗的普适贡献“这样的东西，倒是托派分子经常用”斯大林主义“这个词来攻击斯大林同志所一贯遵守和发扬的马列主义原则。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大师说的“贡萨罗对毛主义的作用，类似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作用。”我只感到莫名的好笑。无论是恩格斯，还是斯大林（甚至包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本人）他们所作出的贡献都要远大于贡萨罗，但却从未接受过，甚至还明确反对“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这种自娱自乐的提法。秘鲁党和贡萨罗当初这么提，本就是他们的过错。我不知道这样吹捧贡萨罗对国际共运，甚至仅仅是对秘鲁革命本身有何益处。这完全是对革命百害而无一利的做法。秘鲁革命最后遭受的失败就是这点最好的明证！我写完这段话的时候突然感到全身一震，我仿佛看到了贡派“朋友”站在我面前，指着我的鼻子，歇斯底里地喊道“污蔑！秘鲁革命还没有失败！秘鲁革命经历的重大挫折主要是因为贡萨罗主席和中央委员会被捕这样的偶然事件！要是还有贡萨罗主席领导的话，革命早就成功了！”一想到这样的场景，我就吓得魂不守舍，恨不得马上找个地方躲起来，我看我就躲在孟德斯鸠的背后吧。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说过：“如果一场特定战争这样的偶然因素可以让一个国家灭亡，那么必然存在一个必然因素，使这个国家会在一场战争中灭亡。”我认为，以上说法稍微改一下名词也完全适用于描述一场革命失败的偶然性与必然性间的联系。（实际上“革命”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战争，但我可不是指的“持久人民战争适用于一切革命”，而是想说“革命”本质上和“战争”相同，都是阶级斗争的最完全展开形式，是高度抽象化了的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对抗）现在我们只需要指出为何过度夸大贡萨罗同志的贡献与历史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崇拜是秘鲁革命在90年代遭受“重大挫折”的必然因素之一（注意是“之一”）就可以了。

在我们看来，假如某个个体的存在本身足以保证革命的胜利，乃至实现共产主义的话。那么这样的个体就已经变成上帝了。因为它不可能犯错，它不可能有任何一点瑕疵。照此逻辑，要是有人反对，甚至仅仅是不完全认同它的某个观点的话，那么就等同于是在反对革命和共产主义本身。正是因为这样的谬误，秘鲁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受到了严重制约，组织的纠错机制被严重破坏，使得党对于敌人策略的转变反应迟缓，最终铸成大祸。

论十月革命策略

贡派认为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而且没有贡萨罗就没有毛主义，没有秘鲁党的影响，其他人就不会接受毛主义。刚才，我们已经详细论证了龚大师证明以上观点的其中一个分论点，既称“贡萨罗对毛主义的作用，类似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作用”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回头来处理剩下一个论点，既大师所说的“贡萨罗重申了毛主义中的一些重要的而在过去被人忽视的理论，包括持久人民战争、革命的三个工具、三个世界、官僚资本主义等。”但是由于这四个问题每一个都很大，而且还没有逻辑上的较强联系，因此我们将回到自己的行文逻辑上，主要谈谈革命策略的问题。

总的而言，目前我们已知的、经过实践检验的革命战略只有两种，分别是适用于落后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持久人民战争策略，以及适用于工业化国家社会主要革命的十月革命策略。贡派和我们一个极大的分歧就在这里了，在他们眼中，持久人民战争策略是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情况的，甚至还恬不知耻地指责我们说“各国的毛主义者已经系统分析了为什么持久人民战争道路是符合帝国主义国家革命的道路，而攻击者并未对各国毛主义者的核心论据做出任何严肃的批判。”看来龚裁缝已经能够自动无视国内外那么多批判贡派的文献资料了，还好意思说我们回避他们的核心论据。我们现在就把他那所谓的“核心论据”拖出来看看。

以下就是所谓的核心论据：

- 一、积累力量-合法主义战略在（至少）八十年里没有产出任何革命，连在这段时间里接近颠覆一个资产阶级政权都没有过。
- 二、人民战争策略产出了许多革命，成为了数个大洲的许多反动国家的主要威胁。
- 三、长期合法积累力量的战略在实践上和改良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实践是一样的。它不能锻炼革命领袖、干部、活动家或者群众来准备用革命暴力掌握政权。
- 四、这个战略给 NGO 主义的资本主义工作方法，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官僚工作方法，和部长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工作方法铺平了道路。
- 五、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可以应用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战争，正如我们可以在爱尔兰和巴斯克的解放战争中部分（不是全部！）观察到的那样。
- 六、在毛泽东解释的人民战争的照耀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二战时期欧洲的反法西斯抵抗的经验——比如说，在法国和挪威等国，在纳粹占领和伪政府时期存在着持久的武装斗争。这表明了革命战争在存在高度控制和监视水平的工业化国家是可能的。
- 七、共产主义特遣队、红军派、红色旅等武装团体的存在证明了在帝国主义国家内开展武装斗争，甚至是存在几十年，而不被在军事上击败是可能的。
- 八、长期合法工作，积累力量的经验没有导向任何革命。它把无数的党和组织倒向了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或是直接解散。他们的干部和同情者越来越紧密地被整合进了旧社会和甚至是反动国家机关。

九、我们向着军事化社会前进。帝国主义国家越来越多地军事化，反动派更军事化了。
十、帝国主义政府向着法西斯主义发展，通过统合主义，削弱议会民主制，生长种族主义，更多的警察监视和国家暴力。
十一、选举被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多数看作是闹剧。大多数人对选举没有任何信心。
十二、旧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会失去了极大量成员，群众不相信工会领导。
十三、我们进入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未来的五十到一百年内扫除帝国主义，正如毛所说。
十四、大而复杂的是从小而简单的里发展起来的，通过战争才能学习战争。因此，革命战争必须从小到大，革命战士必须在持久的过程中通过战争学习战争。
十五、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里说的：“战争的动机越强大（……）战争就越接近其的抽象形式，越多地指向消灭敌人，军事和政治目的更加重合，战争会似乎更加是纯粹军事而更少是政治。”有什么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更强大的战争动机吗？这产生的是更多战争，更多持久的战争，而不是快速和有限的战争。”

我们的读者真是极为不幸，不得不和我一起来分析挪威贡派的十五条胡言。

第一条贡派就在玩弄逻辑游戏。长时间内没有人运用某种策略取得国家政权是否意味着某种策略本身不可靠？这里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就像长时间人类没有登月，并不意味着过去执导过阿波罗登月的理论是错误的，更不意味着人类没能力登月一样。根据一般的逻辑，只要人们曾运用某种策略取得过哪怕一次成功，这件事本身都足以证明运用这种策略取得成功是具有可能性的，而任何可能性和偶然性的背后必然有一定的必然性；具体到运用十月革命策略，这里的必然性，首先指的就是需要建立一个与群众有深刻联系的无产阶级革命党。而过去半个多世纪里，革命没能在工业化国家取胜的问题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运动（从韩国到美国）甚至几乎连总的革命策略都没有吗，更不用说有没有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党了。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是缺乏胜利的必然性的。现在贡派不去反思为什么这些国家的革命派没能好好运用十月革命策略，反倒还怪策略本身不可靠，真是荒谬至极。

对第二点我都不知道如何评判。要知道“持久人民战争策略”它本身是一种策略，是革命运动的宏观指导路线；而一种宏观指导路线本身无法产生任何革命的，就像建筑设计理论本身无法建立大厦一样。而且老实说，历史上真正靠持久人民战争策略夺取全国政权的国家恐怕一只手就能数过来。（我这里没有丝毫攻击持久人战策略的意思）

从第三点，我们可以看出挪威贡派和龚大师对十月革命战略的理解就是“长期合法积累力量的战略”。看来事情已经弄到了这步田地，在贡派萎缩的大脑里，革命战略不是持久人民战争（暴力），就是长期合法积累力量（和平）。贡派小丑无法理解真正的十月革命策略需要革命者十年如一日地在群众（尤其是产业工人）中不断进行组织、宣传、教育工作，以不断提升群众和干部的阶级意识，锻炼群众和党的组织性，最后在革命危机爆发的时候凭借高度组织化的、相互配合的总起义来夺取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就此说到“我们一向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为了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善于把各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善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迅速地用一种斗争形式代替另一种斗争形式。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和平的与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合法的，议会的与群众的，国内的与国际的，等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

这个过程中，合法的与非合法的、暴力的与和平的、秘密的与公开的、国内的与国内的等等工作是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人员的具体情况交替进行的，绝非简单的“积累力量-合法主义战略”能够概括的，而且这个词本身甚至就是对十月革命策略和一切工业国的革命者与自觉的工人的污蔑。

马克思主义者对如何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革命的策略和具体战术做过大量分析，这样的分析从马克思时代到今天就没断过。列宁本人就曾经针对英国，这个毋庸置疑的发达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策略分析到：

在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坚持不断、始终不渝地利用议会选举，利用不列颠政府的爱尔兰政策、殖民地政策和全球性的帝国主义政策所遇到的波折，利用社会生活中其它一切领域、一切部门和一切方面，并且要在所有这些方面，用新的方式，用共产主义的方式，照第三国际那样而不是照第二国际那样来进行工作。在这里，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叙述“俄国式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参加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方法，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外国的共产党人说，这和通常的西欧议会活动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往往由此得出结论说：“是啊，那是在你们俄国，我们这里，议会活动却是另一个样子。”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世界上所以要有共产党人，第三国际在各国的拥护者，正是要在各个系统，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把旧的、社会党的、工联主义的、工团主义的议会工作，改造成新的、共产主义的议会工作。过去在我国的选举中，机会主义的和纯粹资产阶级的、专讲实利的、资本主义招摇撞骗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西欧和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学会创造一种新的、不寻常的、非机会主义的、不贪图禄位的议会活动，使共产党能够提出自己的口号，使真正的无产者能在没有组织的、备受压抑的贫民的帮助下传送和散发传单，走访工人住所，走访农村无产者和穷乡僻壤（好在欧洲大陆的穷乡僻壤比俄国要少得多，英国就更少）农民的茅舍，走进最下层的平民酒馆，进入真正的平民会社、团体，参加他们的临时集会，不用学者口吻（也不要太带议会腔）跟人民说话，丝毫不追求议会的“肥缺”，而是到处启发思想，发动群众，抓住资产阶级说过的话，利用资产阶级设立的机构，利用它规定的选举以及它向全体人民发出的号召，并使人民了解布尔什维主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下，除了选举期间，是从来没有这种机会的（大罢工当然例外，因为在大罢工时期，这样的全民鼓动机构在我国曾经更紧张地工作过）。在西欧和美国，要做这些事情是很困难的，是万分困难的，但这是可以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任务不花气力都是无法完成的，而气力必须花在完成日益多样化的、日益涉及社会生活各部门的、从资产阶级手中逐一夺取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实际任务上。

在英国，还应当军队中，在“本”国被压迫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如爱尔兰和各殖民地）中，按新的方式（不是按社会党的方式，而是按共产主义的方式，不是用改良办法，而是用革命办法）来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要知道，在整个帝国主义时代，尤其是在战后的今天，当各国人民受尽战争的煎熬而迅速地擦亮眼睛，认清了真相（真相就是：几千万人死亡和残废只是为了解决应由英国强盗还是德国强盗掠夺更多的国家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社会生活的所有这些领域都布满了易燃物，可以触发冲突和危机、激发阶级斗争的机会也特别多。目前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影响下，在一切国家中都有无数火星从各方面迸发出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知道，哪点星星之火能燃起熊熊之焰，就是说，能够彻底唤醒群众，因此我们必须本着我们新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去“耕耘”一切园地，甚至包括最陈腐的、臭气熏人的、看来毫无指望的园地，不然我们就将肩负不起自己的任务，不能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能掌握一切种类的武器，既不能准备好去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过去按自己的方式安排了各方面的社会生活，现在又按它自己的方式把它们破坏了），也不能准备好在战胜资产阶级之后按共产主义的方式去改造全部生活。

列宁已经讲的不能再清楚了，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者工作的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以帮助群众“认清真相”，最后“彻底唤醒群众”，从而赢得胜利。诚然在中国这样的法西斯国家里，是没有合法议会这个平台给我们利用的。但十月革命策略的基本原则，依旧是适用于一切工业国的。那就是共产主义者长期运用各种手段（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中，这些手段绝不是简单的“合法”或“暴力”几个字所能覆盖的）在群众中（包括军队中）不断进行组织、宣传、教育工作，就像病毒一样潜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每一处角落（这里我说的是在全社会中，而不只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中），最后在全社会面临革命危机时，通过高度组织起来的、相互配合的全国总起义在主要工业区夺得政权，然后再通过战争把工人政权扩展到全国。

后面的四到十五条几乎都建立在前三条的基础上，我是没有任何兴趣再逐个分析了，这里就略谈了。首先迷信抽象的历史力量，甚至相信“在未来的五十到一百年内扫除帝国主义”这

种承诺是无用的。毛主席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六十年代末，按照当时的形式发展下去，这个判断是没问题的，但后面发生了什么，世界革命是不是已经到了高歌猛进的战略进攻阶段这不是瞎子都看得清楚吗？至于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武装，现实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没有一个拥有过足以撼动资本主义政权的力量，而且往往规模极小，孤立无援，这点从西班牙到德国都是大同小异的。而爱尔兰革命进行的时候，爱尔兰本身并没有实现工业化，是各种意义上的殖民地国家，和现代的爱尔兰完全没有可比性。而二战法国、挪威那种完全处于外国占领下的情况，也自然是和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没有可比性的，是存在大量政治缝隙的。举出这几个例子只能说明挪威贡派和龚大师在历史学方面也同样造诣颇高。最后，如果挪威贡派一定要在挪威搞持久人民战争，搞工农武装割据，那么就自己放手去实践吧，只要不要像巴共（红）一样四十多年来一直处于“持久人民战争的准备阶段”就好。龚先生也可以在中国重建革命根据地嘛。在在这个问题上，我建议你和隔壁“红中网”的李民琪先生好好交流一下，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至少人家可是正经的规划过“川西革命根据地”的。而中国贡派，直到现在为止，在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上啥都没有提出，更没有任何实践。中国贡派在这两点上，甚至还不如早已腐烂的半外围论小丑。

这里我们再顺便解决一下贡派在军事理论史上的混乱。

贡派对于抽象暴力的依赖使他们非常倾心于“军事”，甚至不惜歪曲事实，说什么“毛主席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发展了人民战争理论，用人民战争打败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首先赋予了世界共产主义者自己的军事学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高的知识。”首先，我们需要搞清楚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我们不是军事专家，自然无法从军事专业的角度给出精确定义，但我们可以从政治上明确一点，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肯定是指导无产阶级的军事武装力量作战的理论。据我们所知，早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恩格斯就已经在考察 1848 年革命、巴黎公社和同时期各种资产阶级战争与革命的过程中提出了部分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即使这些都不算数，那么后来的俄国内战以及卫国战争又是在什么理论下进行，并取得胜利的呢？难道列宁、伏龙芝、斯大林和朱可夫实际上是在资产阶级军事理论或者不成熟的军事理论下，在近乎绝境中靠着运气取得内战和二战的胜利的？！难道毛主席研究的苏联军事理论实际上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贡派甚至连提都没提过。史实算什么？要知道伟大领袖贡萨罗主席可是亲口指示过“（毛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仅指出人民战争就足够了，因为有了毛主席，全世界无产者获得了充分发展的军事理论。”是的，对懒于思考的人，仅指出这点就足够他们永远崇拜下去了。

论持久人民战争策略

贡派声称持久人民战争策略是具有全球普适性的策略，而且是唯一可行的策略。如前文所述，他们不但把十月革命策略污蔑为所谓“和平积累策略”，甚至干脆否认十月革命策略与持久人民战争策略的本质不同，说什么“持久人民战争道路是符合帝国主义国家革命的道路”，甚至直接把十月革命本身都说成是持久人民战争策略指导下的革命。刚才我本以为在领袖和党的问题上，龚先生已经为自己赢得了逻辑和理论上全部的无知，没想到我还是低估了大师的功力了。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兴趣像讨论上个问题那样老实的从分析大师的论证逻辑开始，逐一考证每个分论点，相反，我们在这里将主要在正面论证中进行批判。

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下，世界上有一部分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被人为阻碍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之久。这里我们不去深究这一现象背后的原理，只需要知道，哪怕是在今天，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许多被压迫国家的经济中依旧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也就意味着，在那些社会中，劳动者的主体至少不是现代无产者；前现代的小农，和形式上居住在城市，但实际上脱离于社会化大生产的人（这种情况在拉美和非洲有些国家非常普遍）即使不是劳动者中的绝对多数，也占有极大的比例。

从持久人民战争的必要性讲：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夺取政权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把可以争取的阶级或阶层争取到革命的道路上来。要做到这点，首先就需要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灌输到革命队伍中去。我们认为，开展持久人民战争，对于实现这个目的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只有以无产阶级秩序和意识形态组织起来的人民武装的保护下、帮助下，革命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才有可能维持进行各种宣传、教育和组织的必要经济基础。只有在这种不断运动，终将遍及全国的革命战争的影响下，千百万原本一辈子都不出村的小农，才有可能被卷入夺取全国政权、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当中。

还有一点非常反常识的是，在持久人民战争中，人民军队中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人并不在火线上，而是在根据地中帮助群众进行生产活动、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服务与教育服务。没有这些活动的话，人民军队就难以和群众保持必要的政治经济联系，难以建立深厚的军民友谊，不能稳定的得到群众的补充和帮助，很容易就会堕落为一般割据武装。

从持久人民战争的可能性上讲，毛主席原本只是认为在旧中国那种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公共殖民地”里可以采用持久人战策略。因为在这种国家里“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换言之，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公共殖民地，政治空隙足够塞得下分散的、可长期存活的红色政权。至于政治空隙有多大才适用于持久人战策略，这在当时还不明朗，但反正中国是可以的。毛主席不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他当时才刚刚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提出持久人战理论，他自然和其他任何科学家（是的，共产主义者同样还是实践的社会科学家）一样，要严谨地规定新理论的适用范围。但后来，二战期间和战后印度支那与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解放运动证明了在单一帝国直接掌控的殖民地也是可以适用持久人民战争策略取得胜利的。在客观事实的支撑下，毛主席才修改了他在1928年仅根据中国经验得出的结论。而我们的龚先生却只知道抽象的空谈“毛泽东对人民战争的认识是有变化的，不能只通过他一时的认识来证明他对人民战争的整体看法”，却对为何会发生这种变化只字不谈，最后还根据这种在他那里完全抽象的“认识变化”推导出“持久人民战争道路也是符合帝国主义国家革命的道路的”。这一次，作为逻辑学大师的龚格晟和作为皇家大裁缝的龚格晟成功融为一体了！

论战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

包括龚大师在内的贡派“理论家”往往热衷于把十月革命策略歪曲为“持久人民战争”。他们的主要论点有两个，这两个论点大师都帮我们总结到位了：

命题一：1905-1907年的革命是人民战争的预演，在此时还没有成熟的开展人民战争的条件。1908-1916年是人民战争的准备时期，这一时期的斗争不只是“合法的”、“不流血的”斗争，相反，大批革命者在这一时期牺牲或被流放。

命题二：1917-1921年是通过人民战争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时期。

首先来看第一个命题。大师说1905年革命是人民战争的预演，而且当时“没有成熟的开展人民战争的条件”。那么在1905年之前是什么阶段？90年代的一系列大罢工是什么？预演的预演？而且我很好奇大师所认为的“开展人民战争的条件”究竟是说的什么东西？究竟是什么条件需要预演和准备十八年之久才能“成熟”？当然了，我们是非常理解贡派朋友的，毕竟目前全世界最大的贡派组织“巴西共产党（红线）”，从80年代成立至今，已经在准备持久人民战争的阶段待了四十多年了依旧一事无成。反观没那么先进的印度同志，从印共（马列）以及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是的，“毛主义”这个提法在印度早于秘鲁大约二十年，我想这一定是印度人遇到了穿越回去的秘共，受其影响才“普遍接受了毛主义的概念的”）

本身就是革命者在农民运动的高潮中建立的，是在实际组织人民武装的过程中建立的。如今，他们的后继组织印共（毛）已经在新世纪领导印度人民战争快 20 年了，而贡派组织到现在没有一个在进行普遍认可的人民战争的。由此可见，“积累力量-合法主义战略”搞不好是贡派朋友的自我介绍。

还有些贡派小朋友没有大师那么圆滑，他们直接说俄国人民战争从 1905 年就开始了，这就是明摆的荒谬了。任何战争，都必须要有交战双方的军队和组成战争的战役。那么请问贡派朋友，在 1905-1917 年间，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在哪里？如果有这支军队，那么它与敌军在什么地点、什么时候进行过什么战役？而且，我们假设 1905 年开始俄国真的爆发内战了，这个时候我们能想象作为党的领袖的列宁同志，居然在如此关键的时候跑到国外去隐居几十年吗？假如这样的话，我们该如何评价这样一位临阵脱逃的领袖呢？又该如何评价把这样一个人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甚至是俄国革命本身呢？

接着我们来看命题二，实际上这才是我们主要感兴趣的地方。贡派将十月革命说成是持久人战的主要依据就是 1917-1923 年间的俄国内战。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俄国内战与中国的持久人民战争在背景上有巨大的不同。列宁说得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无论是十月革命策略还是持久人战策略，本质上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都是为无产阶级（或以无产阶级为首的阶级联盟）为夺取政权服务的宏观方针。刚才我们在“论持久人民战争”一节其实已经暗示了一个事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战争及其配套的经济生产活动，是反动派专政下日常（相对于革命危机时期而言）开展各种宣传、组织工作的主要工具，也同时还是最终决战，夺取全国政权和保卫人民政权的主要斗争手段。而在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情况则非常不同。历史上，布尔什维克党在内战爆发以前，就已经通过全国各大城市相互配合的总起义以及武装总罢工，至少在以彼得堡和莫斯科为核心的主要工业区夺得政权了。到俄国内战爆发的时候，俄国压根没有任何一个阶级独享全国政权，事实上，那个时候的战争要解决的就是在各个阶级大乱斗的背景下，究竟最后那个阶级专政的问题。而考虑到工业国社会经济的特点，我们也很难想象这样的战争会持久进行。历史上，俄国内战的主要阶段不过只有短短三年，1921 年后几乎没啥大战役了；十一月革命起义后的德国内战就更短了，统共只持续了不到一年，不过斯巴达克派既没有在一开始争取到全国各地的苏维埃，到最后也没打赢内战。

做个不太恰当的类比，持久人民战争就像是一个弱小的人试图夺走一个壮汉手中的圣杯。这个弱小的人在夺取圣杯的过程中会逐渐成长，最终会将圣杯从壮汉手中彻底夺去。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战争则是圣杯的所有者突然爆体而亡后，从它的身体里炸出的各个阶级的代表互相厮杀，最终赢者捧杯，败者灭亡。

谈谈天才论和个人才能

革社（RSF）编辑部

在过去的中国，林彪曾提出过荒谬的天才论，这个观点在当时已经被批倒。而今天盲目崇拜林彪的国际左倾机会主义者们重新把这个观点抛了出来，国际上的贡萨罗派也在鼓吹着他们的伟大领袖理论。这两个观点的内容是大致相同的，很多时候甚至是同一批人在鼓吹，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跑到中国墙外左群里面的外国人，他们推崇林彪更崇拜贡萨罗，认为林彪的天才论简直是为伟大的贡萨罗主席量身定做的，这是他们伟大领袖提法的理论基础。当然，我们中国的贡派的特殊点就在于他们比外国人多了解一些中国历史，他们知道林彪不是什么好人物，所以自然就反对历史上的林彪观点。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当他们又把国际上的贡萨罗派的观点进口回中国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把换了皮的林彪机会主义观点又重新进口了回来。因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荒谬的历史现象：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出口转内销的二手机会主义；对于中国的贡萨罗派来说，就是把同一种机会主义尝了二遍，然后还要特别强调一下它和第一遍的不同。

所以本文第一段将大段引用历史材料来说明毛泽东和林彪及其天才论进行斗争的大致阶段和内容；第二段将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来比较全面的说明关于天才和才能问题的科学观点。

一.毛泽东同志与天才论的斗争

林彪的天才论是在1966年5月18日提出的，俗称“五·一八”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涉及天才论观点的主要有这些内容：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让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样，就能保证我们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最最根本的关键问题。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就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这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他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不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反动思想，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拉着革命倒退。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就冷嘲热骂，千方百计加以压制，加以攻击，加以反对。

.....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哪一点不同？一起搞斗争，有些人年龄比他老，我们没有他老，但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我看到很多人读书圈圈点点，把书都圈满了，证明他没有读懂，不知什么是中心，什么是主次。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规则，你也打不过庄则栋、徐寅生。打仗也一样，你懂一点书本上的军事知识，打的时候不一定能打胜利。毛泽东思想全部贯穿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我们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战备的需要，是彻底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那些坏家伙攻击我们是实用主义。这绝不是实用主义，是行之有效、符合实际的客观真理。什么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在他们看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就是真理，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就不是真理。我们抓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真理。如果不根据革命的需要去指导我们的行动，就必然犯大错误，必然要失败。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这些内容是国际上许多贡萨罗派所经常引用的内容，他们今天也是这样来吹嘘贡萨罗的。在中国，天才论的观点刚刚提出的时候的确骗了不少人，毛泽东同志当时由于需要和刘邓集团进行斗争的而借助林彪集团的力量时他的确没有公开站出来反对。对中国文革历史稍微有所

了解的人都知道，刘邓集团是在文革初期和文革以前最为强大的走资派集团，甚至毛泽东同志这个时期在北京都没有话语权。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他也必然要和林彪进行合作，但他同时也对林彪路线保留着深刻的意见。在1966年7月毛泽东同志给他的妻子江青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的实际观点：

我的朋友(按：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益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的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国全党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1966.7《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

可见对于天才的提法毛泽东同志本人是不信的，他清楚的认识到了天才论的各种错误。而从现实历史的发展出发也是不支持天才论观点的，在当时苏联的赫鲁晓夫早已全面的否定了斯大林，马列主义就已经被一系列修正主义共产党砸的粉碎了。他也清楚的认识到了林彪这么做也是为了利用他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和林彪及其天才论观点的第一次交锋是毛泽东同志占下风，是被动阶段。

而当刘邓集团已经被打倒，掌握了权势的林彪集团走向修正主义时，毛泽东同志就开始和他们进行了直接的斗争。从1970年开始毛泽东同志就对林彪集团采取了反攻，对天才论的观点做了正面的和公开的批驳。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

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

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对陈伯达一份报告的批示》

1970年8月31日

这里的报告指陈伯达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搜集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1970年12月，毛泽东与他的老朋友、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中南海的家中作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当谈到林彪“创造”的“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时，毛泽东说：

那时(指1965年)确有其事，今天情况不同了。所谓“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这个词，就是教员，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教员，其他称号一概辞去。

当斯诺问：“那些拥护毛主席口号最响的、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毛泽东点点头说：

这种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随大流的一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就跟着喊；第三种是伪君子，你没有受这一套骗是对的。

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就能发现，林彪的天才论虽然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但他却用了唯心主义和先验论的方法夸张了和神化毛泽东同志，实际上是危害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党的领袖与人民群众真实而密切的阶级联系，也危害了共产主义学说的科学性。这是有利于各种野心家和资产阶级进行复辟行为的理论基础，承认这种天才论也就等于承认英雄史观否定群众史观，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也就等于承认和默许少数野心家进行夺权的复辟行径。当然，这种天才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自然有着不同的危害。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一段历史中看到，提出天才论的林彪虽然协助革命派打垮了刘邓集团，但他也不择手段地迫害异己。他把自己的亲信和走卒安插到军队的要害部门：他让黄永胜抓总参，邱会作任总后勤部部长，李作鹏去抓海军，吴法宪抓空军，再加上他的老婆叶群从中串连，结成反党集团并控制了军队的主要机关。他们一边夺取军权一边又要要求政权，他们的目的在于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随着鼓吹“天才”，高呼“万岁”等阴谋被毛泽东同志识破和设国家主席议案被毛泽东同志否决，林彪集团意识到靠和平手段夺权已难能实现，于是决心发动武装政变。1971年9月8日，林彪下达了杀害毛泽东的手令。阴谋败露后，林彪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于9月13日驾机出逃。逃跑途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至此，这个以极左面目的出现在中国文革中的修正主义集团走向了彻底覆灭。天才论的观点在中国也就被批倒，伟大领袖的提法也减少。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

秘鲁共产党的一些提法：“是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将其提高到你们无法想象的高度，对当今世界革命作出巨大贡献？是谁确立了社会、国家、党、革命、人民战争、军队和新政权的所有规律？所有这一切都是贡萨罗主席完成的，他是当今世界上在世的最伟大的马列毛主义者，谁能证伪吗？”还有称贡萨罗是“保证革命胜利的人，他将带领我们实现共产主义。”这些观点和林彪的天才论如出一辙，但历史的教训是即使是毛泽东同志也无法保证文革能够胜利，而号称贡萨罗能够保证胜利的秘鲁共产党却使秘鲁革命遭到了巨大的失败。

今天来看，贡萨罗的各种理论和策略并非都是正确的；并且从整个国际共运的历史来看，谁也不敢说自己确定了客观规律（这是唯心的提法），人类只能发现和利用客观规律。但贡萨罗派的问题已经被许多同志批判过，这里我们不在重复叙述。现在我们谈谈关于天才论和才能的理论问题。

不管是贡派还是林彪，他们关于天才和伟大领袖的提法是先验的和唯心的，而且是非无产阶级的。在阶级社会的条件下，如果我们谈普遍的、抽象的、一般的天才，那也就是再说某人对全人类各阶级来说都是天才。而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阶级社会没有超阶级的人，这种提法等于抹杀了该天才的阶级性，或者说天才性是第一性的东西，而阶级性是第二性的东西。这种提法也就意味着，他（天才）无论放在什么社会条件下，不管对于什么阶级来说都是天才，那么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历史条件都变成次要的因素，整个人类历史就变成了少数天才推动发展的历史，就变成了英雄创造世界的史观而非奴隶创造世界的人民史观。而现实的、由无数人民群众构成的阶级斗争和千百万奴隶们改造世界的宏伟历史画卷被庸俗化为了几个天才们进行决斗的图画。这种提法在社会主义时期有利于少数野心家其代表的整个旧的或新的剥削阶级、特权阶层篡夺无产阶级政权进行复辟，这是过去中国毛泽东同志时期击垮林彪集团所留下的历史经验。而今天的贡派无非是在试图用他们的实践告诉我们另一个教训，他们要探索出在进行反抗旧剥削制度和旧剥削阶级专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推行天才论观点的有害性能体现在哪些方面。至少我们目前可以看明白的一点是，这导致秘鲁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开始脱离群众，在许多方面阻碍党采取更明智的革命策略和正确的群众路线。

所以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来看，特别是贯彻马列毛主义的哲学方法来看，就人类文明史来说，任何天才和领袖都有他的阶级性，只有对于一定的阶级来说他才是天才和领袖。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天才或领袖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就是最恶毒敌人，反过来说也是如此。任何天才的一切特点在阶级社会的条件下也必然带着这样的阶级性。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天才是有特殊性而没有一般性，从矛盾法则的规律来看，任何现实事物都是一般和特殊的统一，两者是不可以分离的，而阶级性是主要的方面。如果说不同阶级的天才的特殊性主要在于各种阶级性，那么就一般来说，天才作为一种和其他人有区别的人，他的特点无非在于他的才能，毛泽东同志说他只是“聪明一点”，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种“聪明”。

以马列毛主义的实践论的观点来看，任何所谓的天才和领袖，他的才能只能是在各种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和体现的，那么我们立即就能发现，如果我们要使自己的某种才能比其他人多就需要依靠比别人更多的社会实践而积累起来，也就说个人才能离不开社会实践。

但这种积累起来的才能只能是“才能”的一个方面，这是一种过去的、或历史的才能，而不完全是在各种实践中所体现和现实发挥出来的那种才能。所以我们就需要把才能分为这样两

个方面：能动的才能和历史的才能。也就是是才能的质和量。历史的才能主要靠历史的社会实践进行积累，而能动的才能是在每一次具体实践中和一切运动过程中才能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才能，它是动态的、升华的、立体的、现在时态的才能，它的作用在于能多大程度激发人的历史才能，所以我们也能看到，有时缺乏相关实践经验的人做出令专业的人都能感到极其出色的事情，比如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才能在他一开始参与军事指挥时就体现出来了，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许多群众都有在部分社会实践过程中表现出出色才智的现象。这说明，如果一个人在某一方面能动的才能丰富那么他依靠很少的历史的才能也能展现出极高的才能和较成功的完成相关社会实践，但这种才能也不是先验的或唯心的，这种能动的才能也是每个人都能具有的。这种能动的才能无非由这样内容构成：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进行社会实践的方法。主观能动性高也就是说明一个人在社会实践中的精力集中、积极性高，再加上正确实践方法，就形成了人的能动的才能。无数群众的生活都能证明这一点，即当任何人把自己的精力集中起来以极高的积极性和正确方法进行某种社会实践活动时，他们都能够展现出非凡的天分，创造出非凡的事业。能动的才能和历史的才能之间对立统一、互相依赖、互相限制，它们结合起来就是才能的整体。因此这种天才的才能只能是主客观之间对立统一的。

如果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种“主客观的对立统一”我们就会发现，任何人进行实践时既要发挥自己的主观力量，也要根据一定的客观条件作为基础。一个天才，他的才能之所以更突出一些，他和其他人的区别在于：在客观方面，他的相关社会实践经验更丰富、他进行相关社会实践的社会条件更好，所以他在相同的主观条件下进行这种实践时，它的客观条件更优越，更能展现和使用他的才能；在主观方面，他在进行社会实践时的主观能动性更强、实践方法更好，因此在相同的客观条件下进行实践时能比其他人更进一步。任何人都要从这两个方面来发展和发挥自己的才能：即客观上积累历史的才能和利用一定的社会条件来发挥和发展这种才能，主观上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一定的实践方法来发挥和发展这种才能。主客观相统一，便是任何人发挥才能和发展才能的全部条件。

但这样的主客观条件一部分是社会的，另一部分是在一般的阶级运动中和各种具体的阶级运动中所体现和发挥出来的。有革命的才能也有反革命的才能。正如前文所谈的任何天才都是有阶级性的，而才能必然也是有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的条件下，任何才能总是在一定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发挥和发展起来的，人的才能依赖一定阶级性的社会实践，这决定着人们才能的性质。任何人一旦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他的才能原有的阶级性也就消失，他原有的阶级意义也就变化。像邓小平这样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或许曾经对革命运动有过一定贡献，但他们后来就发展到完全相反的方面去了，他的才能就变成了反革命的才能，他的历史意义就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罪人和社会主义破坏者，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十足的坏蛋和蠢材；只有对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盟友、走狗来说，他才是十足的善人和天才。

因此，才能也是历史的。它有多个方面的历史意义，首先是阶级的历史，任何才能或天才的历史总是一定阶级性的历史。然后，就一般的才能来说，才能也是历史的发展着和历史的变化的。人们总是在积累自己某一方面的历史的才能，这一方面的才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断增加的，这是才能的历史发展；而能动的才能的变化则往往更加剧烈和曲折，因为决定能动的才能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实践的方法，在这样的条件下，过去的天才可能变成蠢材，而过去的蠢材也可以变成天才。因此，就才能一般性来讲，才能和天才也是历史的变化

着的。另外一方面，对于任何人来说，他的才能也是只能是作用于一定历史范围内的，正如没有人能够保证共产主义的胜利一样，任何天才都不可能知道尚未发生和遇到过的事情，他不可能保证他对未经历和未了解的事情能取得怎样的结果，他没有对于这种实践的经验和认识，所以他面对那样的事情时他一开始也很有可能犯错误，也必然会认识不足。任何社会实践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内的，任何人也需要通过一定的实践和认识的过程才能发展出关于此实践的新才能出来，也需要重新依靠发挥和发展才能的主客观条件来发展和发挥关于此事的新才能。但这些才能并不能作用于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他过去的才能就失去作用，因此他的才能的作用性也是历史的。

所以，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才能，任何群众都有可能把自己的才能发展到足以称得上天才的程度，只是阶级社会的剥削条件限制了大家，旧剥削阶级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社会上落后文化等渠道用各种反动思想不同程度的奴化着群众，人民群众发挥和发展自己各方面才能的主客观条件都被旧社会、旧制度给限制了，因此导致天才似乎是较少的。但不管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上来说，这一点都是可以克服的，人类历史也证明了在一切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时期中，群众的才能都被大大的发展了起来，群众得以比过去更好的发展和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说明一个事实，即共产主义的社会所预告的方向就是一个要求全面的发挥个人才能以及使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天才的那种社会，而这个社会由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天才的普遍实现，“天才”本身也就消失。以上这种预告在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就能够开始不同程度的体现了，在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运动中会使群众得以革命化并大大的发挥和发展所有人的才能，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正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来保障大多数劳动者得以更全面发展的阶级，只有这个阶级所领导社会革命运动才会有这样的性质。所以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应该反对过去林彪的天才论和贡派那荒诞的伟大领袖和保证胜利的提法，这本质上是剥削阶级思想的体现，是奴化群众和全面破坏共产主义科学学说的体现。所以，任何个人智慧或才能都必须依靠群众、依靠集体智慧和才能才能够得到发挥和发展，个人任何的不成熟的观念也只有在群众和集体的协助中变得成熟；同时也只有依靠群众和集体其才能才能是代表群众和集体的才能，所以天才的才能必须要服务于群众和集体。

因此，如果我们运用马列毛主义的哲学方法，特别是矛盾法则来研究天才问题我们就能发现。科学观点下的天才只能是这样的：在阶级社会下任何天才首先都是一定阶级的；然后天才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天才和他的才能只能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他发挥和发展才能的条件也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并且天才是人民史观的、是所有群众都有可能成为的，任何天才的智慧和才能都依靠其他群众、依靠集体智慧，天才的任何智慧和才能都是要服务于群众和集体的；最后，天才是历史的，他的阶级性是历史的、他的才能是历史的、他发展和发挥才能的主客观条件是历史的、他的才能的作用性也是历史的，天才这个概念也是历史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战线

中国马列毛统一战线：丧钟

一. 工人阶级必须牢牢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大权

同志们，现在我们来讲讲经济问题。

有些同志认为，经济问题是经济学家的事，和我们这群“大老粗”，“996”八竿子打不着。

不对！在人压迫人的社会里，老板和大官们当然不愿意让我们工人掌握经济，他们比谁都更清楚，工人一旦掌握经济，它们就将再也没有容身之处了。所以，它们为了麻痹，愚化工人，一方面，让他们的御用文人炮制出一个又一个谎言，什么“只有科班出身才能搞经济”，“工人群众是无知的”；另一方面，它们又大搞天才教育，将工人群众拒之知识门外。它们妄图通过这样的手段，永远地奴役工人。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必须牢牢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大权，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够彻底的保持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工人曾经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在资本主义复辟时期，工人失去了掌握经济的权力，而在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后，中国的工人将更坚决地掌握住社会主义经济大权。

二. 社会主义经济是怎样的

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具体应该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谈起。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它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

这个社会，既然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那么，它就不得不既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又有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在这个社会，无产阶级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无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打碎旧的上层建筑，并利用新的上层建筑，不断地革命经济基础，使其不断地向共产主义方向发展，进一步巩固上层建筑。

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发展并不是平衡的，有的地方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很大发展，但革命形势较差；有的地方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薄弱，但革命形势较好……这种种原因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并不会在世界各地同时爆发，而是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首先爆发。这些国家不仅要革命自己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而且要支援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可以在一个国家建立成功，但是，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只有在全世界插上无产阶级的红旗后，才能真正实现。

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并向共产主义过渡，无产阶级不仅要牢牢掌握上层建筑，而且要利用掌握的上层建筑不断对经济实行革命，使经济向共产主义方向发展，巩固社会主义政权。

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权，为着工人阶级的利益，为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服务的。

社会主义经济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在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中产生的，所以，社会主义经济，也是无产阶级在同资本主义经济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的根本问题是道路问题。革命的胜利与否，在于能否取得政权，政权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于政权走的是不是社会主义路线。如果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这个政权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路线，那么，哪怕这个政权披上一层“社会主义”“红旗”当盔甲，也掩饰不了它实际上的资本主义性质，掩饰不了它实际上剥削无产阶级的性质。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于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的整个社会阶段，在经济战线上，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尤为激烈而隐蔽。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一些人受到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应该按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这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就叫做资产阶级法权，而按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社会经济的路线，就是一条资本主义路线。而这些人中的许多，走资本主义路线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他们中有许多是真心想干社会主义的。但是，他们执行的是一条资本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最终会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使无产阶级由社会主人重新沦为雇佣奴隶。

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一些资本家可能是慈善家，甚至将自己毕生资产送给慈善事业，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而社会主义社会中执行资本主义路线的人，这些人中的许多，并不从这一过程中捞到好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让无产阶级被剥削。让无产阶级江山变成资本主义地狱。

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复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新生的资产阶级的产生。这一资产阶级，又往往来自曾经的领导位置，他们同普通工人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这一阶级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使无产阶级失去对生产资料管理的权力，实际上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他们通过自己的领导权力，使自己领得的那份社会财富远远高于普通工人的水平。他们这个集团能够占有无产阶级的劳动，他们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生的阶级，即党内资产阶级。

党内资产阶级，为了保住自己的阶级地位，一方面对走社会主义路线的同志反攻倒算，另一方面鼓动反动文人为资本主义路线辩护。正如马克思所言，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三. 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

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到底是怎样的？它和资本主义经济到底有什么不同？凭什么说，社会主义经济是为着工人阶级的利益，为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服务的？

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由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所以，为了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我们必须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说起。

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而工人们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这使工人不得不到资本家开的企业中谋生。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产品都是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的，无产者由于自己没有创造产品的方法，即没有生产资料，他们唯一能够在市场上出卖的，就是自己。

但是，自己的价格怎样确定呢？在资本家那里，工人的意义，就是工人可以为他干几个小时，或者为他制造几件产品。通过这种计时计量的方法，自己的价格就由工时等等可以计量的方式确定了。这种被计量的劳动过程，就被称为劳动力。

工人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被出卖。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谈谈商品的属性。

商品，因为它自身被在市场上出售，所以它才被叫做商品，正如农民种的瓜，如果农民不卖，自己吃了，那么瓜就不能被叫做商品。而商品之所以能卖出去，是因为它对买家来说有用，无论买家买它是为了生活需要，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买家的这样一种需要，就叫做使用价值。

在资本主义以前，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条件下，整个交换过程表现为这样一个公式：商品（W）——货币（G）——商品（W）。“这一循环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是满足需要，总之，是使用价值。”

但是，商品是可以与其他商品，例如我们使用的货币，进行交换的。（货币，就其本质来讲，是特殊的商品。）也就是说，商品是可以换钱的。商品的这种特性，就叫做商品的价值。

让我们回到市场上被出卖的劳动力上，在这里，劳动力作为商品，也和其他的商品一样，同时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对我们来说都不陌生：老板雇工人，就是让工人为他生产产品，而具体的生产工作，例如生产螺丝等等，就叫做具体劳动。劳动力的价值，对我们来说，也不陌生，它就是我们的工资。劳动创造价值，抽象的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这就是说，商品之所以有价值，之所以它可以拿去卖，而且卖得的钱比买原料的钱多，是因为工人们把劳动价值加在原料里面了。所以，商品卖得的钱才能比买原料的钱多。并且就算是自然物、任何原料要把它当作商品来交换，也必然是凝聚了人类劳动的价值的，经过开采、种植、运输等环节的原料都凝聚着人类劳动的价值。

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条件下，整个交换过程表现为这样一个公式：货币（G）——商品（W）——货币（G）。由于这一公式两端的 G 都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在质上是完全相等的，如果公式两端的 G 是等量的，则这一交换公式便将毫无意义。所以，G—W—G 这一公式，必然要表现为 G—W—G' 的公式，必然要有一个价值增殖才有意义。

对于我们来说，购买商品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购买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是因为购买的劳动力能够在他们的厂里（生产资料）劳动。这样，购买的劳动力就能够给资产阶级创造价值，这种价值远比劳动力本身所需要的价值高得多。正因为劳动力创造的价值远比劳动力本身所需要的价值高得多，所以，资产阶级才会去购买劳动力。而劳动力创造的价值比它本身所需要的价值高的部分，叫做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建立在剩余价值上的。

四. 资本

资本主义制度，是依赖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才能过活的。而资本主义制度，正是通过资本压榨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的。

资本是什么？

资本是一种社会力量。

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资本并不等于厂房，机器。资本，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相互配合，这种关系就是社会生产关系。

资本表现为商品即交换价值，但并不是任何商品都是资本。

一些商品即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究竟是怎样成为资本的呢？

它成为资本，是由于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力量，借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力而保存下来并增殖起来。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

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过去生产的商品，包括机器，原料在内）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无产阶级出卖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其中属于生产资料的部分继续上述过程）才变为资本。

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

这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资本发展的历史。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上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积累不断扩大与集中，生产过剩的产品；与此相对应的，却是工人的日益贫困。生产太多了，从工人身上剥削太多了，但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工人被剥削太重了，他们没钱去买生产出来的产品了。这样，产品造太多了，卖不出去，但工人却没钱买产品。资产阶级绝对不会把产品分给工人，因为他们不能从中获得利益，他们宁愿减产，让生产线停止生产，以使旧产品卖出。经过一次萧条后，资本主义便在这一萧条的基础上恢复，但又不可避免地向第二次萧条迈进。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制度和它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是社会化的，它与封建生产方式不同，它使生产资料变成了只有大批人共同劳动才能使用的生产资料，使个体的劳动变成了千百人相互协作的集体劳动，使过去主要供个人消费的产品变成了供给整个社会消费的商品。这样，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结合为一个互相依存，紧密联系的整体。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并不归全体劳动者所有，而是被少数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具体体现。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必然要表现为生产无限增长趋势同群众购买力相对萎缩的矛盾，而这一矛盾，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直接的原因。马克思指出：以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人民大众的贫困和他们的受着限制的消费，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不顾一切地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的限制。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中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具有“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和它根比简直是儿戏”。资本家为了追逐尽可能多的利润，就必然要增加积累和扩大生产；同时，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也迫使资本家不断地改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但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使劳动群众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化为利润落入资本家的腰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需要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这就使得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成为不可避免。

五. 社会主义经济原则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而历史告诉我们，只有资本主义发展到它的没落阶段，即私有制历史的最后阶段，私有制的消灭，才成为可能。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要在全世界消灭资本。

社会主义社会要为共产主义社会做准备。

那么，社会主义不仅要求我们消灭本国的资本，而且要求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且将革命推向全世界。

消灭本国的资本，是最容易做到的。无产阶级当然希望资产阶级可以自己和平地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无产阶级从来没有说，我们不会使用暴力。只要资产阶级胆敢反抗我们，我们就会用刺刀和炮弹对付它们。直到将它们彻底赶下历史舞台。

无产阶级很轻松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然而，无产阶级在将资本主义政权推翻，消灭了本国的资本后，应该怎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的经济到底应该是怎样的？怎样才能让社会主义经济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残余：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的，它处处带有旧社会的残余。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消灭资本。无产阶级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并且将生产资料等等收归全体无产者所有了。

但是，无产阶级虽然取得了政权，但并不能因此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社会。

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又必须以上层建筑的变革即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前提。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还要经过很多年的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在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过程中，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在全世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虽然取得了政权，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能满足实现共产主义的需要，所以，无产阶级还不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处处都残留着资本主义的痕迹。在经济方面，这一痕迹就表现在社会的生产与流通这两个方面上。

社会主义生产方面的资本主义残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

社会主义社会从一开始就消灭了本国的资本。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能从一开始就消灭商品。

“什么是商品？这是一个或多或少互相分离的私人生产者的社会中所生产的产品，就是说，首先是私人产品。”

为什么说，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社会产品还具有私人性，仍然是商品呢？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能一下子打破企业之间的隔阂，并不能一下子打破工人和农民之间的隔阂，并不能一下子打破不同生产部类之间的隔阂。

例如，在曾经中国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它所生产的产品，还不是归全社会的劳动者公有的。一个集体企业的劳动者共同拥有自己集体的私有财产，虽然它已经不再是私人的财产了。而且，这种集体企业的盈亏与劳动力分配，主要是这一集体企业的成员负责承担。从这个意义上讲，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品和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都还带有私人产品和私人劳动的传统或痕迹。

对于中国曾经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它所生产的产品，虽然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力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耗费多少和收入多少，也关系着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各个国营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上仍保持着相对独立性，它们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国营企业的这种相对独立性，不是技术性的，而是一种经济关系，表明国营企业之间还存在“你我界限”。这里，虽然没有不同的所有者，但仍然要象不同所有者那样来建立它们在系或相互关系，而跟未来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社会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展，社会产品还没有极大丰富的时候，如果取消了国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上的相对独立性，那就不利于它们各自独立地向社会负责，不利于更好地调动它们在生产、经营上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从而也就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既然还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那末，它们的产品和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也就不能不带有某些私人性的传统或痕迹。

社会主义的劳动产品，一方面，不同程度地具有直接社会性（属于社会的，为社会需要生产的），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带有私人性的传统或痕迹。这就是社会主义产品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和矛盾的特殊性。在社会主义产品的这种二重性中，直接社会性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这是社会主义产品同共产主义产品相通的地方；私人性则体现着旧社会的传统或痕迹，表明它和私有经济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各个生产单位既然相互独立，产品既然还带有私人产品的传统或痕迹，那末，一方要取得另一方的产品，就不能采取无偿的由社会直接分配的方式，而只能通过产品转化为商品，实行等价交换来解决。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实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制度。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产品既已开始具有直接的社会性，同时又仍有一定的私人性，还是商品。这种情况就一定会反映到生产过程中来，使社会主义生产过程同时是商品生产过程，所以作为商品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就依然存在。这就是：一方面，它是劳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者的劳动作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作为抽象劳动，还创造出新的价值。

无论在哪个社会，劳动过程，从它的各环节来看，无非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运用各种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从而生产出各种预期的产品的过程，是创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但是，任何劳动过程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

进行的。因此，任何劳动过程就不仅反映着人和自然界的联系，而且也必然反映着人和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从这一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过程就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过程有很大区别。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越发展，工人阶级受剥削越重，生活得越苦。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已经具有直接社会劳动的因素。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越发展，工人工作越轻松，而且生活得越好，越有精力去为人类未来的事业而斗争。

资本家开工厂，是为了通过价值增殖过程剥削工人，攫取利润。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方面，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中最本质的联系。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社会生产必须为保证满足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服务。人民的需要，不论是他们的共同的需要或个人的需要，长远的需要或当前的需要，都必须凭借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产品）才能得到满足。因此，有计划地为满足劳动人民各种需要而进行的创造使用价值（产品）的劳动过程，是社会主义生产的主导方面，体现着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目的和社会主义生产中最本质的联系。价值创造过程从属于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核算劳动耗费，计算盈亏，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决不能以产值大小和赢利多少为转移，而应以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为依据。凡是劳动人民迫切需要的，就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扩大生产，哪怕是暂时亏本的也要生产。相反，凡是劳动人民不那么迫切需要的，即使产值大，赢利高，也不应任意扩大生产。社会主义企业之所以要核算劳动耗费，计算盈亏，是为了减少生产耗费，使它不仅能从价值上得到补偿，而且能提供日益增多的社会基金，以便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增加社会产品的供应。归根到底，劳动过程中包含了价值创造过程，它的目的是创造日益增多的社会财富，但和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它创造社会财富以满足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十月革命胜利以前，列宁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共同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为全体劳动者而不是为一小撮富人造福。”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能可做到全部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而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本身也还带有私有制的某些传统或痕迹。这样，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使社会产品开始具有直接社会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还不完全成熟，使社会产品仍然具有一定的私人性，还要转化为商品。产品具有直接社会性，同时它又是商品这一独特现象就这样发生了。它的特点是：第一，它主要体现工农两大劳动阶级之间相互交换活动的联系；第二，它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指导下、直接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进行的；第三，同资本主义社会比较，商品的范围已大为缩小，劳动力已不是商品，土地、矿藏等天然资源也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相互之间的商品交换，是同一所有制范围内的交换，同历来的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比较，也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

但是，只要存在商品和商品生产，作为商品生产所固有的一般特征也就仍然存在。这些特征主要是：第一，作为商品，就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并且不可避免地存在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尽管生产商品的劳动基本上是国家计划指导下的集体劳动，具有直接社会劳动的性质，但是也还存在私人劳动的传统或痕迹。第二，作为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就要起作

用。商品的价值仍然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生产商品的不同社会主义企业，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就能获得较多的收入；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就只能获得较少的收入，甚至亏损。第三，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仍然存在。商品的价值就要用货币来表现，即表现为价格。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仍然会有背离。由于不同商品的价格和价值的背离情况不同，有的商品价格高于价值，有的大体相当于价值，有的则低于价值，这样就会进一步使不同商品的生产者耗费等量劳动而获得不等量的收入。以上这些情况表明，只要产品作为商品，社会生产采取商品生产的形式，那末，商品生产所固有的表面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就依然存在。

正由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还同商品制度联系在一起，这就给利润挂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条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不对商品制度加以限制，听任利润挂帅泛滥，就会最终改变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在苏联，它的生产目的已经根本改变了。追逐利润已成了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生产目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已经取代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掩盖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本质，故意把社会主义生产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混为一谈，说成“都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并且把价值增殖作为主导方面突出地加以宣扬，他们说什么“企业财务活动的最重要的总结性指标是利润和赢利率”，并且号召“为争取提高利润而斗争”。但是这样一来，他们拚命掠夺苏联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反动面目也就暴露了。

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的资本主义残余：

在社会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需要经过流通过程，才能从实物形式上（换得产品）和价值形式上（换得货币）得到补偿。否则，再生产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因此，我们在对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进行初步分析之后，接着就来分析一下社会主义的流通过程。

社会主义流通过程仍然是商品交换的过程。商品交换是孵化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温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资产阶级的产生，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都同商品交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社会主义商品交换的最终目的，似乎同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交换是一样的，是满足需要，是使用价值。但是，它同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交换还是有质的区别。简单商品生产，是建立在个体所有制基础上的。一般说来，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因而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只能听任价值规律的调节，两极分化特别激烈。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是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因而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出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能够在全国范围调节商品生产和交换；而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则已经受到很大限制，一般说来，不会出现个体所有制条件下那样的两极分化。此外，所满足的需要也不一样：简单商品生产，满足的是生产者个人自身的需要；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满足的是社会的需要。全社会的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社会产品的主人。到了那个阶段，社会劳动的交换过程，既不是为买而卖，也不是为卖而买； $W-G-W$ 和 $G-W-G'$ 这两个公式都将退出历史的舞台；产品不再转化为商品，从而也不再表现为价值。社会从它自己的需要出发，进行着直接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

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达到全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的地步，还存在两种公有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截取企业生产过程的个片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货币资金循环 $G-W-G'$ 的形式，但是，即使在这一片断循环中所实现的一个增加了的价值额，也不是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而给资本带来的剩余价值，而是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人为社会创造的新价值——社会纯收入。这个新价值仍然是为了满足劳动者的需要，是为了进一步扩大使用价值的生产。因此，从社会主义生产总过程来考察，社会生产本质上是 $W-G-W$ 的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 $G-W-G'$ 只是整个资金循环的一个片断，而且它的存在也不是孤立的，是从属于 $W-G-W$ 的。因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交换，也可以说是扩大了、更高阶段上的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交换，它们的共同点是为了满足需要，为了使用价值，都是 $W-G-W$ ，都是为买而卖。只不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通过商品交换满足需要，不是为了一家一户，而是为了千家万户，即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罢了。但是，“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只要它仍然存在商品流通即 $W-G-W$ ，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以实现使用价值为目的的商品交换即 $W-G-W$ ，还会向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 $G-W-G'$ 转化，使 $W-G-W$ 这一循环，从属于 $G-W-G'$ 的循环，从而使货币变成资本。这是因为，无论是那一种商品交换，都是要实现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所耗费的必要劳动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在这里，价值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者就显示出来了。为了实现商品的价值，就会出现“价值追逐狂”，从而根本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和交换的目的是使用价值。在社会主义商品交换过程中出现的利润挂帅、投机倒把等类现象，实际上在实现着 $W-G-W$ 向 $G-W-G'$ 的转化过程，使后者具有独立的意义。一旦完成这个转化，劳动力就重新沦为商品，货币就重新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就复辟了。苏修叛徒集团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复辟资本主义之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交换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

商品交换的规律是等价交换。马克思说：“商品交换就其纯粹形态来说是等价物的交换”。这就是说，商品在原则上是按照它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即价值量来进行交换的。这从表面上看来，好象很平等，但实际上却是不平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正是依据等价交换的原则，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从而榨取了工人的无偿劳动。在资本家和小生产者之间，生产条件是不同的；拥有雄厚资本和现代化技术装备的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同一商品所耗费的劳动要比小生产者所耗费的少得多，然而商品的交换只能按照同一社会必要劳动量作为尺度来进行，这就必然要产生收入上的不平等；产生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样的两极分化。十分明显，等价交换中的平等权利，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包含着不平等，它对资产阶级有利，而对劳动者不利；对大资产阶级有利，而对小资产阶级不利。

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并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卖，就这点来说，资产阶级法权已不再被社会承认了。但是，一般的产品仍是作为商品来交换的。尽管各生产单位的生产条件不同，生产同样产品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不同，但在原则上仍须遵照同一社会必要劳动量来交换。例如，表现在商品收购上，商业部门对于生产同样产品的各个单位，决不能因为有些生产单位的生产条件各不相同，而可以有不同的收购价格，而只能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价格进行收购。这就是说，在商品收购中，国家只承认生产某一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不承认各个生产单位实际耗

费的不同的劳动时间，这对落后企业起鞭策前进的作用，但又会给不同生产条件的单位带来不同等的收入。

商品交换要以货币为媒介。进入交换的商品的价值，还要表现为价格。由于商品供求矛盾的存在，等价交换原则“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在每一次商品交换中，做到等价，做到价格同价值的完全一致，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能的。商品的价格会同它的价值发生背离，价值量相等的各种商品，会在市场上按照不同的价格出售，这是商品交换中资产阶级法权的又一表现形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条件下，等价交换的趋势，只能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通过价格时而高于价值、时而低于价值的不断的背离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社会，集市贸易上交换的商品也会出现价格或高或低的波动现象。在计划市场上，商品价格不是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地形成，而是由国家机关有计划地规定的。但是计划规定的各类商品的价格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背离价值的现象。那些价格高于价值的商品的生产单位，经过交换就能获得较多的收入；反之，就只能获得较少的收入，从而带来事实上的不平等。

在社会主义交换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无产阶级的利益，还要利用它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商品交换中的资产阶级法权，也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从人类历史上看，商人阶级“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两者进行剥削。”随着这个真正的社会寄生阶级的形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制度就最终形成了。后来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是经过流通领域的孵化从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中产生出来的。这种历史现象值得注意，它告诉我们，只要实行商品交换制度，就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只要商品交换制度还存在，就有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因此，在交换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还将长期进行下去。

六. 苏联是这样复辟资本主义的

在以前的文章里，我们曾经讲过，斯大林由于没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所以他没有很好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正是由于这一点，苏联共产党在赫鲁晓夫复辟时几乎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而苏联的党内资产阶级所诞生的土壤，在斯大林时代就已经形成，而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对产生党内资产阶级没有做出很好的判断。由于党内资产阶级所诞生的土壤并没有被很好地加以限制，斯大林逝世前的苏联共产党几乎已经被正在形成中的党内资产阶级所掌握。

在曾经的文章中，我们还指出：

共产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就是“公”与“私”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取得政权的初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舆论方面的战争并没有停止，这不但是因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初期，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势力依然强大，更重要的是几千年来的私有制社会所造成的私有制观念还没有被彻底根除，它仍然留在世界上，并且随时都在产生着机会主义的土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一刻，

绝不意味着旷日持久的阶级斗争走向结束，恰恰意味着残酷的阶级战争——即白热化的阶级斗争——刚刚拉开序幕。

为了消灭机会主义产生的最后土壤，最后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就要不断有意识地向资本主义私有制观念在思想上，舆论上，以至于经济上发动毫不妥协的战争，为争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而不折不挠地同一切资本主义要素进行战争。

在苏联，并没有很好地有意识地不断同资本主义私有制观念做思想上，舆论上，以至于经济上的斗争。

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是有其经济基础的。

这一经济基础，就是经济战线上公与私的斗争。

这一斗争是在经济战线上进行的，它比思想，舆论等领域的斗争更不容易被察觉，但其影响更为巨大，斗争更加激烈。

在前文中，我们讲过，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资本是逐利的。资本就是不断地通过吸收活的劳动，来增殖自己的死的劳动，既物化的劳动（厂房，机器，商品等）。

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上的本质区别，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是社会性的。但是，就像上文中所讲的那样，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有商品，生产仍有二重性，劳动仍有二重性，等等。而这些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

我们说，利润挂帅是滋生党内资产阶级的土壤。下面，我们就来捋一捋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逻辑。

利润挂帅，就是说，企业仅仅以价值为目的而生产，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在一开始，是被作为一项政策，在苏联被颁布。这一政策在颁布伊始，人们并不觉得哪里有问题。然而，随着这一政策的不断深入，工人阶级的苦难就逐渐开始了。

苏修叛徒集团把“物质刺激”作为发展生产的主要手段。在“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推动下，把持苏修企业领导大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根本不关心企业的发展和生活人民的需要，而把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作为经营企业的主要目的和最高准则。利润原则支配着他们的生产方向和数量。苏联《消息报》承认：“工厂的某些领导人不愿意考虑市场的需要，停止生产居民非常需要的产品”，“因为这些产品的赢利率低”。随着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润不断升高，他们对工人的剥削也越来越残酷。据统计，一九七三年，苏联工业部门中的剥削率竟高达百分之二百左右，较之一九〇八年沙皇俄国工业部门的剥削率高出一倍之多。

利润挂帅不仅使苏联国内经济一片混乱，还使苏联的工人阶级重新被抛入资本的循环中，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日益加深了。而劳动力重新沦为商品是利润挂帅这一进程必然带来的恶果。

劳动力重新沦为商品是今天苏联社会商品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重要标志。曾经是企业和农庄主人的工人和农庄庄员，重新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再度沦为雇佣奴隶，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苏联《经济问题》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七期）曾直言不讳地宣称：“劳动力在社会主义下是商品”。

利润挂帅，劳动力重新沦为商品，这一切，促成了苏联社会实际上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伴随苏联社会改变颜色的，是同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新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形成。

党内资产阶级，之所以产生于党内，是因为在苏联，一长制的推行，使工人与干部之间的差别没有被逐步加以限制，致使社会主义的苏联逐渐形成了工人和干部两类人的差别。使这两个集团在苏联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正因为如此，推行利润挂帅的直接后果，就是一长制下的干部，成为了指挥企业资本的人。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而推行利润挂帅的干部和沙皇时代的资本家一模一样。推行利润挂帅的干部是指挥企业资本的人，是人格化的新生资本，是新生的党内资产阶级。正如一些资本家可能是慈善家，社会主义社会中执行资本主义路线的人，并不一定从这一过程中捞到好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他们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让无产阶级被剥削。让无产阶级江山变成资本主义地狱。

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苏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党内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是同苏联国家性质的改变密切联系着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党员”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国家的阶级性质变了，所有制性质也就必然随着改变。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以后，在苏联经济领域走资本主义路线，使苏联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路线，就是一条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修正主义路线。

早在1953年，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就作出了“扩大企业经理职权”、“扩大厂长权限”等决议。在1956年二月举行的苏修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叫嚣“必须彻底实行”“个人物质鼓励原则”。1957年，赫鲁晓夫提出要把“赢利和生产基金利用情况”规定为计划和考核企业、建设单位的重要指标。1961年，在苏修二十二大上，又进一步提出“应当提高利润和赢利的意义”，把它作为党的“纲领性要求”。1962年九月，在《真理报》上，抛出了一篇苏修御用经济学家利别尔曼的《计划·利润·奖金》的黑文，系统地鼓吹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国营企业管理方案，并在各大报刊就这篇黑文组织讨论。经过这样一番舆论准备，1963年十一月的苏修中央全会肯定了利别尔曼的建议，决定“广泛地进行试验”。

“利别尔曼建议”的主要内容，就是以“经济手段（利润、奖金、价格、货币等）”代替“行政手段”来“刺激”企业的生产。具体措施是：根据赢利率评价企业工作，“赢利率越高，奖金就越多”；简化和“改进”企业的计划工作，国家对企业只下达“产品的产量品种和交货期限”两个指标；扩大企业使用从利润提取奖励基金的权力；规定“灵活制订新产品价格的原则和程序”，以保证利润。

“利别尔曼建议”一出笼，1962年十月，苏修国家计划委员会国民经济计划局就决定在乌克兰和列宁格勒进行试验。莫斯科市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女布尔什维克工厂和伏尔加——

维亚特卡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灯塔厂，也于1964年七月一日开始试行“新的计划工作制度”。

“利别尔曼建议”是什么货色呢？说穿了，就是按照资本主义利润原则安排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一切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推行利别尔曼建议，就是按照资本主义原则来搞生产和经营，就是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使劳动者同生产资料重新分离开来，把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勃列日涅夫一九六四年十月上台以来，在“广泛实行”“经济改革”的名义下，把赫鲁晓夫那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措施在所谓《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中和其他一些决议中，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新经济体制”。

苏修《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规定：“有关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力，由经理（主管人、主人）和按照职务分工规定的企业其他负责人员行使之。”企业经理有权确定企业的人员定额，有权“招收和解雇工作人员，对企业的工作人员采取奖励措施和进行处分”；有权确定职工的工资和奖金；有权出卖、转让或出租企业的生产资料；有权支配归企业自己支配的各种“经济刺激基金等”。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是在自由竞争过程中，经过长时期的大鱼吃小鱼，资本集中和资本积聚的产物。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同国家政权紧密结合着的，高度社会化的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化变质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一开始就表现为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此相联系的党内资产阶级，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苏联复辟的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积极仿效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一套办法，积极推行所谓“以经济核算为基础”的生产联合公司，以加强这伙叛徒对苏联经济的资产阶级垄断统治。

生产联合公司最初出现于1961年，就是乌克兰利沃夫经济行政区的前进制鞋公司和曙光皮革公司。1962年，苏修中央十一月全会决定，逐步合并企业和建立各种生产联合组织（公司），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进行试验。到苏修二十四大，勃列日涅夫进一步强调“建立联合公司和联合企业的方针必须更坚决地加以贯彻——将来它们应该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核算单位。”1973年3月2日，苏修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炮制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业管理的若干措施》，要求巩固和加速发展生产联合公司。这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层组织——生产联合公司，在苏修叛徒集团的推动下，很快就发展起来。苏修认为“通过让目前独立的中小企业隶属于大企业的途径来合并企业，这种做法具有迫切的意义。”在勃列日涅夫一伙的竭力鼓吹和强制下，全苏联合公司已由六十年代初的几家增加到1974年10月的一千五百多家。

苏修叛徒集团在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同时，也改变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性质。“集体农庄”的名称虽然未变，但是，它的实质同全民所有制企业一样，也已改变了。

集体农庄是合作制的一种形式。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明确指出，并不是任何一种合作社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列宁说：“毫无疑问，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关于合作制的性质，马克思主义者是把它同一定的国家政权和占统治地

位的经济形式联系起来考察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帮助下，社会主义性质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组织才能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和发展。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完全改变了苏联集体农庄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首先是大批撤换集体农庄主席，派遣他们的爪牙挂起“知识渊博的专家”、“有才能的组织者”等等招牌篡夺了集体农庄的领导权，并通过苏修国家银行以发放贷款和财务监督等形式，加强苏修国家机器对集体农庄的控制。他们在农村中贯彻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一面鼓吹要通过“扩展商品货币关系”，彻底实行“个人物质刺激”原则，使“国家和集体农庄建立在这样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另一面又进行不断“调整”和“改组”，把集体农庄调整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早在 1955 年 3 月 9 日，苏修叛徒集团就攻击斯大林时期的农业计划制度是“不必要的”，“官僚主义的、过分夸大的、脱离生活实际的”。规定“商品产量应为计划的出发点”，以代替原来下达的生产（包括作物品种和播种面积）计划；集体农庄只要完成向国家交售任务，就可以自行决定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以及畜产品率和牲畜头数，“至于怎样生产这些产品是庄员们自己和农庄主席的事”。

1969 年颁行的所谓《集体农庄示范章程》则进一步规定：“集体农庄”主席有权出租或转让农庄使用的国有土地；有权支配农庄的财产和资金，直到自由买卖农业机器等生产资料；有权决定庄员的劳动报酬和奖金；有权开除庄员和雇工等等。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调整”、“改组”，苏联农村中原来属于广大劳动农民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已落到以勃列日涅夫为总头子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手中去了。

苏修叛徒集团除了把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外，还在城乡大力扶持个体私有制：发展家庭副业，扩大宅旁园地，鼓励自由贸易等。据 1960 年统计，全苏平均每户庄员生活费用的 43%要靠个人副业收入，许多地区甚至超过二分之一。

苏联的所谓集体农庄市场，早已成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它随着私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1966 年 3 月，全国有七千二百多个；到 1970 年后，发展为八千多个。这种市场是指有专门地址的固定市场。至于那些遍布码头、港口、火车站等小型的被苏修称为是自发的市场，还不算在内。

苏修叛徒集团扶持个体私有制，其目的是使这种个体经济作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经济的补充，作为党内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社会基础。

苏修叛徒集团把社会主义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过程，也就是苏联广大工农群众重新丧失生产资料，沦为雇佣奴隶的过程。

苏修叛徒集团通过在各企业中的代理人，运用管、卡、扣、罚等各种手段，穷凶极恶地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他们除了以国家的名义，通过税金和上缴利润的形式剥削工人以外，还任意扩大、强化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通过高工资、高奖金和名目繁多的个人津贴，使那些官僚、厂长、经理、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等特权阶层放肆地剥削工人。

据苏修报刊透露，在实行勃列日涅夫的“新经济体制”以后，苏联国营企业中车工的月计件工资，低的五十至六十卢布，中等的七十至八十卢布。而那些经理、厂长等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用工资、奖金、补贴等合法手段攫取的，就高出工人的工资收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用贪污盗窃等非法手段攫取的还不在于其内。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从 1969 年以来，大力鼓吹和推广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的“裁员试验”。这个“试验”，是苏修推行“新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也是加强对工人剥削的重要措施。“裁员试验”

是通过“增加工作量和扩大服务范围”等加强工人劳动强度的办法，来裁减人员。同时规定企业的工资基金总额几年不变，因裁减人员而多余下来的工资基金，留归企业由一小撮特权阶层支配。“裁员试验”的结果，不仅让少数特权阶层侵吞了极大部分多余下来的工资基金，而且使一批批工人被解雇，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形成了相对过剩人口。据苏修报刊透露，仅俄罗斯联邦二百九十二个“按谢基诺榜样工作”的企业，到1973年7月1日为止，就已经裁减了七万工人。连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推行“新体制”，大量解雇工人，失业问题已成了苏联“全国范围”的问题。

残酷的剥削引起了广大工人的不满和愤怒。一位有三十年工龄的苏联老工人说：“我们这里有好多百万富翁。”“他们跟我们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语言上也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莫斯科一大学的学生说：“苏联已经成为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高薪的人生活得比西方资本家还好，整个国家的工厂，企业都在他们手中。而普通人却生活得很贫困，甚至比沙皇时代还坏。”1970年，苏联普通农庄庄员每月实际得到的报酬不到六十卢布。一般农庄主席每月报酬三百多卢布，有的竟高达一千多卢布，总经济师、会计师、农艺师、机械师、畜牧师等主要专家每月报酬二百到三百卢布。农庄主席的收入比一般庄员高十几倍到二十倍。此外，农庄主席及其“智囊团”还利用“奖金”、“补贴”等名目进行剥削。乌克兰日米尔州农庄的主席，仅以所谓“行政管理费”的名目，就掠夺农庄全部劳动报酬基金的15%到25%。一些农庄主席住宅豪华，生活阔绰，拥有轿车和别墅，而广大庄员群众却住在简陋的木屋和矮小的土坯房里，过着贫苦的生活。

苏联广大工人、农民的苦难处境，说明了当无产阶级政权被资产阶级篡夺以后，劳动人民必然要重新陷入被剥削、被压迫的深渊，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毛主席教导我们：“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倒行逆施，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

七. 最后

然而，历史是残酷的，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同当年的苏联一样，劳动人民重新陷入被剥削、被压迫的深渊，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下一篇文章，我们将剖析，为什么中国会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复辟倒行是历史的偶然，机会主义是历史的潮流，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相信，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不会长久了。

第二部分 路线斗争

政治是最重要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把第二部分当作刊物第一部分的补充内容；另外一方面，我们会在这一部分中具体收录最近重要的或关乎我们的路线斗争的文章。

这一次的路线斗争是由统一战线内部爆发的，东风组织代表和统一战线联盟的其他所有组织代表产生了路线分歧。分歧的内容仍然是关于线下组织工作和融工方面的问题的，但部分的涉及关于统一战线和民主集中的问题。

在这次路线斗争中，统一战线遇到的融工问题也更具体了，问题提到了更具体、更实际、也更要求我们的工作要进行新的转变和新的发展上。我们的冲突主要爆发在融工工作的地位上、线下和线上工作的关系上、革命家组织和工人工作的问题上。统一战线联盟最终集体决定了融工工作的首要性，也对其他方面做了集体的决定，最后也统一政治路线和工作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并且东风代表在政治立场和观点上多次出现了前后不一的情况，这不仅体现在统一战线联盟内部（这是我们统一战线联盟各代表都已经深刻认识到了的），也体现在他们文章所表达的观点和路线前后不一的情况上，所以我们要全篇引用他们这两篇内容根本对立的文章；并要为读者指出：东风组织的最新立场是后一篇文章所要表达的那种内容，并且东风因为某种原因使用了岁月史书的方法，他们修改了第一篇文章一开始公布出来的版本，改变了之前的文章精神，所以我们会用蓝色字体标注出东风最新添加后的内容，以便读者可以分辨出东风现在所具有的不诚实特征。最后我们希望读者能够认真阅读双方代表性的文章来相对全面的了解问题。

东风方： “列宁主义”还是“取消主义”？

先“建党”还是先开展工人运动？

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年代，俄国工人阶级就已开始觉醒起来，同资本家进行斗争了。沙俄时代的工人生活非常困苦。在八十年代，工厂里的工作时间至少是十二个半小时，纺织工业中甚至长达十四以至十五小时。对女工童工劳动的剥削采用得很广。童工劳动时间虽与成年工人相等，但所领的工资也如女工一样，要比成年男工少得多。工资非常低。大部分工人每月只能领得七八个卢布。就是金属加工厂和铸造厂里工资最高的工人，每月至多也只能领得三十五个卢布。根本没有什么劳动保护，结果造成工人大量的残废和死亡。根本没有什么工人保险，看病完全自费。居住条件非常恶劣。工人集体宿舍一间矮小的黑屋子，要住十至十二个工人。厂主时常克扣工人的工资，强迫工人在厂主开设的店铺高价购买食品，并用罚款的办法掠夺工人。

工人们开始商量，共同向厂主提出要求，以改善他们难以忍受的生活状况。他们撂下工作——宣布罢工。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最初发生的那些罢工，通常是由于罚款过高、发工资时实行蒙骗，降低计件工资标准等引起的。

...

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出现于1883年，这就是“劳动解放社”。它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因进行革命活动受沙皇迫害、被迫逃亡国外、侨居日内瓦时所组织的。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俄国工人运动的兴起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也是在工人运动中产生，除了1883年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团体，1875年在敖德萨成立了“南俄工人协会”。1878年，在彼得堡成立了由木工哈尔士林和钳工奥勃诺尔斯基领导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前一个为知识分子组织，后两个是自发性的群众经济组织。

列宁主义的“学者”先生们在运动向前发展时，跟我们说“我们应该先建立组织，把融工放一放。”但历史证明了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是一对双胞胎。工人运动孕育了工人组织，工人组织推动了工人运动。“学者”先生们又说：“目前以知识分子融入工人为手段、单独依靠自身或小组力量进行的手工业灌输在内容全面性、持续性、稳定性等方面都存在许多局限，往往难以达到很好的效果。而要办好真正的全国政治报，就需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这种组织无论对于更好地组织经济斗争还是对于对工人进行有效的政治灌输来说，都是极其必要的。”哦！手工业小组持续性稳定性有很多局限，所以我们就用不着建立手工业小组了，直接建立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可怎么建立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呢？列宁主义的“学者”先生们给我们开了几本列宁全集的药方。把几本列宁全集读好后就万事大吉了，就算是参加政治斗争了。我们没有人要否认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治报的必要性，重要的是谁来把政治报发到产业工人手中，列宁主义的“学者”先生们“忘记”了无论是政治报还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协会，都回避不开的一点是要有人把火星报或政治、经济鼓动“灌输”到千千万万产业工人脑中去。而不是单单在绝大多数产业工人都看不到外网就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政治报”。

“学者”先生们在后面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们因为各种保守倾向而停留于手工业状态，那就是对事业的不负责任。”而我们统一战线将各个各自为政的融工小组团结起来。真正要组织起来、往建党那儿走的时候的时候，列宁主义的“学者”先生们就害怕了，就止步不前了。不惧怕自己组织的手工业状态了，反而担心起工人运动开展后的经济主义危险了。

谁正在对工人做政治鼓动？

我们也不止一次说过，我们的同志不是一时，而是要十年如一日的在工厂和工人们共同生活，和亿万产业工人做朋友、和他们一同斗争。为了使工人组织化、革命化。这难道不是列宁主义的“学者”先生们，所日日夜夜谈论的“灌输论”吗？对我们经济主义的污蔑，也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我们的同志哪怕在没有斗争的时候都一刻不曾忘记对工人揭露国家的本质，政治的黑暗……而不像某些人嘴皮子空喊着“小心经济主义、要政治斗争”。把斗争机会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却不敢干了。哪怕他们找了千百万借口，说了千千万，却自己始终不愿意实行朝思暮想的列宁的“灌输论”，“古有叶公好龙，今有颅内革命。”

我们统一战线要求在工厂扎根融工的建党路线，只有一点一滴的和工人们做朋友工人才会信任你，才会在十月革命那天愿意跟我们走，起义这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有的人幻想让大多数人民知道“真相”后，自己振臂一呼一齐推翻反动政府。没有先锋队爆发群众运动有过这样的情况，但是起义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夺取政权改造世界，走向共产主义。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工厂扎根深耕，每一个革命者都是些新社会的助产婆。手工业状态是革命初期每个革命者不愿意却不得不经历的时期，因为真正严密的革命者组织政治组织不是凭空变出来的，而是我们统一战线通过一步一步工作所建设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组织不同于革命同情者组织容不得人情世故（自己不能知道的事情，别人不能看着人情世故，朋友啊，给说出来），也容不得自由散漫。没有一个坚强的严密的革命家组织根本承受不了中修反动政府的残酷的打击。（注：蓝色是我们标注的，这是东风把原公布版修改后增加的内容）

俄国革命时期没有列宁全集读，千千万万名布尔什维克工厂鼓动员，大概是没有我们很多人读的马列毛主义书多，当然知识学的多固然是好事，但丝毫不影响千千万万像巴布石金的布尔什维克，前赴后继为革命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

今天中国革命的取消主义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没有士兵就没有元帅；没有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就没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政治报。如果说挂个VPN，敲敲手指就能自称“火星报”、全国政治报。工人们有谁愿意与其同唱这台独角戏呢？因为这不是在推进我们的运动，而是在把我们的运动向后拉——吹着冲锋号的逃兵的演出。别人都在前面战斗他却说我们用不着“灌输”（实际上是想说自己不用去“灌输”）。先生们的全国政治报谁来发给群众看？先生们的“政治斗争”观点谁说给群众听？

工人运动向前发展，取消主义将我们向后拉，他们往往是喊建党是喊得最起劲的，实际工作却是做的最少的。既不组织基层融工组织，却有着要建立“全国性政治报”天马行空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幻想。“学者”先生们称开展工人运动有经济主义风险，就像先锋队有变质风险，吃饭有噎死的风险，不动脑子、不去思考永远不会犯错。不去革命也

不用担心革命者变成新压迫者，解决列宁主义“学者”先生们提出的问题，最符合其意图的办法就是——“无为”。

取消主义是一种深刻的社会现象，它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情绪、同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中的涣散和瓦解是分不开的。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千方百计地想瓦解、破坏和搞垮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为那些欢迎他们的合法的工人团体奠定基础。就在这样的時候，取消派却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来反对昨天的革命的最重要的遗产和明天的革命的最重要的堡垒。呼声派（党只要求他们同取消派进行老老实实的、面对面的、毫不留情的斗争，此外别无他求）闪烁其词，为取消派效劳。孟什维主义被反革命历史逼得走投无路：要么同取消主义开战，要么成为它的帮凶。变相的孟什维主义，即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事实上也在助长取消主义。如果继续“争论”杜马工作和合法工作，如果企图保持旧的组织而又不使它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和已经改变了的情况，这事实上就等于推行对革命怠工和破坏秘密组织的政策。（《取消派的手法和布尔什维克的护党任务》列宁）

今天众多高喊着反对手工业小组形式、反对经济主义、要建立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的取消派，他们的组织形式恰恰是扁平化模式的手工业小组。这难道不是一种政治上的不诚实吗？群众可以为革命家组织为革命提供帮助，但革命家不可能因为“不好意思”分享一些组织秘密借以安慰群众。这就是很多革命同情者组织没有划分清楚职业革命家和革命同情者的区别。

职业革命家革命就是主业了，比方俄国革命家巴布石金，即发火星报，又负责本市的印刷工作，又作演讲.....今天这个时期的职业革命家一般情况下是去工厂当工人，职业革命家是要做好掉脑袋准备的，而不是想着我在家指挥就万事大吉了。

而革命同情者是很自由的。选择什么职业？做什么，革命组织也无权过问，愿意捐钱捐物都行，或提供开会场所，人家开会的时候回避.....但是在革命组织中革命同情者是不能知道组织机密的。

如果革命组织不严格划分两者区别，做好隔离。那么也不可能完成革命任务。

今天中国工人运动处在极不发展、工人组织极少，工人工作普遍 996。在工人除了吃饭、睡觉几乎全是工作的情况下。鲜有可能去花费本就宝贵的休息时间去听厂外和自己素不相识的人演讲。这并不是工人不积极，而是工人被长期在厂内被厂方欺骗，很难相信衣着光鲜靓丽的外人是为自己好。我们今天也只能在工厂和做朋友获取他们信任，才能有效的灌输，才能领导斗争。

我们的政治报：

俄国革命的经验证明了代办员网络存在于工厂秘密工作人员背后，也许一个工厂就一两个代办员，但是背后一个庞大的组织在支撑着其运作。

在没有基层组织的情况下搞的全国政治报，只是厕纸，因为这种“政治报”根本没有多少人能看到。

我们今天的政治报也不单单要揭露反动的中修政府，我们更需要系统地用报纸首先在我们的组织内统一起来我们的思想，告诉我们的组织成员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短期的目标又是什么，我们做成了什么。

我们这里引用一下《今天我们如何办政治报》这篇文章：

我们今天依然取用“政治报”的说法，是为了表示我们完全认同列宁通过政治报刊推动思想统一来实质建党的革命策略，并期望依此前进。今天中国革命左派仍然需要这样的政治报，来表明自己的思想政治面貌，来用工业化方式进行宣传鼓动，来推动不同小组间的思想交流并促进在此基础上组织的接近、融合。

在此还要说明，我们在这里谈如何办“政治报”，或许会有人攻击我们是妄想成为中央机关报，是“唯我独革”。为了避免陷入无谓的谩骂与攻击，这里要再一次让列宁为我们说话。列宁这样回复“火星报想发号施令”的指责：“先生们，假使我们真想发号施令，那我们就会写成‘《火星报》创刊号’，而会写成‘《工人报》第3号’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引线（如果这条引线拉得正确的话）受到人们尊重是因为它拉得正确，而不是因为它是由一个正式的机关报拉的”。同志们！我们要的不是一面写着“党的机关报”的破烂旗帜，我们要的是全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统一，以建立真正的集中制政党；我们要的不是只满足于键政口嗨的网左，我们要的是一批有理论修养，原则坚定，使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能够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鼓动、灌输的革命工作者。要完成这个任务，就不得不有一个政治报！

当前手工业小组有诸多弊病，但是完全不妨碍我们从一开始就有极广泛的纲领和想要提高我们组织所处阶段的愿望和事实上正在做，事实上也本该如此。我们即使在一开始无法做到一个完整的系统，无法做到频繁地发文，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简单的、地区性的文章编辑，派发，宣传，鼓动，组织，斗争的工作。除此之外，我们还完全应该效仿彼得堡斗争协会，自觉地克服小组间的隔阂，自觉地彼此结合起来，至少在地区间融合不同的小组，以不断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应该没有人会否认我们当前运动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足够的人手，我们除了可以不断发展新的人员，还完全可以通过融合不同的组织来扩大我们的实际力量，正是通过这样的列宁式建党路线，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做到重新建立一个属于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以克服当前左派力量远远落后于群众自发性运动的实际问题。）

现在缺的是职业革命家！

我们缺的是组织和集中

我们的目标是联合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一个秘密的革命家组织，摆脱因为广泛的群众组织和革命家组织混同不清的手工作坊。但是目前来看，尚没有有效的革命家组织的出现。一个革命家组织的人数应当尽量少到能维持其正常运作就可以，甚至不需要固定的形式。这样可以有效降低受到军警部门的打击的风险。这些人必须是集中的、专业化的，既要有精神上的毅力和胆魄，又要有足够的经验和手段去领导斗争。

为了“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完全不需要有（因而在这种斗争的基础上也不可能产生）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即一个能把政治上的反政府态度、抗议和义愤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汇合成一个总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

而当下左翼势力的整体情况都是一种手工作坊式的发展。

在很多场合，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装备，没有丝毫训练。他们像种地的庄稼汉那样，只操起一根木棒就去作战。这个学生小组同运动中的老的活动家们毫无联系，同其他地方的甚至本城其他地区（或其他学校）的小组也毫无联系，丝毫没有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根本没有一个较为长期而有步骤的活动计划，就去同工人建立联系，着手工作起来。这个小组逐步地开展了愈来愈广泛的宣传和鼓动，……但它扩大这种活动完全是自发的：……通常是这种行动一开始，立刻就会遭到彻底的失败。其所以会立刻遭到彻底的失败，是因为这些军事行动并不是有步骤的、事先考虑好的和逐步准备的一种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计划的結果，而只是按老一套进行的那种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是因为警察局自然差不多总是知道所有那些领导本地运动的、在学生时代已“初露头角的”主要人物，它只是等待对它最合适的时机来围捕他们，而故意让小组充分发展和扩大，以便获得明显的犯罪构成，并且总是故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几个人留下来“繁殖”（据我所知，我们的人和宪兵都使用这个术语）。

我们不妨想想看，自由派难道没有主张反政府言论吗？他们还是如1989年一样崇拜着多党制。而中修现在的主要焦点可就是在自由派身上。为什么我们群众基础没有自由派广泛？当然，作为自由派来源的西方资本主义和他们遥相呼应，我们也可以怪罪群众“小资化”，但是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我们的组织方式和群众的联系方面真的做的很好吗？白纸运动又有几个左派知道并尝试参与并尝试领导过？我们是不是掉入了“尾巴主义”？

总而言之，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现有的革命家人数太少，不能对所有骚动的工人群众都施加影响，不能使所有的骚动多少带一点严密性和组织性……单个的小组、单个的革命家没有集合起来，没有统一起来，没有组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有纪律的、各部分都有计划地发展的组织……于是这种缺少优秀的革命力量的情形就愈来愈明显，而且无疑也不能不影响到运动的深度和一般性质。许多罢工都没有受到革命组织有力而直接的影响……鼓动传单和秘密书刊都感不足……工人小组没有鼓动员……与此同时，经费也常感短缺。总而言之，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显然，现有各组织的缺点不能完全归咎于过渡时期……显然，现有组织的成员的数量，主要是质量在这方面起着不小的作用，所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严格挑选成员的条件下把各个组织切实地统一起来。

这些人一提到“理论家”这个词就做出一副极端鄙视的怪样子，而把自己对缺乏实际经验和不开展状态的崇拜称为“对实际生活的敏感”，其实他们不过是暴露自己不了解我们最迫切的实际任务而已。他们向那些落伍的人喊道：齐步前进！不要抢先！他们向那些在组织工作中缺乏毅力和首创精神，缺乏广泛而大胆地开展工作的“计划”的人高喊“策略-过程”！

正是因为手工作坊式的运作导致有效文章数量过少，而过多的流水账文章和其本质上是一致的。文章写出来，要有突出典型，对于广泛的群众要有普遍性和共性。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特殊案例一一分析。我们要分析事件的整体和一般性进行指导，让群众补充事件的细节部分和特殊性。一个统一、全国的、能集中和组织起工人的机关报，就是职业革命家要负担起的职责之一。通过这个报纸，或者说同等作用的载体，组织集中整个运动。

当运动还没有创造出从事大生产的力量时，当运动还拘泥于手工业方式，还几乎完全沉溺于“工厂生活琐事”中的时候，这就是贫乏的表现。而当运动已经完全能够执行全面揭露和全面鼓动的任务，因而除了中央机关报之外，还需要有许多地方机关报的时候，这就会是富裕的表现。

在每个社会民主党报纸上都应当有工会斗争（经济斗争）栏，这未必有谁会怀疑。但是工会运动的发展，也使人不得不想到工会报刊的问题。然而我们觉得，除了极少的例外，在俄国暂时还谈不到工会报纸的问题。这是一种奢侈品，而我们往往连糊口的面包都没有。在我国，适合于秘密工作条件并且现在就很需要的工会报刊形式，应当是工会小册子。在这种小册子里，应当把公开的和秘密的材料，如有关本行业的劳动条件，本行业的劳动条件在俄国各地的区别，本行业工人的主要要求，本行业的立法的各种缺点，本行业工人的经济斗争中的突出事件，他们的工会组织的萌芽、现状和需要及其他等等问题的材料，都收集起来，并加以系统整理。

在众多的左派团体内部，我相信肯定是有分工的，连分工都不要的蠢蛋不多。可是，很多人缺乏在社会层面去把握分工的意识。左派不能够联合起来集中力量去建立一个专业化的秘密组织领导行动。由于缺乏人手，想要细致分工下去几乎成为了不可能。我们的工作如果分工的越发细致，将不同步骤中能公开和不能公开的部分进行“工业化”的分工，一些不涉及组织秘密的分工步骤完全可以交给非职业革命家的人去完成。不这么做就不能从全局去认识，也不能从整体上更广泛地联系群众和领导群众运动。

把组织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是说要把运动的一切职能集中起来。最广大的群众积极参加秘密书刊工作，不但不会因为“十来个”职业革命家把这方面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而减弱下去，反而会因此而十倍地加强起来。这样，并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使阅读秘密书刊，为秘密书刊撰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散发秘密书刊的工作都几乎不再是秘密的事情，因为警察很快就会懂得，对散发的成千上万份出版物中的每一份都要履行一套司法和行政的公事程序，是很愚蠢的而且是办不到的。

群众组织和革命家组织不能混同

经济、政治斗争是公开的，必然需要职业革命家的领导。经济、政治斗争不能搞秘密。秘密的斗争、没有公开的事实，只会让中修利用自己的宣传机器把握住舆论风向，更是让破坏分子可以在暗中肆意运作。因此，广泛的经济、政治斗争应该以群众组织形式展开，在安全性上应当和革命家组织进行隔离，让革命家组织承担起继承性和延续性的职责。而群众组织应当吸纳一切反对中修的力量！在这种广泛的斗争中，不断地让群众认识到资产阶级隐藏在面具背后的獠牙，让群众认识到那个早就架在脖子上的国家机器的利刃，让群众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人类的希望。既然开展了广泛的斗争，那么更需要秘密的革命家组织对抗其中的奸细和特工，更需要职业革命家的领导下进行真正的无产阶级为主导的斗争。

N. N. 先生在自己的《答复》中写道：“‘劳动解放社’要求同政府进行直接的斗争，却没有考虑一下这种斗争所需要的物质力量何在，没有指出斗争的道路何在。”这最后几个字作者加上了着重标记，并且对“道路”一词加了这样的注释：“这种情况决不能用保守秘密来解释，因为纲领中说的不是密谋而是群众运动。而群众是不能走秘密道路的。难道能有秘密的罢工吗？难道能有秘密的示威和请愿吗？”

我们看一下群众组织以及秘密组织的区别：

第一，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第二，它应当是尽量广泛的组织；第三，它应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自然，我在这里以及下文中都只是指专制的俄国而言）。相反，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因此，我说是革命家组织，我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既然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用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这种组织必须是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

但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忘记工人运动合法化归根到底只会使我们获得好处，而决不会使祖巴托夫之流获得好处。恰恰相反，我们正是要用自己的揭露运动来分清莠草和小麦。关于莠草，我们已经说过了。而所谓小麦，就是吸引更广泛的和最落后的工人阶层来注意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是使我们革命家摆脱那些实际上是合法性的工作（如散发合法书籍，组织互助会等等），这些工作的发展必然会供给我们愈来愈多的鼓动材料。…

…那我们就要说：请吧！只有真正扩大，哪怕只是稍微扩大工人的活动范围，那才是真正前进了一步。凡是这样的扩大都会有利于我们，并且会加速合法团体的出现，在这些团体里，不会是奸细抓住社会党人，而是社会党人抓住自己的信仰者。总而言之，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清除莠草。我们的任务不是在温室的瓦盆里培植小麦。我们把莠草拔掉，从而清出土地使麦种发育成长。而在阿法纳西·伊万内奇之流和普尔赫丽娅·伊万诺夫娜之流从事温室栽培的时候，我们则应当训练出一些既会锄今天的莠草，又会割明天的小麦的人。

我们要在领导工人的斗争中培养职业革命家，而不是让有才干的人倒退到“中等人”和“群众”中去。既然要培养职业革命家，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去满足他们小资产阶级式的苦行僧殉道情怀，而是要去学会如何将工人们组织起来，学会组织起来斗争，学会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革命事业具体的有机的结合起来。我们应该用组织的力量保障着至少一部分的人员可以减少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疲劳，免受超长时间工作的折磨，以至于有时间能够进行宣传材料的撰写，革命理论的编辑，组织人员的工作等。

凡是有些才干和“有希望的”工人鼓动员，都不应当在工厂内做 11 个小时的工。我们应当设法使他靠党的经费来维持生活，使他能够及时地转入秘密状态，使他能随时更换自己的活动地点，否则他就不能获得丰富的经验，不能扩大自己的眼界，不能同宪兵至少周旋几年之久。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愈广愈深，他们所能提拔出来的有才干的人也就愈多，不仅有有才干的鼓动员，而且有有才干的组织员、宣传员以及褒义的“实际工作者”（这样的实际工作者，在我们那些多半带有一点俄国式的懒散和呆板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当我们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当然是“所有各个兵种”的革命家）队伍的时候，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战胜这支队伍，因为这支由无限忠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会获得最广大的工人群众的无限信任。我们真正的过错，就是我们很少“推动”工人走上与“知识分子”共同的、学习革命专业技能的道路，却经常用工人群众和“中等工人”“能够胜任”什么的愚蠢议论来把工人拉向后退。

从融工同志的个人方面来看，对于尚没有经验和锻炼的同志容易消磨斗志。任何一个青年的激情我们都要去珍惜，这是燃起革命之火的开始。让一个尚未学会走路的人先学会负重前行，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同时这些人时间上也不可能保证学习和训练。我相信做过一天 12 小时工、顶着生理和心理双重压力的人都知道，每天能走回宿舍让自己放松下来就已经是莫大的坚强了。难道我们要预先假设每一个融工的同志都是天生体力毅力超群的人？或者要先等一等培养到极高素质后再开展行动？恐怕都不可取。当下，我们还是需要进行融工的革命分子，在组织没有条件提供保障的情况下，暂时地忍受着极为恶劣的工厂工作条件，跟工人们同吃同住，并且拿出共产党人的决心和毅力同时做工人的组织和鼓动工作，一步步走向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以整体来说，我们是要领导群众运动，而不是服从于群众的自发性。虽然受到压迫的群众往往会自发起来反抗，但是这种自发反抗毫无疑问是“经济主义”之列的行为，我们不该沉湎于此，而是要进一步，让他们从经济主义走向政治斗争来，在斗争中成长并扩大。

在这几方面，也像在其他各方面一样，组织工作规模狭小，同缩小我们的理论和我们的政治任务，有明显的和密切的（固然是绝大多数“经济派”和新的实际工作者所不了解的）联系。崇拜自发性使人害怕得连一步也不离开群众“能够胜任的事情”，害怕升到太高出于简单地适应群众目前的直接要求。别害怕，先生们！请记住：我们的组织水平非常低，连我们可能提得太高这种想法都是荒谬的！

左翼里最大问题是资产阶级法权渗透的风险吗？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不懂“联合”！面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渗透，马克思主义者居然要采用防御姿态，缩在墙角里不敢迈出去。给出的理由不外乎外部力量过于强大，我们不能公开广泛斗争，只能采取一种防御姿态积蓄力量反攻。一个人生不生病，最大的因素往往是自身的免疫系统会不会被击溃。似乎躲在温室里久了，能让资产阶级瑟瑟发抖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成为了一朵朵娇花，经不起这点考验。可笑的是，这一切都还是中修没有渗透进来的前提下。真正的群众组织不会被击垮，真正的革命家组织也不会怕渗透。与其说敌人太强大，不如自己太软弱，因为理论上、组织上的不足，他们甚至没有自信扛得住资产阶级的“余波”。更不要说去接触群众、融入群众、相信群众、教育群众的革命工作的开展。这一切就是将秘密的革命组织和广泛的群众组织混为一谈的结果！

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使群众中本来已很模糊的一种认识完全消失，也就是使他们忘记要为群众运动“服务”，就需要有一些人专门献身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且这些人应当坚持不懈地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

你们这些关心“中等工人”的先生一讲到工人政治或工人组织就想到必须弯下腰来，实际上这毋宁说是对工人的侮辱。你们还是直起腰来谈严肃的问题吧，你们还是把教育交给教育家，而不要把它交给政治家和组织家！难道在知识分子中就没有先进分子、“中等人”和“群众”吗？难道大家不是都认为知识分子也需要通俗读物吗？难道不是有人在写这种读物吗？但是，假定说，一个作者在他写的一篇论大学生或中学生组织问题的文章中，像有什么新发现似的再三说明，必须首先把“中等大学生”组织起来，这样的作者一定会受到讥笑，并且理应受到讥笑。人们会对他说：假如你在组织方面真有什么见解，那么就请你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至于我们中间谁是“中等人”，谁高些，谁低些，到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弄得清楚的。如果你在组织方面没有自己的见解，那么你硬要谈什么“群众”和“中等人”，就只能是一些枯燥无味的玩意儿。你要知道，“政治”问题、“组织”问题，这本身就是很严肃的问题，所以谈这些问题就必须十分严肃。可以而且应当训练工人（以及大学生和中学生），以便有可能同他们来谈这些问题，但你既然谈到了这些问题，那就要作出真正的回答来，而不要倒退，退到“中等人”或“群众”那里去，不要拿一些花言巧语来敷衍塞责。

哪种组织需要委任制？

大群又发文指责东风是反对委任制。麻烦大群的作者好好看一下，东风反对的是是什么！我们东风是反对没有在民主基础上进行的集中制。我们认可的委任制有几种情况，一种是

我们在各级组织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组织代表，构成一个集体的领导层，再民主地委任各级机关领导干部和专业人员；一种是在紧迫条件下，没有实施民主选举的条件下（例如即将开战，或者战斗进入到决战时刻），我们认为就要进行临时委任，由上级机关指定任命领导干部。

职业革命家不是委任出来的，职业革命家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脱离群众去培养革命家更是痴人说梦。不能从整体上去认识形势、开拓眼界，不能在斗争中学习积累经济斗争经验走向政治斗争，我们难道是指望一堆书本就能堆出个革命家和革命的形势吗？还是说目前尚未和群众构成广泛联系的哪个左翼团体就有完全的自信能说：“我是先锋队！我能指明方向！”

让我们言归正传吧。我们已经讲过，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只是口头上主张必须全面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那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有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呢？有没有在其他一切阶级中进行这种工作的基础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放弃或者导致放弃阶级观点呢？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些问题。

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工作应当研究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切特点，这是谁也不怀疑的。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少很少，同研究工厂生活特点的工作相比，未免太不相称了。在各个委员会和小组中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甚至埋头于专门了解某一炼铁生产部门的情况，但是你们几乎找不到例子，说明这些组织的成员（往往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得不脱离实际工作）在专门收集我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某种迫切问题的材料，而这种问题可以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在其他居民阶层中进行工作的依据。当我们说到现在大多数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缺乏修养时，也不能不提到这方面的修养问题，因为这也是和“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经济主义”见解有联系的。但主要的任务当然是要在一切人民阶层中进行宣传和鼓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容易执行这种任务，因为那里有各种群众集会，凡是愿意参加的人都可以参加；那里有议会，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对一切阶级的代表讲话。我国既没有议会，又没有集会自由，但我们还是善于把那些愿意听社会民主党人讲话的工人召集起来开会。我们也应当善于把居民一切阶级中那些即使只愿意听民主主义者讲话的人召集起来开会。因为谁在实际上忘记“共产党人支持一切革命运动”，忘记我们因此也就应当向全体人民说明和强调一般民主主义任务，同时一分钟也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那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谁在实际上忘记社会民主党人在提出、加剧和解决任何一般民主主义问题方面有责任走在大家前头，那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列宁相信在广大的工人队伍中一定有着拥有天分和才干的领袖人物，如当时的倍倍尔就是从在工人斗争中脱颖而出的职业革命家。同志们，你们也信列宁所信的吗？从本质上说，先锋队在于勇敢地大胆地提出我们的策略，走在运动的前面，领导着运动的前进。同时我们又要在实际工作中施行着我们的纲领和策略。

我们永远不能使广泛的组织具有高度的秘密性，而没有这样高度的秘密性就谈不到稳定的和保持继承性的反政府的斗争。把所有秘密的职能集中在数量尽量少的职业革命家手里，这并不是说他们将“代替大家动脑筋”，并不是说群众不必积极参加运动。恰恰相反，这些职业革命家将从群众中愈来愈多地涌现出来，因为那时群众就会知道，单是几个学生和几个从事经济斗争的工人集合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是不够的，还需要用多年的时间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那时群众就不会一味为手工业方式“动脑筋”，而会为这种培养工作“动脑筋”了。把组织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是说要把运动的一切职能集中起来。

的确，这种认识已经极其模糊了。我们在组织方面的主要过错，就是我们由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而败坏了俄国革命家的威信。一个人在理论问题上软弱无力和动摇不定，眼界狭小，用群众的自发性来为自己的萎靡不振辩护，他与其说像人民的代言人，不如说像工联书记，他不善于提出广泛的大胆的计划来使敌人也肃然起敬，而且在自己的专业技能即同政治警察作斗争方面没有经验，笨手笨脚，——对不起！这样的人决不是革命家，而只是可怜的手工业者。

如果是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委任他而不是让给他去领导呢？毛泽东同志是靠着委任上来逐渐成为职业革命家、担任群众领袖的吗？不是！他是在不断斗争中从群众中脱颖而出的。群众不会写简答题，但是一定会做判断题，是臭鸡蛋还是香饽饽群众能闻出来！群众还没认可你，自己凭什么说自己是先锋队？自封先锋队的人是不是认为群众是傻子？如果真的建立了先锋队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左派既没有在群众中建立起一个深度广度足够的群众组织，也没有建立起一个专业化的革命家组织？既然做不好就不要把原因归结为外部因素带来的困难和干扰，要多考虑自己内部究竟哪儿出了问题！

革命家组织不能要“民主制”的儿戏！

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领导组织是需要保密的，肯定也不能开展民主集中制。将秘密的革命组织和广泛的群众组织混为一谈是愚蠢的行为。群众组织进行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必须要公开广泛。我们要的是团结社会的大多数，门槛过高的群众组织排除了可以争取和领导的中间力量，同时又掐断了继续教育、培养马克思主义的职业革命家的来源，掐断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群众联系的路径。难道我们只能依赖自己“觉悟”的群众来作为职业革命家的后备军吗？为什么要崇拜于各式各样的“自发性”？

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工人事业》所讲的那些响亮词句的真正意义，就可以知道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说它是一种毫无意思的儿戏，是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组织从来也没有实行过什么广泛民主制，而且无论它自己多么愿意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说它是一种有害的儿戏，是因为贯彻“广泛民主原则”的尝试，只会便于警察进行广泛的破坏，永远保持目前盛行的手工业方式，转移实际工作者的视线，使他们放弃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这种重大的迫切任务，而去拟定关于选举制度的详细的“纸上”章程。

只有在国外，由于没有可能找到真正的实际工作来做的人常常聚集在一起，这种“民主制的儿戏”才能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各种小团体中间广泛流行。

专制制度的国家里，这种坚强的革命组织按其形式来说也可以称为“密谋”组织，因为法文的“conspiration”（“秘密活动”）一词相当于俄文的“密谋”，而秘密性是这种组织所绝对必需的。对这种组织来说，秘密性是最必要的条件，其余一切条件（如成员人数、成员的挑选、职能等等），都应当同这一条件相适应。

革命家组织内要不要民主集中制呢？要！但是肯定是区分作用的范围。之所以不能开展广泛的民主活动，是因为需要让革命家组织保证安全和秘密。但是在安全范围内，我们是能够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精神开展组织。我们现在拥有互联网这种广泛的、快速的通信渠道，对于群众组织工作展开是很有利的，对于公开的这种组织，应当充分践行民主集中制的精神。而我们革命家组织的则不能这样，应当集中起来，在组织内部开展民主。职业革命家组织肯定不是一个扁平化的、固定形式的组织，一定是有若干领导人物牵头，收集、整理、归纳出各方的信息和意见，并在组织内部进行广泛的讨论、表决。组织内部的民主不能保证一定不犯错，但是可以减少错误的发生——领袖人物和民主表决当然是统一的！那么革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之间要不要民主呢？要民主，但是不能僵化地照搬民主的形式。要采纳、汇总、整理各方反馈的信息，不断培养选拔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职业革命家集中到秘密组织，而不能因为需要民主就忘记了公开性的危险。

统一战线方： 论我们同东风的最近分歧

中国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联盟

“当下我们工作的主要矛盾是法西斯专政压迫和我们落后的组织性间的矛盾。”这是最近一次中国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联盟会议通过的一条关键决议的内容。之所以会通过这样一条决议，首先就是为了描述目前“社会主义运动落后于群众自发运动”这个明显事实背后的主客观矛盾。（即使是东风最“谦虚的”代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这点的）现在我们的全部问题就在于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消灭目前中国马列毛主义者在组织上的落后？正是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东风的“列宁们”和联盟之间爆发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本文讲尝试系统的阐述我们关于上述关键问题的观点，并分析我们与东风的矛盾。

东风的“列宁们”认为目前最紧要的是“摆脱因为广泛的群众组织和革命家组织混同不清的手工作坊。”[1]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目前我们的落后性主要在于混同了革命家组织和广泛的群众组织，从而导致“当下左翼势力的整体情况都是一种手工作坊式的发展”[1]东风的“列宁们”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还专门写了篇长达 9221 字的豪文——《当前缺的是职业革命家》；不过我们在这里并不打算全面地批判那篇缝合僵尸（本文作者的这篇文章去掉列宁《怎么办》第四章的内容，就只剩下 3637 字了），我们只需要分析主要分歧就可以了。

当谈到我们工作的落后性时，这里的“我们”显然指的是马列毛主义者，而且首先还是指的革命联盟，至于那些可悲的泛左翼小丑，我们现阶段没有意愿也没有精力去管他们。结果我们东风的“批判家”在全文中对联盟只字不谈，却空谈什么“当下左翼势力的整体情况”这种对于解决具体矛盾毫无意义，而且人尽皆知的废话。实际上，革命社会主义阵地从第一期杂志的第一篇文章就已经在批判泛左翼的许多现实问题了，我们并不需要东风的“列宁们”不断地告诉大家泛左翼的情况如何糟糕，我们更应该关注我们自己该如何破局。（顺便说一下，东风的“批判家”在谈到泛左翼的问题以及文中的其他问题时，几乎都没有进行任何论证，全都是在下结论，或整篇地摘抄《怎么办》第四章的内容）即使我们不论作者这里莫名其妙地谈“当下左翼势力的整体情况”，他们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情况的判断也是错误的。列宁在 1902 年用“手工作坊”这个词，首先指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小组的工作是多么的局限于某地或某个行业，革命者是多么的缺乏实际工作素养。但是目前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程度，根本就还没有到在各地（至少是主要工业区）已经展开了一定组织工作的阶段。换言之，现在的问题压根不是突破工作局限，而是展开工作！但是在东风的“列宁们”看来，情况则压根不是这样的，他们认为我们至少已经有了“广泛的群众组织”；这里的广泛的群众组织是什么呢？是真正的，有组织动员力的群众组织吗？是受到我们广泛影响的实际组织吗？还是说这里指的是网上那些鱼龙混杂的群聊？考虑到现在我们压根就还没有在各地大量开展群众工作，我们合理怀疑这里说的“广泛的群众组织”实际上是那些泛左翼群聊。这就非常有趣了，东风的代表认为我们把“革命家组织”（八成是指的“革命家”群聊）和那种泛左翼“线上组织”（这个词东风代表从一开始就在谈，结果最后他们又指责

是我们在谈什么所谓“线上线下”的划分，现在他们又把进行这种愚蠢划分的责任扣在联盟头上，实在是奇异搞笑，我们待会会专门谈谈这个问题）混同的情况导致了组织的手工业化。但是即使是手工业组织也是实际的革命组织，他们的问题在于工作的局限和落后，而我们的问题却在于压根没有在各地开展广泛的群众工作，压根就还没有做事，又何谈做的不好？

事实上，在我们看来，目前我们组织的落后性首先就体现在实际的组织宣传工作的不开展上。请各位思考一下，我们目前缺干部，缺联系，缺团结，缺组织的原因是什么？哪怕我们现在真的获得了东风部分人想要的那种“秘密的革命家组织”，它能够改变我们目前毫无群众基础的事实吗？东风的“列宁们”咆哮着问“我们的组织方式和群众的联系方面真的做的很好吗？白纸运动又有几个左派知道并尝试参与并尝试领导过？我们是不是掉入了‘尾巴主义’？”[1]我们只能告诉阁下，你说的完全正确，但是我们目前落后于群众运动压根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过于局限，限于了各地小组各自为战的小作坊工作模式，而在于阁下这样的空谈家长期阻碍马列毛主义者到群众中去进行组织宣传工作，正是因为阁下这样的人幻想用列宁解决1902年实际工作者问题的办法，来解决尚且连1895年的工作都尚未进行的中国革命的问题。我非常想要采访一下东风的“列宁”先生们，你们认为，我们如何优化一个我们压根没有大量进行的东西？我还想请问本文的作者，阁下认为我们如果不进行实际群众工作，又该如何获取大量的、可补充的干部？又如何把各种宣传资料送到群众手中？又如何在全国各地（至少是主要工业区）建立组织分部？又如何建立广泛深刻的群众基础？而假如上述东西我们一概没有的话，我们又何谈进一步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大工业式组织宣传系统呢？

当然了，我们亲爱的东风的“革命家”先生们是自然不必回答这些问题的，他们可以声称“这篇文章对于东风的批判完全是建立在对东风的臆测上，有的同志甚至不知道同志想批判什么。”但是要判断我们究竟是否是在臆测，我们说的东西是否切实，应该做的是将东风的路线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的现实情况进行对比，而不是单纯下结论却不加以论证，或是通过否认事实来为自己脱罪。东风代表声称通过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我们是在臆测他们，这个例子居然是“东风从未指责革社让‘线下指挥线上’。”但实际上，东风在联盟的代表在12月12日的时候明确表示过“以革社为首的组织提出的联合融工队的路线……没有任何的权威。”“因为此时的线上已经对线下已经没有了任何约束力，而且在革社为首的人员看来，线下组织是核心，线上工作是‘太多了’是可以取消的。”我们且不谈革社何时认为“线上工作是‘太多了’是可以取消的”（我们一向认为现有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只是一切工作都应该为直接接触到工人的实际组织宣传工作服务），单就是我引用的东风代表在联盟的这段发言，我想就足以说明究竟是革社在臆测东风，还是后者的代表对自己的言论毫不负责，对同志坑蒙拐骗。

现实就是，我们的人力严重不足，经验也十分匮乏，理论工作者队伍有一些，但其中充斥着百无一用的空谈家，至于实际组织家和宣传员，更是少得可怜。面对这种情况，即使是最浅薄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难明白，我们要做的首先应该是把我们能调用的优秀力量集中起来，到群众中最先进的部分中，到和社会化大生产最关联密切的那群人，既产业工人中进行组织宣传工作。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实际的群众工作中贯彻我们的纲领路线，扩大我们的干部储备和群众基础，否则别说是办一份能够影响到全国劳动者的政治报（就像东风代表和本文作者现在幻想的那样），那怕是继续生存下去，保证组织不退化恐怕都成问题。这里我举

一个现实的例子来说明这个简单的道理。美国毛主义共产主义联盟的同志们早在七年前就已经开始活动了，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能够创作大量非常优秀的文章了，也尝试做了不少群众工作，但这些工作主要局限于组织房客和学生进行斗争。这样的活动进行了多年，但组织一直没有取得明显进步，甚至内部还冒出来一些非无产阶级路线；直到最近一年半以来，当他们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产业工人中后，毛共联盟在规模和质量上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前段时间，得益于他们已经在全美各地的许多工会中，甚至许多曾经没有任何组织的地方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宣传工作，他们才在最近美国风起云涌的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锤炼和发展，整个组织也从过去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的组织，逐步向以产业工人为主的组织发展过度；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在组织内部的路线斗争中进一步巩固了其核心地位。美国同志之所以能取得这些可喜的成就，主要靠的就是到产业工人中去。

我们要前进，要想消灭中国马列毛主义者和群众零结合的情况，首先要做的自然也是到产业工人中去进行活动。结果这个时候东风的代表又在联盟委员会里跳出来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压根还没有能力到群众中去！现在派人直接到群众中去是自发主义的盲动行为！”是的，东风的“革命家”们，我们毫不否认你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进行群众工作，但请告诉我们为何你们敢大言不惭地断言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为何敢说我们的融工计划是盲动的，是自发的？革命社会主义阵地为了进行融工工作已经准备了很久了。我们从一开始就在理论上、逻辑上探讨融工的可能性，我们分析中国左派的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我们关于融工问题的文章早已是汗牛充栋。后来各个先进组织组成联盟，起草通过《联盟纲领》，这本身就是在准备马列毛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为接下来统一的实际工作打下政治思想基础。联盟接下来也在理论工作上、知识分子内部的宣传工作中基本实现了革命者初步的联合。现在的我们已经集结了一批在理论上和素养上经过长期观察，值得信赖的革命团队。其中有的同志，甚至已经用实践证明了联盟的融工路线是完全可行的。结果到头来，我们进行了那么多理论上、人员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后，东风的小丑居然跳出来，告诉我们这一整个融工计划居然都是盲动！这真是好一个盲动啊！毕竟在东风的部分人看来，目前搞“一个统一、全国的、能集中和组织起工人的机关报……或者说同等作用的载体，组织集中整个运动”[1]才不叫盲动。实际上，东风的这个计划才是真正的盲动。我们已经在联盟中，以及包括上文在内的各种地方反复说明，现在我们压根就没有遍布全国的马列毛主义工人组织，所以我们压根没法建立代办员网络，进而编辑部也就难以了解各地的实际斗争情况，政治宣传材料自然也就难以到达群众手中。综上，现在我们缺乏搞“全俄政治报”的基本前提的情况下，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到工人中去建立一定数量的组织。结果东风的“列宁们”却不乐意了，他们跳出来，指责我们是要让运动倒退到“中等人”（殊不知当年列宁批判的是某些人像把宣传局限于所谓“中等工人”，而不是指的运动），指责我们要让运动停留在手工作坊阶段。你若是问他们具体的解决办法，他们就告诉你，只需要把现有各个联盟组织的网络编辑部统一起来就行了。东风的代表可能以为现实政治和过家家差不多，只需要把几个主要向知识分子宣传的政治读物统一起来，就可以算得上是“全国政治报”了。可惜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内部的各种材料本身就是非常不同的。有的组织的材料是月刊，有的是日报；有的偏向理论研究，有的偏向宣传鼓动。即使是把这些在目前强行统一起来，那也不过是把现有的各种材料换个名字罢了，而根本不能凭空生成遍布全国的代办员网络与各地小组的实际活动的基础上建立的全国政治报。而且，目前在政治材料的写作上，我们革社每个月都能产生大量根据国内外实际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以及各种统计材料而创作出来的文章，反倒是东风自分裂以来有质量的创作越来越少，甚至东风许多回应其他组织攻击的文章，实际上大多都是我们帮忙写的。结果东风的“列宁们”到头来还非常自信地说什么“正是因为手工作坊式

的运作导致有效文章数量过少，而过多的流水账文章和其本质上是一致的。文章写出来，要有突出典型，对于广泛的群众要有普遍性和共性。” [1]你快去，多么完美的自我介绍啊！东风组织自己的文章确实是类似流水线式的，例如最近这篇文章就是这样，与其说是作者自己的文章，不如说是《怎么办》第四章的批注，而且还是打乱了列宁原有逻辑，引用了大量列宁引用的别人的话的批注。东风自己的文章，已经因为空谈众所周知的大道理和口号式的宣讲，多次遭到大群的机会主义者攻击了；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大多都是主动出击，目前还从来没有遇到过理论上能敢于主动向我们发起像样的进攻的。我们的同志，根据大量的事实、数据，经过科学分析的文章如果也能被称为无效的、流水账式的文章的话，那么东风部分人的创作（特别是本文作者），就完全是废纸了。不过考虑到东风部分人可悲的理论水平，极少做论证分析，而大量下定论的习惯，以及经常出现的扭曲是非、虚空打靶的内容，我们合理怀疑他们的文章确实多是废纸。

东风的部分人不但在理论上相当离谱，他们的代表在统一战线的实际联盟事务中也非常逆天。东风的代表曾对各组织代表说什么“列宁相信在广大的工人队伍中一定有着拥有天分和才干的领袖人物，如当时的倍倍尔就是从在工人斗争中脱颖而出的职业革命家。同志们，你们也信列宁所信的吗？从本质上说，先锋队在于勇敢地大胆地提出我们的策略，走在运动的前面，领导着运动的前进。同时我们又要在实际工作中施行着我们的纲领和策略。” [1]这里东风的代表既然谈到了纲领，我们也就不得不提一下这个问题了。我们知道任何加入统一战线联盟的组织都必须承认和执行《联盟纲领》，将《联盟纲领》确定为组织唯一的政治指导路线，这是包括东风代表在内的各个组织在会议上一致通过的，而且东风和革社还是最早一批签署《联盟纲领》的组织。结果我们亲爱的东风代表，几个月过去了，居然压根就没看完《联盟纲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的东风代表能力非凡，哪怕没看完《纲领》也丝毫不妨碍他们灵活改变自己对待《纲领》的态度。正是那个没有看完《纲领》的东风代表，正是那个指责我们根据臆想批判他们的东风代表，一开始在联盟会议上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自己承认《纲领》，而最近同样的那个东风代表又突然告诉我们自己反对《纲领》了！（至于为何反对，按照东风某些代表的传统来说自然是完全可以不必负责或胡说一通的）这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东风某些人长期背着联盟却推动东风执行一份自己独立的、秘密的政治纲领，这份充满了各种组织架构细节问题和口号空谈的纲领，直到最近矛盾爆发后，在联盟其他代表的反复强烈要求下，才第一次为人所见。事情到了这里，东风如果还愿意继续在联盟内工作的话，理应公开放弃独立纲领，结果他们的代表反倒指责起自己两个月前通过的《联盟纲领》有重大问题！还非常自信地声称“先锋队在于勇敢地大胆地提出我们的策略，走在运动的前面，领导着运动的前进。”如此厚颜无耻之徒，我们还是头一次在贡派以外的，自称马列毛主义的组织里看到。

现在，东风的部分人，不断告诉别人，他们是受到了迫害，是受到了我们的排挤，甚至还声称自己没有放弃革社和公社！面对这样的一种自信力，我本人已是完全顺从。东风的代表非常善于把我们的观点截取三分之一，对外声称是他们自己的观点，然后再杂糅到自己原先混乱的观点中去，从而来攻击我们。（这点我们刚才在“臆测”那里已经见识过了）东风部分人说的“职业革命家不是委任出来的，职业革命家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脱离群众去培养革命家更是痴人说梦。不能从整体上去认识形势、开拓眼界，不能在斗争中学习积累经济斗争经验走向政治斗争，我们难道是指望一堆书本就能堆出个革命家和革命的形势吗？还是说目前尚未和群众构成广泛联系的哪个左翼团体就有完全的自信能说：‘我是先锋队！我能指

明方向！’”这段话几乎就是我们在联盟中所说的原话，在《联盟纲领》中也有非常类似的表述。结果前几天还在反对它的东风代表，现在东风的部分人却把它偷去了，用来攻击我们，说什么“群众不会写简答题，但是一定会做判断题，是臭鸡蛋还是香饽饽群众能闻出来！群众还没认可你，自己凭什么说自己是先锋队？自封先锋队的人是不是认为群众是傻子？如果真的建立了先锋队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左派既没有在群众中建立起一个深度广度足够的群众组织，也没有建立起一个专业化的革命家组织？既然做不好就不要把原因归结为外部因素带来的困难和干扰，要多考虑自己内部究竟哪儿出了问题！”[1]是的！东风确实“要多考虑自己内部究竟哪儿出了问题”，只不过我们非常好奇了，既然联盟的存在目的本就是为重建中国工人先锋队做准备的，那又何谈我们“自封先锋队”呢？我们不知道这里批判那些自封先锋队的人有何意义。目前在中国自封先锋队是像“中共毛”、“中革共”等小丑，东风这里的批判对象显然不是他们；虽然他们看似再说大群，但考虑到最近与他们爆发矛盾的实际是我们，其内容也是完全针对我们这之间的全部争论内容的，因此我们非常有理由认为（你看这一定又是臆测，又是我们缺乏基本的理解能力！），这里实际上是在影射我们。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这里就是在彻头彻尾的污蔑了。

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我们的老朋友还是采用的类似把戏。一开始的时候，东风代表明确向我们表示过，“民主是民主集中制的核心。”（这是对的）“民主的核心，主要在于投票选举制（！）”现在，他们本文又在空谈什么“我们现在拥有互联网这种广泛的、快速的通信渠道，对于群众组织工作展开是很有利的，对于公开的这种组织，应当充分践行民主集中制的精神。而我们革命家组织的则不能这样，应当集中起来，在组织内部开展民主。职业革命家组织肯定不是一个扁平化的、固定形式的组织，一定是有若干领导人物牵头，收集、整理、归纳出各方的信息和意见，并在组织内部进行广泛的讨论、表决。”[1]作者空谈了一堆漂亮话，但是实际情况如何呢，东风组织真的是一个民主组织吗？我们这里就讲两个故事，第一件事是这样的，一段时间前，东风发现了一位工人，这个工人把自己吹捧了一番，把自己组织工人斗争罢工的经历描述的像小说一样精彩。于是东风高层部分人员立刻拜倒于此人，执意要把他直接纳入组织，这直接导致了东风内部的意见分歧，有许多人不认可。结果东风高层的部分人直接清除了或者说是逼走了反对者（其中包括一些联盟代表），这些反对者也没有进行斗争，在尚未向联盟报告的情况下就直接退出了。当时我们的代表就指责东风代表没有向联盟汇报内部的重大原则分歧，违反了《纲领》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结果东风代表对此完全不以为意。第二件事是东风编辑部的一位同志发表了一篇支持联盟融工路线的文章，结果东风的代表对此压根一无所知，那篇文章的作者也对他们代表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情。而我们其他组织的代表，每一个人的观点，都与所有成员，在原则上是一致的，非常能够代表全体成员的意见。在我们这里，从来不会打压异己意见，哪怕是我们中贡献最大，最受人尊敬的同志，我们也经常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与其爆发矛盾，但却没有任何人，因此受到任何惩罚。究竟谁在践行民主集中制，我想明眼人自有论断。

本文作者虽然整篇文章，几乎都在抄列宁，但是我们合理怀疑他们几乎没有理解列宁在说什么（讽刺的是，他们还指责我们虽然熟读列宁，但却对列宁一无所知）。例如认为应该追求这样的“革命家组织的人数应当尽量少到能维持其正常运作就可以，甚至不需要固定的形式。这样可以有效降低受到军警部门的打击的风险。这些人必须是集中的、专业化的，既要有精神上的毅力和胆魄，又要有足够的经验和手段去领导斗争。”[1]作者在这里混淆了革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正如列宁所说“第一，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第二，它应当是尽量

广泛的组织；第三，它应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自然，我在这里以及下文中都只是指专制的俄国而言）。相反，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因此，我说是革命家组织，我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2]（这段话在后文也抄下来了）结果到了作者这里，他们却把“不必有任何固定的形式”这一工人组织的特点，当成了“革命家组织”的特点。这只能证明作者不但学术道德败坏（全文引用占比高达60.5%），而且连起码的阅读理解能力都不具备。要知道我们这里谈论的可是职业革命家组织，这样的组织如果不按照极其严格、专业的模式加以秘密组织的话又该如何存在呢？这个如此浅显的道理作者都无法理解，还非常自信地把它写在了全文开头，我们只好再次顺从了。

正如刚才所说，东风的代表一开始还非常热衷于指责联盟试图让融工队变成独立于现有组织的新组织，指责我们是要让“线下指挥线上”（当然，东风代表现在已经忘记自己几天前的观点了），还指责我们过度强调线上线下的工作划分。不过问题根本不在这里，如果不是你们在一直提的话，我们没有人会热衷于探讨线上线下这个奇异搞笑的划分，我们之所以这么谈，只是因为习惯罢了。实际上，线上线下的工作划分模式，本身就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长期以来的落后性。人们长期不做实际工作（这里我说的不一定是实际组织宣传工作，包括理论科研工作也算），沉迷于在网上空谈闲聊，以至于随便什么人，但凡在群里上个线，吹个水，也敢自称是线上工作者。你若是问他具体干了什么工作，他就谈谈众所周知的大道理。你若叫他去做实际组织宣传工作，他就告诉你，他要去做理论工作，要当“马克思主义的教皇”，搞得自己真是理论家一样。实际上，真叫这些人去研究下房地产问题，去研究下疫情以来为何美联储利率会抬升这种具体问题，他们就又变成隐士了。这种百无一用的人，正是一直毒害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空谈家，而东风由于部分人的影响，现在正变成了一个充斥着这种人的地方。当我们说，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把优秀力量投入到组织宣传产业工人时，他们也在一开始表示支持，但这些人一听到12小时的工作制（这在国内是非常普遍的，许多地方甚至是14小时）就表示拒绝了，他们认为我们是要取消职业革命家（实际上压根不是我们要取消职业革命家，而是现在的运动压根还没发展到足以支撑起一支职业革命家队伍的阶段）；为此，他们还搬出列宁打掩护，却根本不知道，我们只有在实际斗争中，把中国工人组织起来了，动员起来了，才有可能争取到8小时工作制，甚至是4天6小时工作制，进而才有可能让运动负担起职业革命家队伍，才有可能为职业革命家的活动创造空间。而我们亲爱的东风代表却要让我们的融工队伍局限于8小时工作制的地方，甚至要求其他同志出钱供养这些8小时融工者。我们且不要谈出钱供养这事安全性如何，财政是否可持续等一系列可行性问题。就说让我们工作局限于8小时工作制这一条，就已经叫我们自绝于中国绝大多数产业工人了。而列宁所说的那种，由组织供养的职业革命家，本身就得建立在强大的组织和运动的基础上。再说了，东风真的有列宁所说的那种，优秀到足够获得广大工人群众信任，出钱让他脱产搞革命的人吗？还是说搞革命是虚，脱产才是实？或许在东风那里，啥事不干，坐在咖啡馆里，偶尔兴起上个号去群里空谈两句革命就已经足够了。东风开始要成为充斥着这种空谈家的组织，自己不前进也就罢了，还打算把我们也拉住。在他们看来，只要现在的这几个组织宣布抽象的、空洞的合并，就是真的合并了，而对于在实际组织宣传工作中，建立起真正合并的基础，他们却极为蔑视。无论东风部分人主观上怎么想，他们实际上就是打算把现阶段这种落后的，长期限于空谈的组织情况，变成木乃伊保持下来，送到我们的下一个阶段去，叫这具木乃伊，永远毒害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东风的部分人注意了，这几段又是最恶毒的臆测！“理论家们”赶快再写篇文章来批判一番吧，标题就是《无耻之徒污蔑列宁全国政治报革命路线》）我们则根本不打算谈论线上线下谁指挥谁。我们只要实际工作者掌握一切，我们只要先进分子领导一切，我们只要一切首先服务于工人宣传组织工

作。在我们这里，但凡是实际工作者，不管是来自学生还是工人，对我们而言都一样，其中的佼佼者都可以是，而且应当是组织的领导者。只有东风部分的机会主义小丑，才会如此迷恋于权力，才会非常害怕实际工作的开展会让线上空谈家们失去藏身之地，丧失那本就不多的“权力”。现在看来，我们只好不理睬东风部分人那腐败的尸体，继续推进我们的融工计划了。

引用：

[1]:东风编辑部文章：《现在缺的是职业革命家！》

[2]:列宁《怎么办》：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三）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01-1902/04.htm#3>

我们的下一步

中国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联盟：丧钟

现在各线上组织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或者说最大的缺点就是脱离群众，和工人阶级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为了建立这个联系，在现阶段，我们一切任务的核心就是在工人阶级中建立我们的组织——工人组织和革命组织。我国是一个没有资本主义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在这里采用了最反动的法西斯式的统治形式，因为资产阶级所直接接手并且按照他们的意志改造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被资产阶级改造的国家机器极其强大，以至于无所不包，没有任何政治自由，没有任何公开活动的可能。在没有工人运动的条件下为了实现和工人阶级的联系，我们只能以小组的形式通过艰苦的线下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区域建立起我们的关键据点。我们很清楚，仅通过知识分子的小组活动，是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结合这个艰巨的历史任务的。列宁说“在一个专制制度的国家里……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只能由小组发展起来”（列宁《《十二年来文集》序言》），在我国尤其是这样。

个别小组在工人那里建立据点，个别小组与工人建立联系，这当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结合。但这在现阶段却是唯一合理并且最紧要的工作，因为现在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在没有工人运动的条件下存在的，它作为一个政党……还处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列宁《怎么办？》）。在我国条件下，没有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政党与工人阶级的结合，这不是多么难以理解的事情，就像在俄国——正如列宁所说——党也是以 1895-1896 年兴起的群众性工人运动为基础而于 1898 年建立的。

“党是联系一起的各个组织的总和”（列宁《维·查苏利奇是怎样毁掉取消主义的》），而各个据点（它本身包含着革命组织和由革命组织直接领导的工人组织）就是未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一定是建立在各坚实的线下据点之上，联合其他一切优秀革命组织和革命力量的总和。我们现在——当然是通过非常艰苦的奋斗——在工人阶级中建立起的那些据点，在未来自发的群众运动兴起时，完全可以起到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因为组织起来的觉悟的工人可以发挥出百倍于他的人数力量，这些据点由于其顽强的组织方式和高超的斗争素养，会借助于群众的积极性高涨和公开的活动所创造的有利条件，迅速扩大自己的力量，迅速把自己的活动家派往本地区其他工人群众中活动，迅速以自己的实际工作成果吸引千百万工人群众参与或者建立同样的据点。既然在没有群众公开活动的专制中国不可能进行任何深广的和公开的政治活动，那么就只能首先通过最艰苦的手工业方式（它客观上不能不是手工业的，但线上空谈家有什么理由责备现阶段进行这样的手工业工作呢？）建立起一个个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通过革命的方式教育和组织起来的各个据点，然后借助于公开的群众活动，扩大我们的力量和影响力，实现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的结合。这样的结合即使在群众的公开活动时期，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自发高潮的兴起只是给我们创造了党与无产阶级结合的基础和条件，党只有在长期的斗争中才能教育无产阶级，启发无产阶级的意识，扩大和无产阶级的联系，真正成为一个阶级的政党。

至于这些的据点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样的方式联合为一个政党，那是另外的事情，一些同志把政治报（也就是俄国党在那个时代和民族的条件特殊的联合方式）提高到了具有绝对意义

的地步，以为当今在中国创办政治报具有像二十世纪的全俄政治报一样的特殊意义，我们会在后续文章分析并且驳斥这种观点。既然这些据点是为了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建立的，是（起码绝大多数是）以马列毛主义为其指导思想的，那它们走向联合就是必然的，我们所要做的是积极克服小组习气，积极建立各组织的联系，积极把这样的组织联合起来。自觉性在目前的表现就在于尽一切努力去建立这样的坚实的据点，而我们现阶段的工作路线就是要全力贯彻这个自觉性。

我们把工人工作作为我们的核心，我们提出：一切优秀的觉悟的同志，只要客观条件允许都去融工。一个革命政党本来就是由少数的革命家和广大的普通党员（先进群众）组成的，一个革命组织也是如此，我们现阶段由于工人工作的不开展导致了这个区分的模糊。绝大多数人的活动（写文章，冲浪，线上宣传，搞学生组织等）本质上并没有超过一般先进群众的活动，他们客观不能算革命家，而是先进群众或者说一般党员，是中国的专制制度导致了革命家和先进群众的区别模糊（因为中国对这两种活动都不允许），正如列宁所说的俄国的专制制度导致了工人组织和革命家组织的区别模糊（因为俄国对这两种组织都不允许）一样。因此，我们要求觉悟的同志去融工，去超越现在的活动方式，去和一般的同志区别开来，去做只有最觉悟，最有毅力的同志才愿意和有能做的的工作。为了在组织上和行动上明确划分出这种区别，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现在最核心最重要的任务，我们要求把我们的同志划分为直接从事工人工作的（融工）和非直接从事工人工作的。这种划分是符合我们现阶段的任务和现状的，在现阶段，通常的情况下，直接从事工人工作的就是革命家（因为在中国这些同志需要同时建立两种组织，也就是工人组织和革命组织），非直接从事工人工作的是普通的同志。这个划分当然并不是绝对的，比如一些同志虽然很优秀很觉悟，但由于客观原因无法直接从事工人工作，或者一些同志更擅长其他工作，因此没有必要非去做工人工作。但这些例外的情况并不违反总的趋势——去做最艰巨最重要的融工工作的同志属于最觉悟的一批同志。

我们要求线上服务于线下，也就是说，一切非直接从事工人工作的同志都要服务于直接的工人工作的需要。这在客观上会导致线下越来越变为我们的重要的领导力量，在实际的工作中会形成我们新的领导形式，因此我们要求放弃线上对线下的绝对领导，我们认为要求线上对线下的绝对领导这是个别知识分子的狂妄幻想，在现阶段实际上是没有可能和必要的。这样的工作划分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完全可能。谁只要愿意去认真了解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很多同志虽然由于主客观原因无法做直接的工人工作，但他们都表现出来对革命忠诚无私的高尚品质。他们不只是愿意，而且是急于接受觉悟的实干的同志的领导。他们愿意为这样的真正的革命工作——而不是线上空谈的工作——付出自己所有的力量，他们痛恨和看不起线上空谈行为。如果让非直接的工人工作服务于直接的工人工作，我们的从事线上工作的同志会热情满满和心服口服地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们并不缺少线上的力量，只是由于我们在线下的落后和我们组织划分不够明确，导致了我们无法有效利用起这些力量。我们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但却没有一篇被工人看到，我们做了很多，但我们的力量与工人阶级的联系没有任何增长，这都是因为我们在线下的不开展导致的。如果我们建立了和工人的联系，如果我们按照线上服务于线下的路线工作，我们的线上同志就会根据工人的需要而不是毫无目的从事线上工作，一切写作，宣传材料，安全知识，新闻工作等等都可以交给线上的同志去做，线下的同志只在个别的情况下做这些工作。线下的同志应该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宣传和组织上，尽量少做或者不做那些单靠线上就可以完成的工作。这样的划分只在现阶段具有意义，这个阶段的情况是，如果不到工人中去建立联系，我们的工作就无法继续开展，我们的事业就不能继续推进，可是很多知识分子热爱空谈和扮演线上革命家，不愿意亲自开展或者间接的服务于这样的工作。

我们缺少的不是职业革命家，我们缺少的是愿意到工人中去做扎扎实实的组织工作的革命家，他们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觉悟最优秀的同志。也正因为他们优秀和觉悟，也正因为我们现在最需要和工人阶级建立联系，我们现在就没有任何必要而且也没有可能让这些优秀的同志变为职业革命家。不可能指望那些喜欢卖弄列宁全集或者喜欢空谈的知识分子去做工人工作，因此在现阶段，越是优秀的同志，我们反倒要求他们去做工人工作，而不是脱离工人。摆脱手工业的方式有很多种，在 1895 年之后的俄国，随着组织的普遍建立和工作的开展，让最优秀的同志脱离生产去专门领导革命工作是必要的。在 2023 年的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工人工作的开展，并且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崇尚空谈而不愿意做最紧要最艰苦的工作，摆脱手工业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的最优秀最觉悟的同志都去融工，因为现在让他脱产领导（领导谁呢？我们几个这样的同志可领导呢？现在有这样领导的必要吗？）不如他自己直接的从事融工工作更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因为这个工作只有最觉悟的同志愿意做。现在说缺少职业革命家无异于说废话，我们什么都缺，我们还缺少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缺少革命工作的经验等等，可是说这样的漂亮话有什么用呢？我们最缺的是什么呢？难道不是真正愿意去做工人工作的同志吗？

少说点漂亮话和空话。

第三部分 社会社评

我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与我国人民群众生活脱节，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实施着各种反动政策，残酷的剥削、压迫着我国人民群众。并且还利用各种反动舆论或艺术作品来灌输各种反动思想给我国无产阶级及更广大人民群众，并且习惯性的控制社会舆论、歪曲事实，以此达到维护自身反动意识形态进而维护统治的目的。我们应该揭穿他们的鬼把戏，唤醒我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因此，我们在这部分集中了一些相关文章及评语，供大家参考。

碧桂园危机的意义

革社（RSF）编辑部

自恒大破产以来，我国房地产危机已经是进行时，中国房地产的泡沫已经爆破。而最近碧桂园的危机也标志着我国房地产托斯拉企业的危机延续，他们的不景气也直接带动整个行业及上下游配套行业的不景气。这个危机也正在极大的破坏着我国整个房地产行业的生产和消费秩序，因此可以看作是我国整个房地产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我国全面经济危机的进一步酝酿。另一方面，在这个危机中垄断和集中却大大的发展了起来，庞大的房地产托斯拉企业越来越依赖金融资本的贷款而延续，它们形成一个愈发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同时，这个危机也极大的影响到了我国社会各个群众和部门：大量的商品房购买者受到损失、建筑工人和企业职员的失业和被欠薪、投资者的破产等等，除此之外也扩大着政府和银行部门的损失；因此，这个危机的也催生着越来越集中和激烈的阶级压迫、越来越无情的镇压，使所有受害的群众发现他们越来越和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对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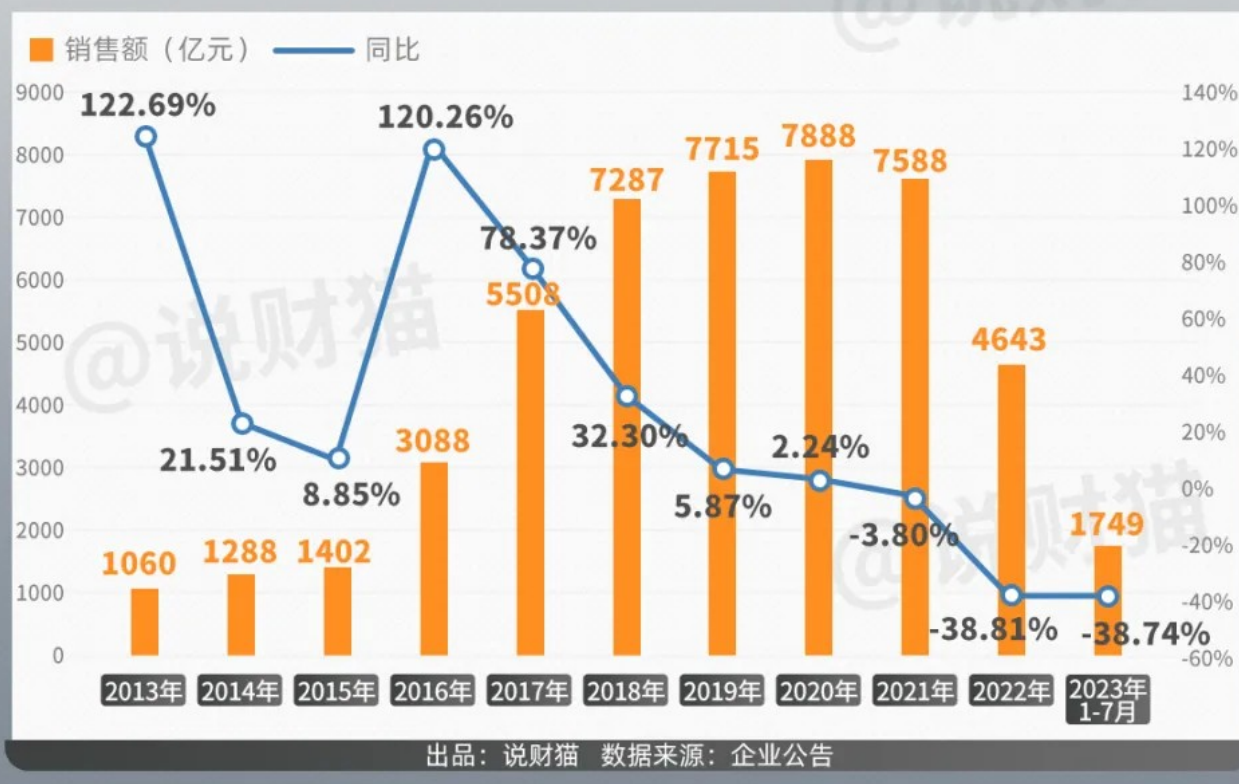
一. 碧桂园的危机

碧桂园是我国最重要的房地产托斯拉企业之一。在2023年1-10月的房地产数据中，在所有同行企业里它的操盘面积排名第一的（2407万平方千米），操盘金额排名第七（1944亿元）。不管从任何方面，它的都是属于我国头部的房地产企业。而这样企业今年发生了多起债务违约的暴雷事件，它陷入了深刻的危机。

在2019、2020、2021三年中，碧桂园的净利润还分别高达612亿、541亿、410亿元，是最赚钱房地产企之一，是房企中的利润王。而今年2023年上半年，碧桂园实现营业收入2263亿元，同比还增长了39.38%，但毛利润却变为了负242.63亿。这意味着碧桂园正在亏钱出售自己的商品房，但这还是没能避免它陷入危机。如果再加上投资物业公允价值亏损29亿，资产减值损失67亿。仅2023年上半年，碧桂园就亏损514.61亿。这个亏损额甚至超过了恒大（392.5亿）。如果我们看看碧桂园的历年销售额数据就更能发现问题：

碧桂园近十年销售额增长情况

COUNTRYGARDEN



在这几年的数据中，2021年碧桂园的销售额出现首次下降，而从2022年开始碧桂园的销售额就开始断崖式的下降，倒退回了略高于2015年的销售水平。

融资不畅，销售额疲软，光让还钱，哪家房企都吃不消。

所以，碧桂园最终还是爆雷了：

若干优先票据的到期利息没支付，已经就债券展期展开谈判。

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来了，碧桂园的最新财务状况怎么样？还好，没有恒大那么糟。

财报显示，截至2023年中，碧桂园总资产16185亿元，总负债13642亿元，净资产2544亿元。公司有息负债总额2579.05亿，其中一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为1087.03亿元。同期，公司在手的非受限现金是1011.15亿元。

没有资不抵债，在手现金还够覆盖大部分的到期短债，碧桂园的情况，没有到那么糟。但，流动性，确实紧张。

说实话，碧桂园能撑到今天，很不容易。但楼市下行的深度、广度和持续度，仍在扩展和蔓延。碧桂园重仓的三四线及更低线城市，短期之内也难有回天之力。躺平，成为了碧桂园最终的选择。

- 《深夜！碧桂园实情曝光，战术减员 1.18 万人》

来源：《腾讯网》

作者：说财猫

碧桂园销售的危机一方面是普遍危机的反应，另外一方面，也是个别危机的体现。这个企业和其他托斯拉房地产企业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它的商品房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在土地储备上就反应了这样的特征，如 2017 年的数据中，碧桂园的土地储备城市能级分布是这样的：四线城市（22.2%），三线（57.7%），二线（17.3%），一线（2.8%）。其中三四线占比达到了 79.9%，一二线城市只有 20.1%，按碧桂园的创始人杨国强的话来说，就是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事实证明，这个经营路线在我国资本主义经济火热发展的时期让碧桂园得到了好处，但在不景气的时期却让这个企业更早的陷入了危机。

当然，他们也曾试图改变过这个结构，在今年 3 月的采访中他们就公开的表达了。

在土地储备结构上，碧桂园计划用 3-5 年的时间，将其一二线和三四线的货值比例提升至 5：5，用优质的土地资源支撑公司未来的稳健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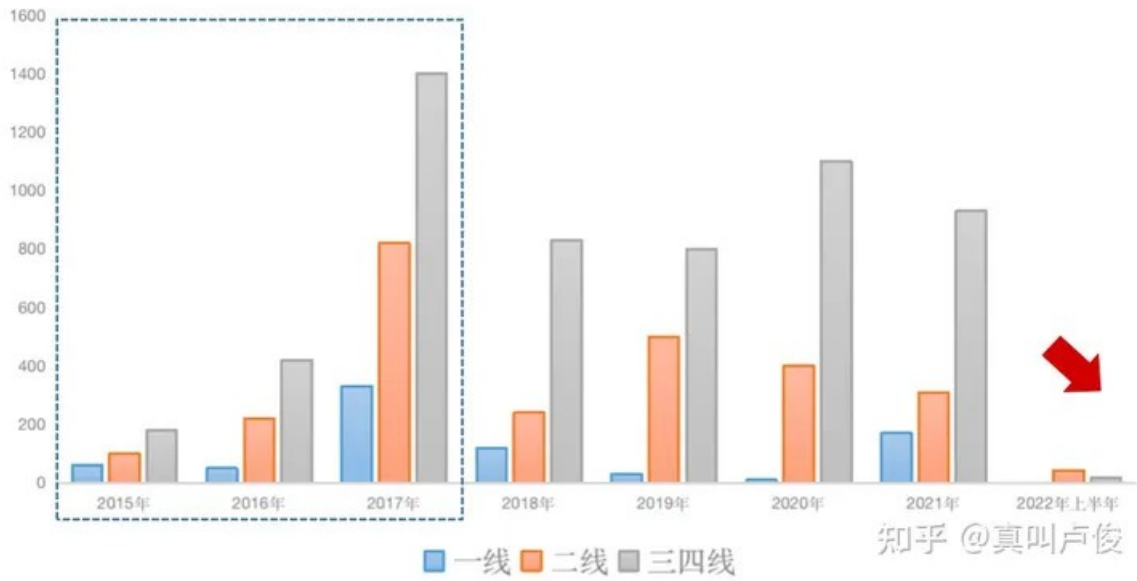
碧桂园常务副总裁程光煜介绍，今年碧桂园投资方向会聚焦一二线城市的核心板块，近期碧桂园在系统地参与公开市场的土地竞拍，包括北京、南京、成都、杭州、合肥等城市。今年的拿地预算会保持在销售额的 40% 以内。

- 《碧桂园：打造两个核心竞争力，聚焦两个重点板块》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陈玉霞

从数据上我们也能发现，他们也的确试图把资本比例更多的集中在一二线上：

碧桂园历年不同城市能级投资变化（亿元）



但结果是为时已晚的。当人民群众对房地产的消费大幅下降，整个行业开始不景气的时候，他们的任何拯救都显得无力了。

碧桂园原本应该于8月7日支付两笔美元债未能如实兑付，如果按票面金额来算，两笔均为5亿美元的美元债，利息总额为2250万美元，两个票据利息总额只有0.45亿美元，连本带利不会超过11亿美元。但这11亿美元，就成为压垮碧桂园的最后一根稻草。

【碧桂园两笔美元债票息未付 回应：出现了阶段性的流动性压力】

财联社8月8日电，记者从知情人士处确认，截至目前，碧桂园仍未能支付应该于8月7日支付的两笔美元债的票

息。两笔债券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发行规模均为5亿美元，期限分别为5.5NC3.5和10NC5，到期日分别为2026年2月6日和2030年8月6日。碧桂园内部人士表

示，受近期销售额与再融资环境持续恶化，叠加各类资金监管的影响，公司账面可动用资金持续减少，出现了阶段性流动压力。公司高度重视债务风险化解，公司目前仍在积极优化资金安排，努力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

游报号 @BT财经

10月10日，碧桂园正式爆雷，公告称预计无力偿还一笔本金仅4.7亿港元的到期境外债务，也预期无法如期或在相关宽限期内履行其所有境外债务款项的偿付义务。也就是说他们打算不再偿还一切境外债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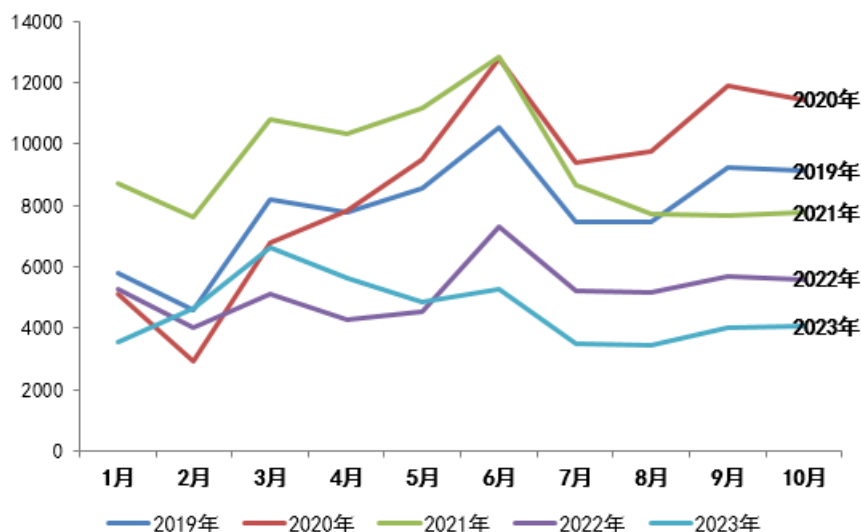
托斯拉碧桂园集团如今岌岌可危，这个商业帝国已经开始大面积的倒塌。如果没有大量资本的拯救，那么它不久后就会像恒大那样破产。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说明我国今天的房地产企业也像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也存在着大量的商品过剩的问题，堆积的商品房根本无法销售出去。他们始终依赖市场的不断扩大而发展。而一旦面对较大的市场变动就要陷入危机，而根源就在于我国劳动者的消费力紧缺。这个时候，他们除了用债务来维持自己的商业帝国延续外没有任何办法，只能苦苦等待经济火热和消费上涨的时期重新到来。

二. 我国房地产行业普遍的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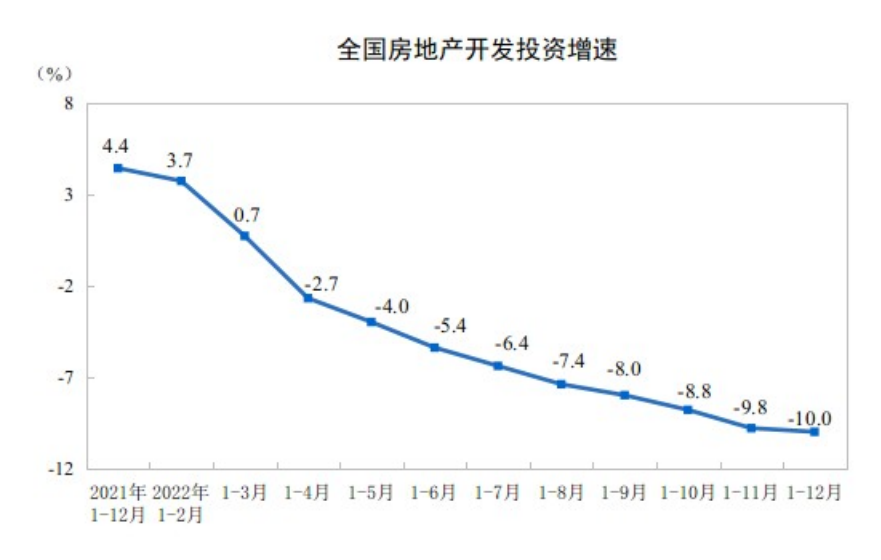
事实上危机并不是针对碧桂园一家企业的，对于其他的房地产托斯拉和大型企业来说，都有陷入普遍风险，我们只需要看看他们的普遍业绩情况就知道了。

图：2019至2023年前10月百强房企单月业绩走势图（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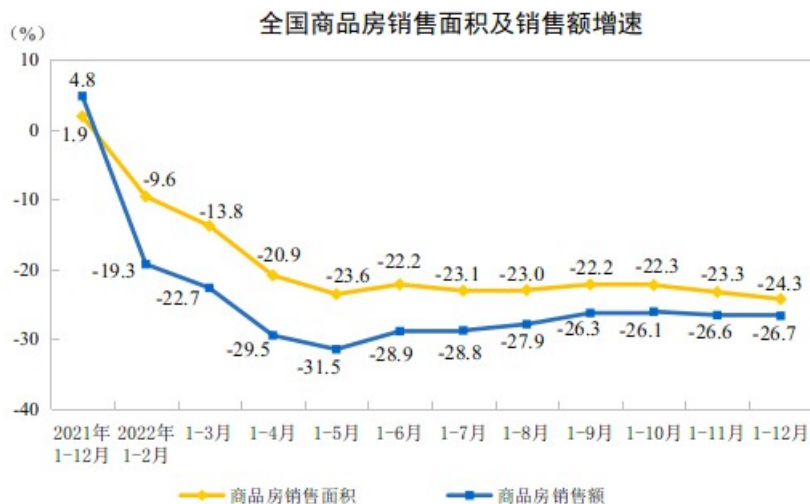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CRIC

如果我们再以2022年我国房地产相关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来判断，我们就能发现我国房地产整个行业现在都开始以一种稳定向下的趋势倒退。在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情况方面，2022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32895亿元，比上年下降10.0%；其中住宅投资100646亿元，下降9.5%（参考图1）。



2022年，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904999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7.2%。其中住宅施工面积639696万平方米，下降7.3%。房屋新开工面积120587万平方米，下降39.4%。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88135万平方米，下降39.8%。房屋竣工面积86222万平方米，下降15.0%。其中，住宅竣工面积62539万平方米，下降14.3%。

而投资的下降代表着资本开始从这个行业逃离，商品房从历来的扩大再生产变为了生产的减少，但本质都是由于群众消费下降所导致。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商品房销售和待售情况方面也同样的稳定向下。2022年，商品房销售面积135837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24.3%，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26.8%。商品房销售额133308亿元，下降26.7%，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28.3%。



2022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56366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10.5%。其中，住宅待售面积增长18.4%。即便投资减少、生产减少，但是堆积商品房还是越来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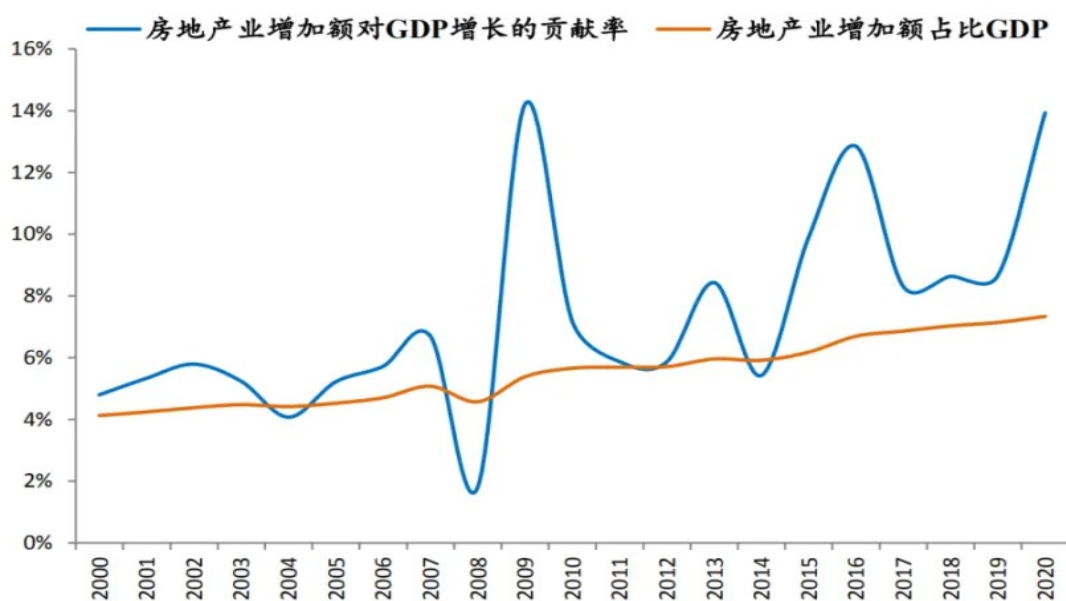
而所有相关房地产企业的资金状况也越来越难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情况方面也是一样的下降趋势。2022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148979亿元，比上年下降25.9%。其中，国内贷款17388亿元，下降25.4%；利用外资78亿元，下降27.4%；自筹资金52940亿元，下降19.1%；定金及预收款49289亿元，下降33.3%；个人按揭贷款23815亿元，下降26.5%。

指标	绝对量	比上年增长 (%)
房地产开发投资 (亿元)	132895	-10.0
其中: 住宅	100646	-9.5
办公楼	5291	-11.4
商业营业用房	10647	-14.4
房屋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904999	-7.2
其中: 住宅	639696	-7.3
办公楼	34917	-7.5
商业营业用房	79966	-11.8
房屋新开工面积 (万平方米)	120587	-39.4
其中: 住宅	88135	-39.8
办公楼	3180	-39.1
商业营业用房	8195	-41.9
房屋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86222	-15.0
其中: 住宅	62539	-14.3
办公楼	2612	-22.6
商业营业用房	6800	-22.0
土地购置面积 (万平方米)	10052	-53.4
土地成交价款 (亿元)	9166	-48.4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135837	-24.3
其中: 住宅	114631	-26.8
办公楼	3264	-3.3
商业营业用房	8239	-8.9
商品房销售额 (亿元)	133308	-26.7
其中: 住宅	116747	-28.3
办公楼	4528	-3.7
商业营业用房	8127	-16.1
商品房待售面积 (万平方米)	56366	10.5
其中: 住宅	26947	18.4
办公楼	4073	7.3
商业营业用房	12558	-1.6
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亿元)	148979	-25.9
其中: 国内贷款	17388	-25.4
利用外资	78	-27.4
自筹资金	52940	-19.1
定金及预收款	49289	-33.3
个人按揭贷款	23815	-26.5

(2022年1—12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情况)

可以看到,在投资、生产、财务、债务上,我国房地产企业都陷入陷入了普遍的下滑,生产过剩的情况愈发严重。因此,自2022年开始,我国整个房地产行业的泡沫事实上已经开始破裂,房地产经济的大厦开始崩塌。房地产的危机已经是进行时,而最近碧桂园的危机只是这个整个危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危机也正在极大的破坏着我国整个房地产行业的生产和消费秩序,大量的商品房生产开始停滞,大量的商品房开始滞销,大量企业陷入危机乃至破产。碧桂园的危机可以看作是我国整个房地产危机的进一步发展,而这个危机还远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而房地产经济的危机也必然扩散到其他行业,它的不景气自然要使得上下游配套行业同样的开始不景气,因此也可以看作是我国全面经济危机的进一步酝酿(还远远算不上全面危机)。

图表：房地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13.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泽平宏观

泽平宏观

从GDP占比看，2020年房地产及其产业链占我国GDP的17%（完全贡献），其中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7.3%（直接贡献），房地产带动产业链占GDP的9.9%（间接贡献），其中房地产对金融、批发、建材的带动最为明显。在国际上，房地产对经济贡献占比更高，因统计口径和发展阶段差异，美、德、英等发达经济体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10%，普遍高于我国。

-《任泽平：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多大》

群众消费的减少、销售的持续萎缩、生产的缩小、商品房的堆积、普遍的财务危机和债务危机，是我国房地产企业已经开始面临或者即将必然要面临的现状。如果没有大量资本拯救或短时间内巨大的现状改变，这些企业必然都要走向破产的结局。

三. 在危机中继续发展的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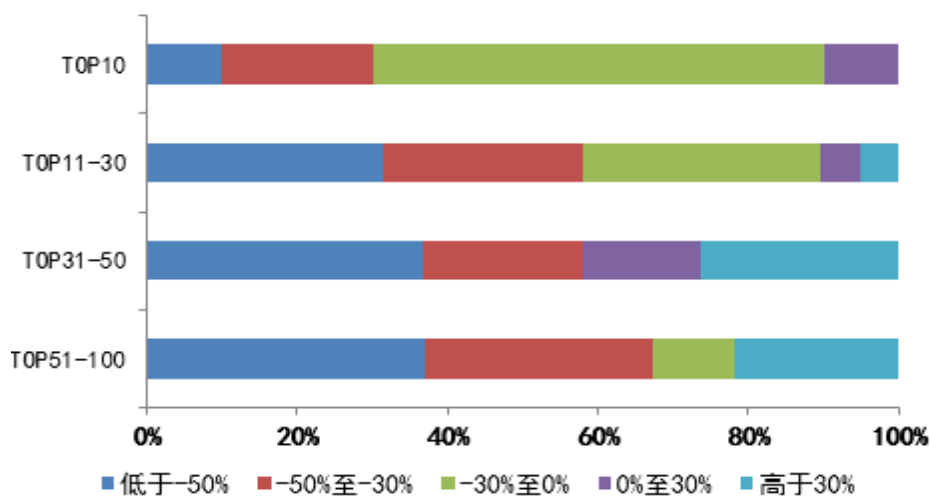
危机（各种各样的危机，最常见的是经济危机，但不是只有经济危机）又大大加强了集中和垄断的趋势。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如果只是为了说明资产阶级学术范围内的一般经济事实，那么只需要像上文一样指出碧桂园的危机是我国房地产危机继续发展的象征，以及我国的房地产行业究竟陷入了怎样的困境就行了。但问题到这一点并不算结束，在这个危机中，产业的集中反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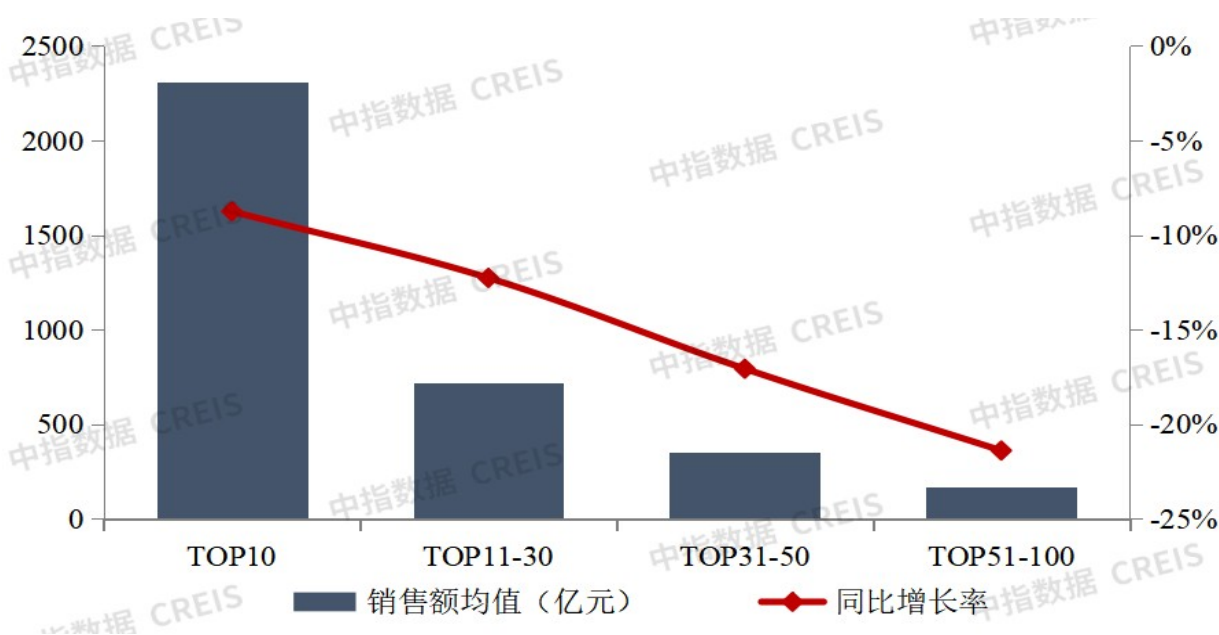
从结果看，集中早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我国有 99544 个房地产企业（2019 年数据），而占比约 0.1% 的 100 个头部房地产开发企业（百强房企）在全国的销售额占比、拿地金额占全国土地出让金占比、操盘资金占比、施工面积等都数据占比都在四成到六成之间。近十年，百强房企的这些数据在全国总额占比中基本都维持在四成到六成之间浮动。近十年变化还分为这样大致三个时期：房地产的行业的景气时期（2015-2019）、停滞时期（2019-2021）、危机时期（2021-2023-?），这三个时期的区别单从前文碧桂园的销售数据来看也能判断出来。在景气时期，各方面的集中都得到了大大的发展，少数企业在各方面的占比越来越大、集中程度提高，而在在停滞时期这种集中却大为倒退，而在危机时期却得到了恢复。但这仅仅是指百强房企对整体行业而言。而在百强房企内部，分为了这样四个梯队，在危机中这四个梯队的内部差别也正在进一步拉开。我们从企业业绩和操盘金额、现金变化上就可以看出来。

图：2023 年 10 月百强房企各梯队单月业绩同比增速分布



数据来源：CRIC

2023年1-10月各阵营销售额增长情况



2021-2023年百强房企操盘金额各梯队占比

时间/梯队数据	TOP10	TOP11-30	TOP31-50	TOP50-100	总数
2021年	44020 (39.7%)	33024.7 (29.8%)	16757.8 (15.1%)	16862.8 (15.4%)	110665.3
2022年	29503.8 (45.7%)	17912.1 (27.7%)	7344 (11.3%)	9694.5 (15.3%)	64454.4
2023年(1-10)	21921 (48.3%)	11926.6 (26.3%)	4968.8 (10.9%)	6577.5 (14.5%)	45393.9

注：单位：亿元

各个企业面对危机的能力明显不同。2023年1-10月，各阵营房企销售额均有所下降。其中，TOP10房企销售额均值为2309.9亿元，较上年下降8.7%；TOP11-30房企销售额均值为718.3亿元，较上年下降12.3%；TOP31-50房企销售均值为351.7亿元，较上年下降17.1%；TOP51-100房企销售额均值为169.6亿元，同比下降21.4%。

表：2023上半年各梯队房企现金变化（亿元）

企业排名	2022年	2023H	较期初变化
TOP10	9729	9796	0.68%
TOP11-30	4286	4225	-1.44%
TOP31-50	2164	2043	-5.60%
TOP51+	2887	2693	-6.71%
合计	19066	18756	-1.63%

注：梯队划分根据克而瑞2023上半年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TOP200排行榜全口径销售排名。

数据来源：企业业绩报告，CRIC整理

百强企业内部的分化也在危机中进一步发展，即使恒大和碧桂园这样前十房企遭到了重创、整个房地产行业都不景气，但客观上生产和生产能力还是再往更少数企业集中，TOP10 的销售额增长远超 TOP100，操盘金额而越来越是 TOP10 在提供，现金变化情况也是他们最好。这只是说明，规模更小的企业更难以抵抗危机而遭到更大的破坏。如果从销售变化来看，那么我们也能发现危机的作用。

时间	全国商品房销售总额	百强房地产企业销售总额	百强房企销售额占总数比例
2014 年	76292 亿元	28790.6 亿元	37.7%
2015 年	87281 亿元	32032.1 亿元	36.6%
2016 年	117627 亿元	52230 亿元	44.4%
2017 年	133701 亿元	75133.9 亿元	56.1%
2018 年	149973 亿元	75133.9 亿元	58.1%
2019 年	159725 亿元	98179.3 亿元	61.4%
2020 年	173613 亿元	94461.2 亿元	54.4%
2021 年	181930 亿元	90802 亿元	49.9%
2020 年	133308 亿元	75968.5 亿元	56.9%
2023 年 (1-10 月)	97161 亿元	52977 亿元	54.5%

销售数据方面，百强企业在 2015 年到 2019 年的景气时期（房地产的高速发展时期），集中得到了大大的发展，而在 2019-2021 年的停滞时期集中却有所下降（这是由于他们堆积的商品房过多、有相对更多的资本，所以短期内停止了扩大再生产）；但在 2021-2023 年的危机时期，集中却又大大的恢复了起来。百强企业在拿地金额占全国土地出让金占比、操盘资金占比、施工面积占比上都体现了这样的情况。

房地产行业的托斯拉早已形成，他们垄断了城市最好的土地，不到 0.1% 的企业掌握全行业一半左右的生产、销售、现金、土地。并且这个趋势在危机中还在发展。单从生产方面来说，我国的房地产的垄断是早已形成了。

四. 金融作用和银行的垄断

我们指出了房地产行业的垄断现实和进一步集中的趋势。但问题的关键也还不在于这里，我国的房地产行业的集中主要不是从房地产企业的生产、销售、现金等方面来体现。而是从债务、资本方面的来体现的，或者是说他们和金融资本、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关系来体现的。也是在这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垄断的发展。

2010-2019 年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产负债数据表（亿元）

时间	实收资本	资产总计	累计折旧	本年折旧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资产负债率 (%)
2010年	36767.41	224467.14	1758.34	379.81	167297.41	57170.12	74.5
2011年	46430.63	284359.44	2113.63	427.26	214469.96	69889.73	75.4
2012年	54735.36	351858.65	2360.92	525.35	264597.55	87261.1	75.2
2013年	59987.59	425243.89	2871.45	626.74	323228.24	102015.65	76
2014年	76566.04	498749.92	3099.89	616.67	384095.53	114654.4	77
2015年	78329.42	551968.06	3265.2	596.61	428729.9	123238.16	77.7
2016年	79278.3	625733.7	3658.29	640.5	489750.32	135983.38	78.3
2017年	85649.75	722236.02	3909.38	657.18	571274.85	150961.17	79.1
2018年	95324.97	852720.54	4358.86	904.59	674333.36	178382.98	79.1
2019年	105248.81	947935.6	4521.18	841.78	762035.19	185900.41	80.4

从数据看，上市房企整体资产负债率由 2005 年的 59.98% 上升至 2021 年的 79.19%，仅次于金融业，15 年间上升近 20 个百分点，部分房企资产负债率甚至超过 90%，已面临资不抵债的风险。从发达国家看，2020 年，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上市房企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37%、38%、54%、57%、69%。我国房企资产负债率不仅远超部分发达国家，也远超其他行业（高于大多数行业 15-40 个百分点不等），不论从国际维度还是行业维度，我国房企资产负债率均处于较高水平。

- 《宏观观察》2022 年第 40 期
- 中国银行研究院

可以看到，在危机以前整个行业的资产负债率是在缓慢的变化的，十年间只增加了 6%。

表：历年样本房企整体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H	较期初变化
现金（亿元）	26934	29920	24994	19066	18756	-1.63%
总息债（亿元）	62936	66573	66897	66390	65754	-0.96%
净负债率（永续债作权益）	81.84%	70.08%	88.22%	108.98%	113.11%	4.13 pts
非受限现金短债比	1.09	1.20	0.67	0.49	0.48	-0.01
长短期债务比	1.99	2.22	1.50	1.30	1.32	1.61%
扣预收后资产负债率	74.03%	72.71%	75.12%	76.38%	76.93%	0.55 pts
融资成本*	6.73%	6.48%	6.59%	6.30%	6.25%	-0.05 pts

注：1)2023上半年港币统一以0.93进行换算，融资成本为样本房企数据算数平均。

2)扣预收后资产负债率=(总负债-预收款)/(总资产-预收款)。

3)为真实反映房企短期的偿债能力，采用“调整后的非受限现金短债比”。针对额外披露预售资金监管余额且未计入受限制现金科目的部分房企，计算公式为(货币现金-受限制现金-预售监管余额)/短期有息负债；而其余房企的指标计算公式(货币现金-受限制现金)/短期有息负债。

数据来源：企业业绩报告，CRIC整理

169家重点房企：中国恒大、保利发展、万科、融创中国、世茂集团、碧桂园、中国海外发展、华润置地、招商蛇口、绿地控股、龙湖集团、华发股份、绿城中国、佳兆业集团、华侨城、富力地产、中国金茂、首开股份、金地集团、中国奥园、金隅集团、龙光集团、越秀地产、远洋集团、建发国际集团、合生创展集团、保利置业集团、合景泰富集团、大悦城、金融街、金科股份、新城控股、花样年控股、宝龙地产、正荣地产、雅居乐集团、禹洲集团、时代中国控股、中南建设、城建发展、美的置业、中交地产、滨江集团、融信中国、荣盛发展、仁恒置地、中骏集团控股、深圳控股、瑞安房地产、金辉控股、信达地产、光明地产、路劲、五矿地产、建业地产、中梁控股、弘阳地产、北辰实业、德信中国、景瑞控股、正商实业、众安集团、迪马股份、天誉置业、上坤地产、领地控股、荣安地产、港龙中国地产、三巽集团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净负债率都在逐步提高，而危机大大的加速了这个过程，短短两年间达到了过去十年债务率恶化程度的数倍。房地产企业越来越被金融资本压得喘不过气了。

如果以碧桂园为例。截至2022年末的数据，碧桂园有息负债约为2713亿元，其中银行及其他借款占比达到6成，须一年内偿还的借款占比37.66%。而和碧桂园的有重要资金往来的25家银行基本都是国内银行，只有两家是马来西亚的银行。2022年碧桂园大量亏损出售售楼板，把全部现金拿来偿还债务任有不够，于是他们首先选择了违约境外债务，但对于国内债务（特别是银行债务）却不敢违约。为了争取他们拯救商业帝国的机会，他们做了许多积极的活动，包括低价和亏损售出堆积的商品房、尝试改变企业土地储备结构、出售资产、高管们集体大幅度降低薪水、争取重组债务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企业被金融资本剥削得越来越严重，但他们对贷款也愈发依赖，如果没有新的贷款他们就无法偿还旧的贷款。他们不得不愈发依靠金融资本的力量来维持他们的商业帝国。

而恒大的结局是许多国资企业接盘了他们的大量资产负债，恒大集团在美国宣布破产保护，许家印由于试图转移大量资产出国也被国家机关控制。掌控恒大和碧桂园的私人资产阶级集团选择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服从海外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并转移私人财产出境，于是这个集团就被我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给打垮了、总裁也被控制；而另

一条则是选择得罪海外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违约海外债务、积极偿还国内债务，客观上维护了我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里的海外金融集团恰恰都是美国私人垄断资产阶级的资本。因此，这也联系着两个垄断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垄断利益冲突，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危机客观上也在促进着金融垄断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垄断集团之间的利益对抗，自由竞争时期的经济全球化开始演变为各自单方面的冲突和彻底排斥，这也是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之一。我们可以看看列宁是怎么论述他们那个时期的帝国主义经济发展环节的。

巴黎大银行里昂信贷银行的帐户数目：在1875年是28535个，而在1912年就增加到633539个。

这些简单的数字，也许比长篇大论更能清楚的表明：随着资本的集中和银行周转额的增加，银行的作用根本改变了。分散的资本家合成了一个集体的资本家。银行为某些资本家办理往来帐，似乎是在从事一种纯粹技术性的、完全辅助性的业务。而当这种业务的范围扩展到很大的时候，极少数垄断者就控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商业业务，就能通过银行的联系，通过往来帐及其它金融业务，首先确切地了解各资本家的业务状况，然后加以监督，用扩大或减少、便利或阻难信贷的办法来影响他们，以至最后完全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的收入，夺去他们的资本，或者使他们有可能迅速而大量的增加资本等等。

.....

希法亭写道：“愈来愈多的工业资本不属于使用这种资本的工业家了。工业家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取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对于工业家来说，银行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者。另一方面，银行也必须把自己愈来愈多的资本固定在工业上。因此，银行愈来愈变成工业资本家。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变成了工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我把它叫作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就是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

这个定义不完全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指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了会导致而且已经导致垄断的高度。但是，在希法亭的整个叙述中，尤其是在我摘引这个定义的这一章的前两章里，着重指出了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作用。

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

-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不过要指明的是，列宁时期的发展起来的那种垄断是基于私人垄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私有所有制形式的垄断，因此除一般性规律外，特殊性上必然有着不同之处。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型的房地产托斯拉企业也不得不越来越依靠银行的贷款存活着，客观上愈发的需要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而保持存续，这些大企业的寄生性、腐朽性因此也在继续增强。他们也正在把自己企业的命运越多的交给金融资本。在目前这种危机的情况下，银行贷款直接决定着他们的生死，在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中，银行完全可以选择拯救某一个企业或者不拯救某一个企业，恒大和许家印的例子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危机还产生了这样的趋势。房地产企业的自救与其说是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还不如说是为了金融资本的利息。房地产企业的全部收入和现金在本次危机中基本全部要用作偿还金融资本的利息。从这一刻起，他们财富全被更为少数金融寡头所决定。这无非是在说，金融资本是有权也理应奴役生产资本的，于是少数金融寡头开始统治他们。对于房企来说，商品生产（生产商品房）虽然还占统治地位，但实际上却完全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被拿来供给给金融资本了，这实际上也是生产的社会化和分配的私有制之前所要产生的必然矛盾。这些现象在过去也同样产生并且成为帝国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象征，而历史上的情况和我们区别只是我国金融资本是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主要掌控的，因此也就加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社

会各阶级的奴役（包括一切私人资产阶级）。我国的金融资本，或者说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现在可以完全决定这些资本家的命运。

金融资本不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在依靠私人资本的自发发展和银行资本自发发展的传统资本主义自然发展条件下而一并长成的，而是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一开始就确立在金融上的统治地位。其他各种私人资本和各色产业的发展在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也必然要逐步的和这种已有的金融资本长合到一起，或者说被他们主导。因此，在不发生彻底的社会阶级性质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的金融资本必然始终保持明确的、也是和私人资本截然不同的阶级性质。对于这个我国金融资本的阶级性质，只需要看看我国主要的国有银行是被谁控制，哪些利益都分享给谁就知道，就算是一些次要的私人银行和金融机构实际上也大多数管理垄断资产阶级们在控制。曾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的著名资产阶级学者的话就可以证明一点：

实际上中国的贫富分化非常严重。我们看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中国可能是最优秀的，就是领导干部的孩子都去金融了，这件事是需要思考的，不可以这样。他们（领导干部的孩子）不愿意做老师，他们不愿意做解放军，他们不愿意做工人，他们也不愿意做高科技，他们全部进了金融机构。他们也不当官，全部进入金融机构。

第二件事情是中国经济的构成的主体。我们今天打开上市公司，中国上市企业第一名是茅台，第十名是五粮液，中间夹着八个金融机构，是四大行还有保险。就是看中国经济，像我这样的人会心如刀割，这样做过了。因为茅台也是金融现象，茅台不是酒，房地产也是金融现象。我们情况并不比美国更轻，只是由于我们处在高速发展中，我们的老百姓没觉得疼，但问题的严重性具有同质性。在201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边，整个中国上市资产里边，70%的利润构成是金融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现在它下降到60%，但它仍然让我们无法接受。我们认为，金融这个行业，给中国人的贡献不应超过20%，60%说明完全越界了。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个现象也是非常残忍的现象。就是我们在讨论普惠金融的时候，出现了大规模的非法集资和金融欺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金融，无法照顾底层老百姓的金融需求。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我们财政、收税是针对劳动和劳动者90%以上，这在全世界不可思议，正常针对劳动者的收税应该是四成是极限，但却收到九成。金融是为所有人服务的，必须是公平正义的覆盖每一个人，怎么可以中小企业贷款难呢？他是一个焦点核心问题，但却没有引起中国广大的思想家、学者的认识。

——卢麒元

在这样的危机中，如果一切房地产企业想要在危机中保住自己的财富的话，就要必须依赖金融资本、也必须维护金融资本，换句话说就必须依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维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同时也就反应着这样一个事实，我国的私人垄断资产阶级不得不越来越彻底的作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走狗，服从他们的统治、仰赖和依靠他们的资本。因此，今天的银行和房地产托斯拉集团在危机中朝着这样一个方面过渡，他们越来越要长成为一个统一的集团，一个利益共同体；形成越来越庞大的金融资本统治集团。银行在危机中必然要集中起越来越多房地产企业的资本，在这个利益共同体中，银行是主要的方面、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主要方面。

五. 危机与斗争

对于我国受压迫的人民群众来说，这个危机也联系着我们许多的阶级兄弟。资产阶级面对任何他们自己造成的危机时的第一反应和必然反应是要把危机转嫁给人民群众，所以我们能看到，他们裁减企业员工、拖欠农民工工资、停建住房、提前套现收割股市韭菜、镇压维权群众等等。因此，如果我们面对这种危机时如果不能积极的组织起来那么就不能保护我们自己的合法利益，也无法保证资产阶级承担相应的责任，更不可能利用一切危机来发展革命运动逐步实现革命和解放我们自己。

僱員及薪酬政策

人才一直是本集團最寶貴的資源。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共僱用約69,932名全職僱員。

僱員及薪酬政策

人才一直是本集團最寶貴的資源。於2023年6月30日，本集團共僱用約58,140名全職僱員。

只是根据碧桂园的最新财报显示，2023年上半年就有1.18万人被裁减，而早在2019年危机开始的那一年碧桂园就裁员了3万人。这还不包括最新数据，也不包括涉及碧桂园项目的其他职工。



碧桂园裁员赔偿方案出来啦！建议直接仲裁

碧桂园的裁员新方案：高手高高手

即刻开始，房产 n+1，基数非全薪仅基本工资+补贴部分。

1 方案一：分期，补偿多少个月就分多少期，向上取整，6.5个月就是分7个月发。

2 方案二：一次性打折，具体折扣不定，补偿金额越高，补偿月份越长折扣系数越大，据说最大到5折，差不多补偿7个月在7折左右。

碧桂园人力回复：就这两个方案，没得讨价还价。不接受可以仲裁，仲裁你肯定赢，但公司既然敢这么给方案，那肯定也不怕你仲裁。你赢了也执行不了，账上没有钱也给不了你赔偿，最终结果还是分期。

这里来逐一解读一下：

1 方案一：分期，补偿多少个月就分多少期，向上取整，6.5个月就是分7个月发。

这个分期方案对于员工风险性极大，很可能付着付着，就没有了。怎么追讨呢，按碧桂园回复方式，没门。

2 方案二：一次性打折，具体折扣不定，补偿金额越高，补偿月份越长折扣系数越大。

如此“科学”、复杂、精密、算计、恶心员工的设计，恐怕世界上最厉害的精算师都达不到碧桂园这个水平。算得你欲罢不能，又不得不接受，直

说点什么...

❤ 519

★ 324

💬 235

就仅仅对被裁员的碧桂园职工来说，这样的方案也是不公平和不讲理的。如果员工们不能组织起来就无可能争取到不打折扣的和合理的赔偿。要组织起来提高要求，逼迫碧桂园同样对员工进行合法的赔偿，即使企业拿不出现金，也应该在职工允许的范围内用房产和其他企业资产折价抵给员工，以及给予所有员工肯定和具备法律意义的赔偿承诺。

同样还有农民工也被欠薪：

渭南市临渭区碧桂园春风南岸（二、三）批次项目二次结构及精装修劳务分包工程从2011年进场工作至2022年7月，因项目原因停工退场，总欠农民工工资为120多万元，截止2022年底付农民工工资682500元，剩余农民工工资50余万元未付款，多次讨要无结果，万般无奈下被迫诉讼到法院，经劳动职能部门协调一次后，项目方依然不闻不问，法院调解期间江苏中南总包方说六个月后（2023年3月）付款，至今未果。拖欠农民工工资未结问题已经一年多，工人们吃了上顿没下顿，上有老下有小，工资等不起。我质问渭南市临渭区碧桂园项目方有无监管责任？如果总包方不给农民工付工资，有无代发工资义务？此工地两次退场两次进场赔钱都不说了，能否把农民工工资问题解决掉，农民工都是从外地到渭南打工的底层下苦工人，恳求渭南市政府介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渭南碧桂园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

我国仅仅在2022年就有8.96亿平米楼盘停工。按一般住宅工程经验来看，标准层施工时木工每30平方米需要一个工人，钢筋工每80平米一个工人，砼工人6栋需分两个组，每个组15人左右合理，这样能满足进度要求，又不会窝工。所以，我们如果以每40平米需要一个工人来算，至少约2240万建筑工人失去了工作。而我国的建筑工地基本都靠农民工来维持生产的，2022年我国农民工总数为29562万人，相当于农民工总数的7.5%。所以单从有详细报道的网络新闻中就可以看到，今年在湖北、甘肃、广东、江西、陕西多地都发生了许多关于碧桂园的农民工讨薪维权事件。在房地产行业危机的情况下，全国各地的农民工维权运动更是数不胜数。因此，危机大大的增加了受迫害群体的数量，也极大的增强了阶级斗争数量和范围。

但另外一方面，危机也在客观上使得资产阶级的利益集中起来。所以我们也能看到，拥有50万粉丝的“亮亮丽君”夫妻直播前往融创维权，和更激进但却更正确、更有力维权手段相比，他们并不是要去要求房产商退掉他们买的烂尾房、也不是去要求停贷款和赔偿，而是融创当初承诺的“买房返现”的两万元以周转夫妻二人的信用卡，但即使如此他们确认仍然遭到了融创方面的暴力围殴。马前卒说这是一定要专门打给全国人民看，打给“中国梦”看的，“连最勤劳、最守法、最乐观的公民都不配得到中国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是这样的，资产阶级一边欺骗人民群众相信他们的统治，另一边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却对人民群众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因此不仅亮亮丽君夫妻被打马前卒也因为为此发声而被封禁了一段时间。

像亮亮丽君这样的业主还有很多，他们有的是买到了烂尾房，有的是由于房价大幅降价损失了利益，有的是被物业坑得坑得很惨。他们的利益其实都是一致的，都必需进行斗争才能捍卫自己的利益。亮亮丽君夫妻曾发微博说：“以前是读历史，此刻我的经历就是历史，我横

竖不理解，为什么？”这其实也反应我国许多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从被欺骗着的、茫然无条件的信任统治者的奴隶，开始质疑现有的世界、质疑现存制度、逐渐开始反思。这是所有无产阶级走向觉悟的第一步，我们很欣喜更多人民群众们也开始踏上了这一步。我们相信，当人民群众决心要抛弃整个旧世界后，新世界到来是注定的。

所以我们非常荣幸为开始尝试走出旧世界而姗姗学步的群众们解答这个问题。当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危机的时候（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资产阶级们除了依靠继续压榨和欺骗劳动群众外没有别的办法，哪怕我们已经贫困不已，他们也一定要违反他们自己定的法律、自己许下的诺言、自己立下的标准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危机时期，融创可以完全不遵守法律和自己以往的公开承诺，而其他资产阶级会发现，在社会普遍的阶级矛盾的发展、由于无产阶级代表的整个我国劳动群众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代表整个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越发尖锐化的时期，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统治和财富稳固他们也不得不维护他们整个集团各种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不得不和整个被压迫群众对立起来。因此危机的发展也使得阶级矛盾越发的简单化了、尖锐化了、全面化了，它使社会越发明显分为这样两个彼此对立的集团，无产阶级领导的奴隶集团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集团。自然，这个集团之间会有一些游离不定的特殊阶层和特殊个体，但随着阶级矛盾的发展和每一次具体的阶级矛盾的爆发，他们必然要么站在这一个集团那、要么站在那一个集团那。

因此，在面对的这样危机的时刻，碧桂园的职工、建筑工人、受迫害的业主们、或者被欺骗而遭到损失的股民们都应该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最广泛的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不这样我们无法战胜敌人，也必然还要被奴役，甚至连现有的奴隶生活也无法保障。因此，资本主义的一切危机，都应该是我们发起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发起进攻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关键时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争取到明天解放。如果在这样的时期我们无动于衷就等于任人宰割。这应当是使所有人民群众都了解的最基本的道理。

这次危机的意义还有很多，我们还可以学到很多。对于革命者来说，这样的危机是需要我们大跃步去做好历史交给我们的新使命的时期，是我们必须要激流勇进时期，它不允许我们有任何上一个时期的偏见和工作上的保守和懈怠，不允许我们有眼光上的狭隘和勇气上的退缩，它需要我们做出更大的牺牲，否则我们必然要失去帮助人民群众争取解放的机会。如果我们有条件，只要我们足够勇敢，敢于前进、敢于首创并做好最重要的工作，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争取极大的胜利，就一定的能够使群众运动和革命运动更进一步。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准确的来说是只要革命者有条件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危机都是我们要把革命事业进行跃进的时期，是要求革命分子更加积极学习和工作的时期，是要求革命者勇于首创、前进和斗争的时期。

“血槽姐”所揭示出的吸血鬼老爷们

革社（RSF）编辑部

今年10月，上海某女子在西藏阿里地区出现高原反应，驾车时发生车祸遭到重创。经过及时的医治和一系列令人感到夸张的超高规格医疗服务待遇后恢复健康。11月28日，她发视频感恩，讲述在阿里经历，如感谢“阿里全体公务员”为其献血的感人事迹，因此被网友称为“血槽姐”。

实际上，根据其透露出来的早期聊天记录来看，血槽姐在遭遇车祸重伤被救治过来后，她第一时间并不是感谢医护人员，也不是感谢为自己献血的陌生公务员，而却是“直呼小姑姑牛逼”。透露她的小姑姑为她联系上了上海市卫健委，动用了阿里的自治区所有公务人员鲜血，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派出所民警、消防官兵、还有部队官兵又筹集了3000多毫升血”、“整个阿里自治区的a型血都给你输上了，一共七千多毫升，你全身换了两次血”。

并且“血槽姐”之后还秀出了湾流G550私人飞机将她从阿里地区运到了四川成都的华西医院，警车为其一路开道。而这整个过程甚至成了正能量新闻上了医院的“党建园地”。这一视频一经传播引起正在考公务员的年轻人破防吐槽，有网友感叹：“难道我们辛辛苦苦考上公务员就是做你们有钱人的移动血包吗？我们的命也是命啊！”

好一个“移动血包”！群众到出了真相。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是被资本疯狂榨取剩余价值而使资产阶级们富裕起来的牛马，甚至还成为了保护官僚资产阶级家族健康的“移动血包”。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今天也是如此，资本不停的压榨着我国劳动者的血汗，我国的资产阶级们无不是每一个毛孔都滴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另一边还要吸食人民的鲜血。靠压榨血汗致富、靠吸食血液为生，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是纯粹的、不仅是实际意义上的也是字面意义上的“吸血鬼”。我国官僚资产阶级在吸血的程度和方式上不断发展，今天要通过吸血来保护自己的健康，他们不断的进化为越发高级和罪恶的吸血鬼。

我们不能忘记，当资产阶级老爷们的家族成员通过大量调动劳动人民的血来救治自己，用劳动人民的血汗来保障能够使用私人飞机和警车开道时，还有大量的穷苦群众们得不到像样的医疗救治。有多少劳动群众因为贫困和医疗费用的昂贵而用不上药品、做不起手术、付不起住院费、得不到疗养，而剥削者却有权让我们乖乖为他们献上鲜血。而整个社会的财富和医疗部门的所有现实条件都是由劳动人民的血汗创造出来的。过去的社会主义医疗服务的人民群众，今天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们的“社会主义”的医疗却成为了奢侈品，但也成为了资产阶级的日用品、日常消耗品。

这样悬殊的对比和强烈的现实不公平境遇自然要引起人民的愤慨。所以，“血槽姐”的事件随后很快冲上微博热搜第一。看到引起了人民的质疑，这个官僚资产阶级的家族开始感到一些紧张，他们编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欺骗群众，试图“辟谣”，称“聊天记录是为了鼓励妻子求生。自己的姑姑不是公职人员”、“献血由阿里当地医院和卫健委组织，并非个人行为”等等。

但这些“辟谣”就如同过去疫情时期至今的一切辟谣一样，都是为了维护他们利益的“辟谣”，为了掩盖资产阶级的丑恶剥削者面孔而进行的“辟谣”。每一个“辟谣”除了在极其例外的情况下，其他的基本都成为了新的谣言。而这个的事实是已经被关注网络的群众所熟知了的。而之所以他们还要继续“辟谣”，无非是因为还有更多的群众还不知道他们的丑恶，或者说群众们还低估了他们的丑恶，因此要继续掩盖下去、欺骗下去，让人民们信任他们的。而之所有还有人不知情的信任他们，恰恰是由于我国过去的革命所造成的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这些篡位者们深知最严重的欺骗就在于这里，因此他们就要不断对人民使用欺诈的手段。

为了欺骗，在环球日报的报道中，女子父亲表示“但据他所知，他们家和女婿家中几乎没有公职人员”。而在《新京报》报道中，这位父亲却强调，“他并不知道这位小姑的具体身份是什么，只知道这位小姑准备退休了。”

这种解释自然是心虚的表现。随后各种漏洞被群众挖了出来，如其飞机并不是他们花钱包的，而是医疗救援的公务专机，一路上警车开道的特权等等。当他们试图狡辩不存在的特权的时候，就有现实出来证明了特权。比如在12月1日，记者以一位异地急需用血者家属的身份致电上海卫健委，请求协调异地献血。被上海卫健委以“需在当地申请”为由拒绝。记者质疑此前“血槽姐”是否有这样的救助通道，对方表示不清楚。其小姑姑的身份也被挖了出来，疑似“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兼）余艳红”。

而这样的家族我国还有很多。他们在自己的家族成员的健康受到危害的时候，就能把其他的公务员们当作他们的移动血包。就踩着河南人民的血浆上台的李克强一样，这样的吸血鬼还有很多。这只能再一次为我们说明资产阶级的吸血鬼本质（甚至是字面意义上的），而我国的资产阶级又主要由官僚资产阶级构成。

并且在之前与血槽姐相似的北极鲶鱼事件中，虽然也同样受限于广大群众的呼声，官方最后查办了涉事的背景官僚，当作“反腐捷报”，但处罚只是降低该官僚的退休待遇、开除党籍和收缴违法所得。这种行为对于中共来说只是违纪，按照职务违法的方式处理。就算被查处之后其生活也能过得比人民群众还好，就连自由派媒体德国之声中文网当时也引用网友评论称这是“罚酒三杯”，处罚过轻，是“最好的‘考公’广告”。不过他们现在知道这件事后应该不太想考公了，因为普通的公务员也是牛马和“移动血包”，而官僚资产阶级们是家族式的延续自己的财富和地位的。

不过这样的处理也彰显了一个道理，官僚资本家们顶多装装样子来应付群众。他们最多只反“贪官”而并不反资本主义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本身，但由他们统治必然又是无官不贪，不官不剥削人民群众的。他们无非就是在说，“只有我们才是社会的柱石，那些普通的公务员和老百姓无非就是牛马，牛马的血汗有什么可珍贵的呢？我们必须要用牛马的血汗来保障我们的生活和健康，不要让牛马们了解到我们的真实生活水平，这会让牛马们感到不公平，那就会威胁到我们的地位。如果让牛马感到不公平那我们就要多装装样子了，而装样子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总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们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的命运，无非就把我们当做使他们过上富裕生活的牛马、运转财富机器的燃料和耗材、保护他们生命健康的“移动血包”，只要他们需要，我们就得要为他们付出汗水、骨肉和鲜血。而且他们还想要更多，一天比一天多。如果我们对今天被当作“移动血包”的同胞们的命运不动于衷，那么明天我们更多的弟兄就要遭到同样的甚至于更惨的下场。因此资本贪婪是无穷无尽的、官僚资产阶级老爷们贪欲也是无穷无尽的，老爷们为了保证自己的生活、健康和增加自己的财富就必然要使我们的更多的弟兄变成他们的耗材和“移动血包”。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各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在积极的把无产阶级变为他的“移动血包”，如12月12日，哈尔滨金融学院有辅导员在群内发布通知诱导强制学生献血，不参与献血的党员、班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将被取消评奖、评优、入党等资格。

我们只需要看看现在的情况就明白了，从早期的辟谣被群众质疑拆穿后，12月2日“血槽姐”相关话题就被全部封禁，甚至连一个像样处理都没拿得出来。12月8日，上海市网信办联合相关平台查处了一批涉及“血槽姐”相关造谣，网友则在相关通告下方集体刷屏“牛逼”。这说明舆论领域，资产阶级专政越来越肆意妄为，任何反对和揭露老爷们的东西都被抹除，任何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家族的利益都成为了这个阶级的整体利益。这种措施虽然等于自证了血槽姐的一切言行和丑恶的资产阶级性质。但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老爷们满的态度现在越来越恶劣，他们甚至都懒得开始装样子了，而更多的是用专政来对付我们。如果我们不积极的斗争，不踊跃团结和组织起来揭开这些真实的罪恶，他们就会视而不见；如果我们不能有力量的提出明确的要求，他们至多也就会以过去那种象征性方式来习惯性的应付我们，应付完我们之后又继续稳稳当当做老爷，使唤着他们的牛马和“移动血包”。

自然，我们今天要达到这样的斗争效果我们还得从实际的角度和工作的角度上来思考。这就会发现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要形成这样广泛的斗争不能仅仅等待群众们的运动，也不能停留在号召。我们要争取在各个层面给更多群众做更多的宣传鼓动，需要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能够深入到群众中去，否则我们能影响的群众始终是很少的，能影响的程度也是不足的。这就需要我们要组织起来，让进步的宣传力量能够更密切、广泛的和群众们联系起来，把宣传鼓动工作的效果扩大到更广泛的范围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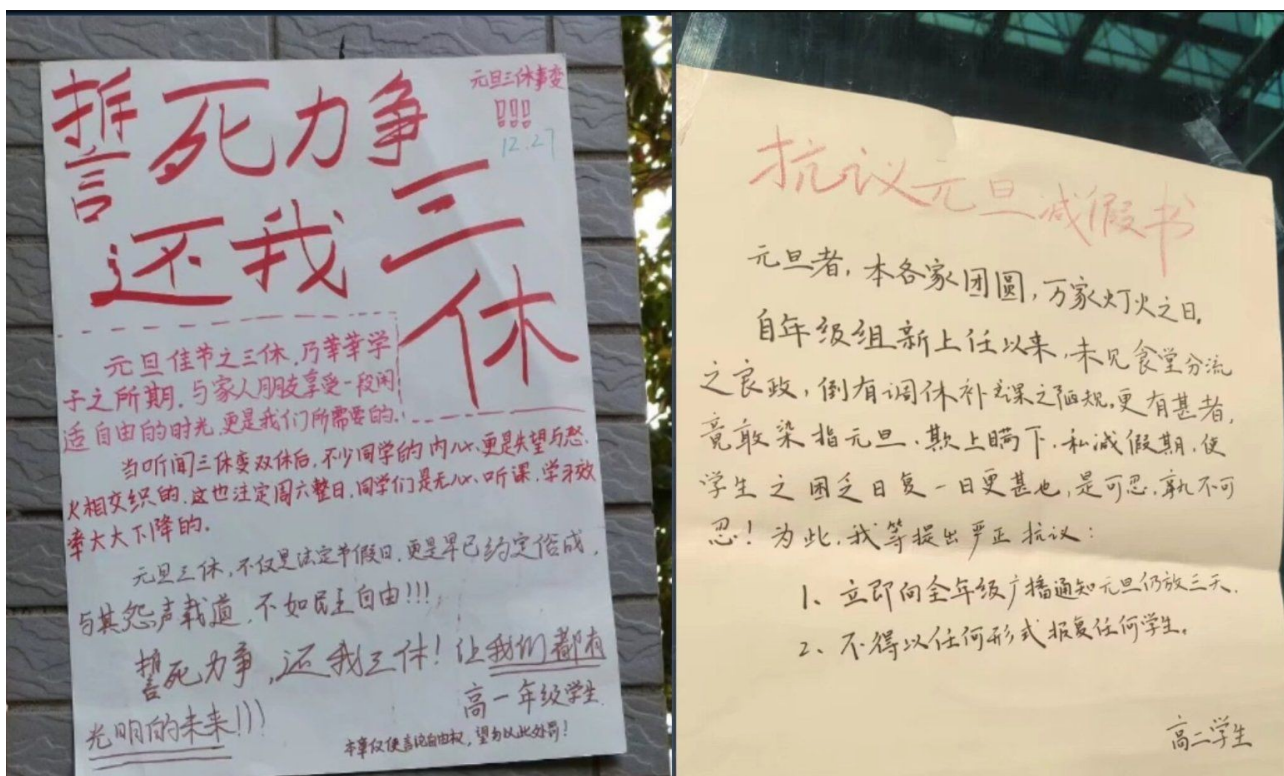
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把现有的工作提高起来，和群众联系加大起来；要加大对群众的鼓动、宣传、组织工作；要和我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们、要和这一个个吸血鬼们、要和整个我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做最无情的和最彻底的斗争。

长沙学生们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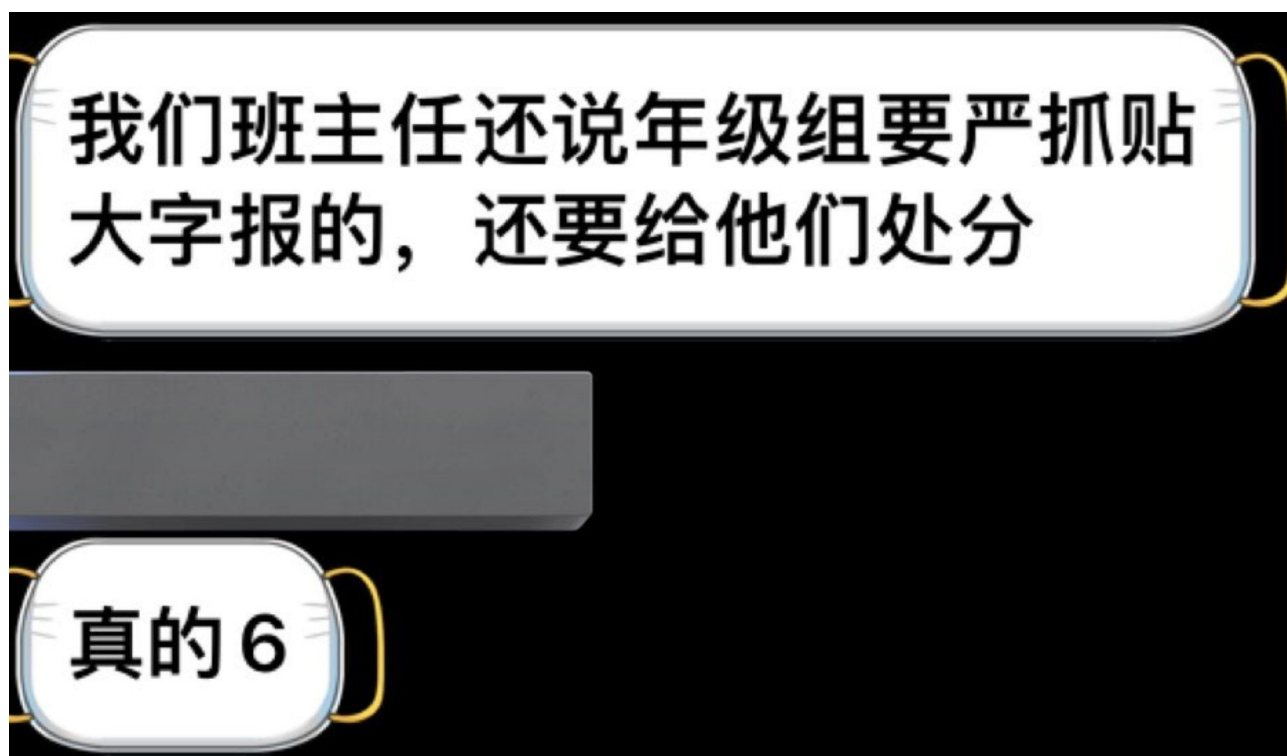
革社 (RSF) 编辑部

12月27日，长沙市某省级示范高中爆发了学生抗议活动。据悉，因校方将原定的三天元旦假期突然缩减为两天，引发了学生及部分老师的不满。当天，学生们开始在食堂、年级办公室张贴并传阅抗议檄文和大字报，并进而演变成自发聚集喊楼行动，喊出“誓死力争，还我三休”等口号。最终学生们抗议成功，校方恢复了三天假期。

这是学生们打出的大字报：



据传，学校的官僚们也曾试图处理学生：



但不管结局如何，学生聚集起来的力量最终还是让官僚们退步了。因为学生们的团结他们也不敢处理学生，并且最终承认了学生的合法三休权益。学生们事后总结了这场斗争：

12.27, 12.27 起义

12月26日晚，学校收到上级通知临时将国家设定的法定节假日三天元旦假期改为双休。这一消息转到 12.27 学子耳中，激起学子郁积已久的极端愤怒，提出了“誓死力争，还我三休”的主张。高一高二学子纷纷发表朋友圈，斥责这一无理行径，并要求年级组归还三天假期。这也成为 12.27 起义的导火索。

至27日上午，高二学子团结一心，率先在年级组办公室打响反动双休的第一枪。本次起义虽未直达上级领导，但也拉开了恢复三休的序幕。

直到27正午，年级组仍无所作为，但也未用武力镇压 12.27 学子。由于政权始终掌权在上级手中，年级组不能单方面宣布改变双休的决定，不可能为 12.27 学子谋求真正的出路。这使得越来越多的 12.27 学子认识到：只有越来越多的学子加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三休才有希望。

在27日下午， 12.27 高一高二学子再一次爆发，在各层走廊间喊出了嘹亮的无数声：恢复三休！一大批学子的前仆后继给年级组带来沉重的打击，在两栋教学楼的起义引起了巨大震动。

终于，年级组与上级领导在学生的重重压迫下发表声明：恢复高一高二的法定三天假期。

12.27 12.27 起义是一场以 12.27 高二学子为先锋，广大高一学子参加的群众性、广泛性起义，是一场拯救法定三天假期、捍卫学子尊严掀起的伟大起义运动。

学生们意识到了团结和斗争的作用，他们用大字报等形式把学生的愤怒集中的表现了出来并凝聚为共同的行动。因此，这里的大字报完全起到了集中表述阶级情绪、阶级利益和集中阶级行动作用。同时，大字报等行为和运动本身也推动了整个学生的进步，使原本茫然服从学校秩序和服务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学生们开始明确的把自身和学校官僚们对立了起来，在自身集体利益和学校官僚利益之间选择了前者。

同时这也突出的表明了进步力量的作用，进步的学生有理由带领整个学生群体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自然，斗争胜利是以一定的群众关系和现实条件为基础的。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当长沙此学校的学生们团结起来勇敢的为维护了自己的合法利益而进行斗争时，学校官僚们的力量就显得远远不足了。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单个学校本身的范围内所进行的维护合法权益的斗争（这种斗争自然是小范围的经济斗争）时，当这个学校的学生联合起来时，就很容易战胜学校官僚这个弱小的敌人。学校官僚只是整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中的很小一部分、他们只是其中一个特殊组成阶层。如果学生们只是单独和这个敌人进行斗争，那么斗争的胜利是很容易的。而如果扩大斗争目的，把它发展的更广阔的范围内时，我们就能发现需要和更广大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了，而这时单独靠一些学生们的力量就不足了。

所以这场斗争仍然是经济斗争的性质的。但我国的现状是，即使是经济斗争也是很不足的，及时是经济斗争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这个斗争广泛的使学生们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以及使得学生组织起来。所以，现在学生们的一切阶级斗争我们都应该支持，特别是这种完全可以争取到胜利的斗争。

学生们现在容易争取到斗争胜利的这种的经济斗争所能发展的极限就是包括全国所有学生的维护合法权益的斗争，我们应该支持和推动这个过程。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方向，特别是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统治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我们又要同时逐步的提高学生们的政治性（这就要建立学生中的革命政治组织），使自觉的政治性慢慢领导自发性（政治组织逐步的领导广泛的学生组织进行运动），使他们逐步的和其他社会运动结合起来，使他们逐步的和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使学生的斗争组织成为未来整个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才能把学生运动切实的发展起来，也能把学生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并促进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起来。

我们要在发展一切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把一切不自觉、不彻底的阶级斗争逐步的转变自觉的和彻底的阶级斗争，这样的趋势，也是“九十学运”所要指明的内容之一。从人类文明史以来，一切斗争都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从当代社会运动的发展史来看，这次斗争是对“九十学运”延续，它的历史目的在于完成“九十学运”所指出那些内容。

但不管怎么说，伟大的“九十学运”扫清了多来年我国学生运动陷入低谷和低水平发展的阴霾，它势必要指引着之后的学生运动要以和它同样的以及更高的高度上进行。这是斗争的胜利！

同时，我们只需要仔细观察“九十学运”也能发现出以上指出的各种问题和有待改进的地方。“九十学运”只是我国学生运动的新起点而不是终点。“九十学运”的成果在今天还没有完全普及，我们之后要普及它。这就要求我国所有的学生们都要像“九十学运”中踊跃斗争的学生们学习，要通过自己的勇敢斗争来维护起自身的合法权益，并建立起学生们自己的有继承性的斗争组织。并且我们还要在普及“九十学运”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学生运动和斗争组织。“九十学运”进一步彰显了我国学生运动的一些规律，我国学生的假期问题、学校的各种政策问题和压迫行为都是成为学生运动发展的规律，有这些问题的地方就有条件产生学生的斗争，这些规律是我国的进步学生们、我国的革命分子们一定要利用起来的，他将是我们下一个时期学生组织的日常的任务（这已经是直接的斗争任务了）。我们要尽量在每一场斗争开始之前就预料到斗争，并且能够提前做好斗争，

建立坚强的组织，以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斗争方法来完成斗争并不断的、继承性的发展我们的力量。

拾起前者的骸骨，是为了继承过去的精神和埋葬过去的不足。只要我们之后做好了“九十学运”给我们提出来的这些任务，我们就能使我国社会运动发展到新的高度，并更大程度上的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复苏。

-革命社会主义阵地（RSF）第八期月刊《是斗争的胜利！论伟大的“九十学运”的意义》

“九十学运”中所揭示和所预见的全部学生运动发展趋势在于：提高现有的学生运动的数量和规模，最终要把它发展到包含全国学生的广泛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程度；提高学生斗争的组织程度，像郑州一中学生所一开始要求的那样，要建立起包含最广泛的学生的组织，这种组织是主要用来进行阶级斗争的；在运动中逐步提高学生的政治性，使它开始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这就要建立领导整个学生运动的学生政治组织。因此，长沙此校学生的斗争意义就在于证实了这些趋势和预见是完全正确的和完全可行的，我们今后的学生工作应该照着这样的方向稳步的前进。

第四部分 宣传内容

本部分是用来专门刊登宣传内容的文章，除了一部分革社认为需要的政治内容外，这部分文章也具有更多的工作性质。

发展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的号召

革社（RSF）编辑部

如今，多个革命组织的同志们达成了一个马列毛主义力量的统一战线。我们在这里号召我国更多优秀的、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组织加入统一战线。同样的，我们也希望一些优秀的同志能够加入我们统一战线目前正在进行的种种革命工作，发展我们共同的革命事业，为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力。

1. 对于想做电报群的宣传和电报群的组织工作的同志，可以加入东风的组织。
2. 想做时评、日报、月刊等宣传工作的同志们，我们则邀请你们加入斗争公社的组织。
3. 想专门创作理论方面或其他方面较高质量文章创作工作的同志们则可以加入革社（RSF）。
4. 而想做线下组织工作的同志们则可以选择加入革社（RSF）或东风。
5. 而想现在参与融工工作的同志可以联系“到工人中去”的同志。
6. 想参与理论学习、基本革命工作技能培训而之后进行其他革命工作的，请联系丧钟组织，学习班或工人讲习所就在这里。
7. 想做翻译工作的（专门翻译统一战线的组织文章以及翻译国际重要的文章为中文），请联系统一战线邮箱。
8. 统一战线的官方推特也以启用，欢迎同志们关注。
9. 组织上的事宜（如代表自身组织加入统一战线组织或合作等）请联系统一战线的邮箱或推特说明情况。我们会在本文末提供这里提到的所有组织或机关的联系方式。

斗争公社: douzhengyuekan@proton.me

革社（RSF）: RSF-kan@tutanota.com

到工人中去: letsstartnow111@proton.me

丧钟: t.me/knellofcapitalism

东风: <https://t.me/MarxismLeninismDongfeng>

统一战线邮箱: sinomlm@tutanota.co

统一战线推特: @MLMunionChina

第五部分 斗争艺术

这部分主要关注革命工作中需要的各种斗争手段或技术。这里整编了一些国外内各方面同志的相关成果的文章，具有很突出的帮助实践作用、推动革命工作的意义。

开源软件与自毁程序

革社 (RSF) 编辑部

关于开源软件，在往期的文章中我们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却没有说明何为开源软件。本文的上半部分将会论述究竟何为开源软件，以及使用开源软件代替私有软件的必要性。在本文的下半部分，将介绍数个移动端上开源的设备自毁软件，帮助使用者在危险情况下删除设备中的敏感数据。

开源软件又称开放源代码软件，是将源代码公开到公共渠道，允许他人进行代码审查并修改的软件的统称。常见的源代码平台诸如 Github 之类，有较大的程序员基数，且大部分源代码处于公开状态，因此他人很难在代码上通过暗藏后门代码等方式对软件使用者的设备植入监控。相比起闭源软件，开源软件的高透明性让其在安全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开源软件的公开透明，以及普遍的不收费机制遭到了闭源软件系统的集体抵制。目前绝大部分的软件市场(除 linux 平台外)都是闭源软件市场，从规模较大的 Google Play 到国内的各种软件助手(以及移动端上的应用市场)皆是如此，这些闭源软件平台或出于盈利的目的，或担心开源软件不好管理，总在实际上阻碍整个开源软件系统的传播，甚至利用所谓“知识产权”不断打压各种开源软件。究其所以，不过是闭源软件更好垄断敛财，不过是闭源软件更好掌控，不过是闭源软件可以秘密的入侵和窃取使用者的设备安全和个人数据。因此，推广并尽可能使用开源软件，将软件安全掌握在使用者自己手中，而不是掌握在闭源软件的所有者手中，我们的软件安全才能有保障。

此外，本文作者还希望推广一个移动端的开源软件市场(移动端的信息窃取和安全入侵问题相比起桌面端更加普遍，更需要使用开源软件保护自己)

F-Droid 是一个 Android 平台上 FOSS (Fre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 自由开源软件) 的软件市场，提供软件下载安装支持。使用该市场可以在不需要登陆谷歌账户的情况下下载大部分 Google Play 上的应用(避免被平台登记账户)。此外，平台还收集了大量的开源软件，并且对平台上的开源和闭源软件做了标记区分。使用该平台下载 Android 移动端的软件时，可以直观的看到软件所需要的权限以及可能涉及的用户数据，帮助使用者在下载软件之前对软件进行风险考察。

该软件平台的官网为：

f-droid.org

F-Droid 上存在大量的开源安全软件，本文将介绍其中的四款，帮助使用者增强自己的移动设备安全。（下文提供 github 的源代码地址和下载地址，如果想使用 F-Droid 下载，在该软件市场中搜索相关软件名就行）

四款软件分别为：

Duress

github.com/x13a/Duress

Wasted

github.com/x13a/Wasted

Sentry

github.com/x13a/Sentry

Clipeus

github.com/x13a/Clipeus

这四款安全软件均为一人开发，并且在 github 上进行了源代码的开源，相对安全可靠。

以下为上述四款软件的功能介绍与使用教程说明：

Duress

这是一款锁屏密码检测机制的软件，使用该软件前，需确保移动设备已经设置了使用密码/pin 码来解锁屏幕。

通过该软件的 wipe 功能，可以实现当输入特定的解锁密码/pin 码后，设备自动恢复出厂设置。使用该软件可以在设备被控制，人身自由无法获得保障的情况下，或被要求提供设备解锁码的情况下，通过诱使他人输入特定的解锁码来强制设备出厂化，清除设备中存在的数据。

该软件的使用方式如下：

1. 设置设备需要密码/pin 码(这里更推荐 pin 码)解锁屏幕
2. 下载并打开 duress, 选择软件上方功能栏中最右边的 Test 功能
3. 在下方的输入栏内输入你想要的特殊应急密码/pin 码

4. 选择下方 keyguard 中的 A 模式
5. 点击软件最下方的关闭按钮，确保点击后按钮显示的内容是开启
6. 锁屏，再次打开并尝试使用设置好的应急码进行解锁(这个应急码不能是正确的解锁码，一定要是错误的解锁码)，解锁失败后使用正确的密码/pin 码进行解锁，解锁成功后设备任务栏中会出现测试成功的提示，即可进行下一步
7. 在上方的功能栏中选择 Wipe 功能，执行上文的步骤三和步骤四的操作，在执行步骤五时，会弹出是否授权软件执行清除所有数据的权限申请，选择启动选项(一般在选项中间位置)即可，授权后再次执行步骤五，确保下方的按钮显示为开启即可完成全部设置活动

Wasted

此软件在功能上与 Duress 相似，但触发条件不同。

该软件的主要功能是在设备多日未解锁(设备被扣押)或设备在未被解锁的情况下接入 usb 调试(尝试从外部破解设备的锁定时)自动执行恢复出厂设置(数据清除)功能的软件。

该软件的使用方式如下：

1. 下载并打开软件，勾选主页面的擦除数据与擦除 esim 卡选项，并点击下方的关闭按钮进行激活(详细步骤与 duress 相同)
2. 点击软件左上方的栏目图标，使用者可以修改两个项目的内容，项目一是追踪器，通过滑动进度条修改时间，可以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的误触发行为，给予格式化行为一个缓冲时间(默认是 1.5 天，建议设置 0 或者 0.5 天)。项目二是 Lock, 通过修改项目二内的具体数值，可以确保设备在未解锁多久以后自动执行出厂格式化，该项目默认数值是七天，建议该数值选定在 5d 到 10d 之间
3. 点击软件右上角的齿轮图标，进入设置选项。找到广播，USB, LOCK 这三个选项并将其后方的方框点击打勾，即可设置该软件的触发方式，完成此步后该软件即可设置完成

Sentry

该软件在机制上与 duress 相似，都是运用锁屏密码检测机制。与 Duress 不同的是，该软件主要防范他人在设备使用者未知的情况下尝试解锁设备，或者有人尝试强制破解设备解锁码的情况下，该软件可以在后台记录设备的解锁行为，并且在解锁错误达到一定次数后自动执行恢复出厂格式化的功能。

该软件的使用方式如下：

1. 下载并打开软件，在下方的 Number 栏中输入你想要的最大密码错误次数，并点击下方的关闭按钮进行激活(详细步骤与 duress 相同)

2. 点击软件左上方的栏目图标，选择 Monitor 选项，勾选其中的两个选项，并点击下方的 goto
3. 在弹出的页面中，将 sentry 软件后面的开关选择打开，即可完成该软件的全部设置

Clipeus

Clipeus 不是一个常见意义上的图形化软件，该软件只有一个桌面图标，没有具体的软件界面。该软件的主要功能是清除设备的剪贴板，使用者可以在每次完成剪贴任务后以及锁屏前点击一次该软件的图标，清除自己之前的复制记录(只是清除记录，不会影响已经复制好的内容)，养成清除剪贴板的良好习惯，避免被间谍软件读取剪贴记录导致的信息泄露。

在上文提到的所有数据清除/恢复出厂化/格式化行为都不能从数据底层将数据彻底消除，但仅从表层将数据的痕迹清除即可增加专政机关的侦查成本，减少自身暴露的信息。因此，任何使用 Android 移动端活动的个人都应该安装这四款软件，为你的设备安全提供一个最后保障。